



目 录

专 论

- 3 杨 成 / 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

专题文稿：国外俄苏研究

- 69 于 滨 / 从 X 到 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
- 87 彼得·拉特兰 / 朋友还是敌人？——1991 年后美国的俄罗斯政治研究
- 110 哈罗德·M·莱克 / 国会图书馆的俄罗斯馆藏以及服务：过去，现在，将来
- 122 宇山智彦 / 日本的中部欧亚研究：俄罗斯研究与东方研究的紧密结合
- 128 阎德学 / 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与意义
- 139 龙 腾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1 年 2 月 23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1 年第 1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Ян Чэн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парадигмы совет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и евраз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 На основе научных обзоров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3)

Юй Бинь

От X до Z: Взлёт и упадок советологии на Западе (69)

Питер Рутланд

Друзья или враг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в США после 1991 г. (87)

Гарольд М. Лейх

Фонд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услуги Библиотеки Конгресса США: прошлое,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110)

Уяма Томохик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Евразии в Японии: Тесная связ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22)

Янь Дэсюе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значение «Славянских евраз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Японии (128)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1 年第 1 期 (双月刊)

Contents

Yang Cheng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and Intelligence Revolution in Chinese Soviet,Russian-Eurasian Studies — A New Approach based on Academic History Review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3)

Yu Bin

From Mr. X to Mr. Z: The Rise and Fall of Sovietology in the West (69)

Peter Rutland

Friend or foe?

— the Study of Russian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91(87)

Harold M. Leich

The Russian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Past, Present, Future (110)

Uyama Tomohiko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in Japan: A Close Combination of Russian and Oriental Studies (122)

Yan Dexue

Constru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Slavic-Eurasian Studies” in Japan(128)

专 论

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

——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

杨 成**

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

——[德]歌德^①

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

——梁启超^②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凡立此名者，皆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王国维^③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08BGJ003）上海市教育基金会委员会2007年度晨光计划项目“中俄毗邻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编号：2007CG37）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1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的部分内容来自于笔者于2009年9月30日以“经验·范式·空间：后冷战时期的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为题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全国青年研究骨干高级研修班上的学术讲演；作为国家开发银行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建高等研究院的项目研究之一，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经验部分曾以内部成果的方式于2010年6月报送国家开发银行。

**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俄罗斯研究》副主编，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① 转引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5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9页。

③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65页。

70年代至80年代前期的俄苏研究犹如考古学般的神秘；
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末的俄苏研究就像火山迸发似地令人眩昏；
新世纪以来的俄苏研究表面平稳，然而却暗流汹涌；
而这一于世纪之交问世的潮流，等候着一代中国学人的洞察与写真。

——冯绍雷^①

导 言

历史回顾与反思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进入21世纪，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同步，中国的俄苏研究^②迎来了代际变化的新阶段。老一代学者渐次退出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中青年学者开始群体性发挥主体作用。但问题在于我们很可能既未能继续保持（遑论弘扬）老一代学人的优良传统，反而染上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的浮躁之气，进入了一个学术与社会一同“平庸化”的时代^③，使得我们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的空间日趋萎缩，日益难以在本土及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中寻求认同和交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俄苏研究的过往作一个深刻的反思，进行严肃的检讨。这不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早晚躲不过的学术问题。这种反省思考，既是为了当下，更是着眼于将来。

作为20世纪从业人员最多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国际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俄苏研

① 冯绍雷教授为2009年9月29-3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全国青年研究骨干高级研修班所题寄语。

② 本文所指的“俄苏研究”是一个有着一系列学科背景作为支撑的学科和教学领域，旨在揭开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兴衰成败的进程、原因及相关知识。尽管涵盖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文化学和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但在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之下，它渐渐演变为和有关俄罗斯问题的决策，包括当代问题研究始终紧密关联，并进而生成的一种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这种研究突破了过往对俄苏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性经典俄国问题研究与政策性研究互为分离的格局，进入相互交流与融合并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阶段，日益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专门分支。

③ 陈春生：“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苏力、陈春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5页。

究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一步步推动相关知识的积累和进化。^①相对而言，中国俄苏研究学界尽管尚缺乏类同于西方同仁的大部头反思性学术史的书写，但对此问题也不乏深刻的短小精悍之作。中国俄苏研究的重量级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刘克明先生早在1984年就曾对我国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作过简要的学术史回顾，并着重阐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的“大大活跃”与“很大进展”。^②李静杰研究员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了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的亚太地区苏联研究学术会议，介绍了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的主要议程设置及进展。^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范新宇曾专门撰文总结中国的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既要研究苏东经济，又要联系我国实际”、“既要研究现实，又要预测未来”、“既要提出问题，又要探求对策”三大“需要加强研究的薄弱环节”。^④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黄定天副研究员则从中俄关系史学史在中国的发展的视角，分门别类地叙述了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中俄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基本状况和主要成果。^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教授在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六届全国理事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呼吁中国俄苏学界积极开展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研究。^⑥冯绍雷教授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俄苏研究的三十年断代史作了精彩梳理。他强调，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同步并行的进程，同样经历了由起步、深化到走向国际的三个十年；中国的俄罗斯、中东欧与东南欧以及中亚问题的研究在进入了第三个十年的最后阶段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新任务和新

① 相关代表作品主要包括：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hilip E. Mosely, “The Growth of Russian Studies”, in Harold H. Fisher (ed.), *American Research on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Frederic J.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9; Arnold Buchholz (ed.),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82;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source System Institute and East-West Center, 1986; *Post-communist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in Sovietology*, edited by Frederic J. Fleron and Erik P. Hoffmann, Westview Press, 1993; *Beyond Soviet Studies*, edited by Daniel Orlovsky,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5; Michael Cox (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London and New-York, 1998.

②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6期，第1-4页。

③ Li Jingjie and Mei Yan, “Soviet Studies in China”,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89-98.

④ 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世界经济》，1989年第3期，第81-87页。

⑤ 黄定天：“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55-166页。

⑥ 李慎明：“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应该有一个大发展——在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六届全国理事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3期，第1-2页。

挑战，需要认真思考作出回应。^①王军、但兴悟合著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一书中花了少量篇幅评述了中国的中俄关系研究情况。^②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等最近亦以图书首发式讨论会综述的形式，对苏联史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强调研究苏联问题必须秉持正确的方法和求实的作风。^③其他一些专业性期刊也曾对中国的俄苏研究的个别领域，如苏联解体问题、欧亚主义问题等进行过总结和回顾。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对中国苏联东欧研究同样给予了一定关注，尤其在 80 年代中期。在前文所述亚太地区的苏联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一般每个国家的俄苏研究只有一篇相关论文，连美国也不例外，唯有中国受到了特殊优待，共有两篇相关论文。^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罗兹曼对 80 年代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尤为推崇，除撰写长篇论文外，还出版了专著予以详尽剖析。^⑤

本文认为，上述前辈学人的追溯都有积极意义，但在解决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取向这一更加根本的问题方面，则仍需要新的求索。尤其是最近 20 年来的中国俄苏研究往往是只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因而在结论上很可能会无意识地忽略掉一些关键点，并因此无法传递俄苏问题的本质，所得到的也多为伴随着扭曲和不可能显露真理的叙述。这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种紧迫感、一种忧虑意识。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迄今为止的中国俄苏研究是否是最优的？现有的研究范式和智识谱系是什么？中国俄苏研究和国外俄苏研究的异同点在何处？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是要在现有的知识系统下延续既往的模式还是要开拓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径？

本文认为，进入 21 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仅迎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我们在学术上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冲击。但与此同时，显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我们有可能推陈出新，开拓境界。当前，中国的俄苏研究已经到了一个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在现代学

①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4-11 页。

②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8 年，第 174-178 页。但在本书中，甚至整个原苏联东欧地区问题研究都被“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地区问题研究”一章乃至全书所忽略。

③ 吕瑞林、左凤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苏联问题——《苏联真相》首发式暨苏联问题研讨会综述”，<http://www.cntheory.com/news/Llythlythjy/2010/126/10126171629HK4D30D1379B6EDCF27G.html>。

④ 除李静杰研究员提交的论文外，还包括 Douglas P. Murray, “China’s Soviet Studies Programs”,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67-68.

⑤ 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es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Gilbert Rozman, *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July 1985), pp. 435-474.

术的知识语境下重构我们的学术观念与方法，使我们对于未来中国俄苏研究的潮流和去向有所自觉。中国俄苏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既坚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至少是亚洲的俄苏研究知识语境中建设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俄苏研究论述。提出这样的学术追求，是因为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俄苏研究领域，我们与世界主要大国、甚至像芬兰那样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即便是与亚洲邻邦韩国相比较，也日益暴露出国际影响力多有不如此的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世纪新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理应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不能在历史惯性的支配下，重复既往的研究范式。在未来，中国的俄苏研究既要向人们提供知识的飨宴，也要训练学人的智力，同时还要为建立与提升我们在世界民族和国家中的地位提供一种智识认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言以蔽之，中国的俄苏研究不应该是国外俄苏研究的效仿者、追随者，而应该是同行者。暂时的效仿、追随，是为了达到最终相互为师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是中国俄苏研究的建树与开拓，而非洋化改造。这是最根本的要义。

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国俄苏研究予以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并将之与国外俄苏研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其结构安排如下：导言部分在对国内外已有文献作基本梳理后，提出问题；第一部分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着重梳理中国构建俄苏研究范式和智识体系的简要谱系；第二部分介绍美国苏联学的神话与败落及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复活；第三部分侧重描述作为方法的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第四部分提出中国新俄苏研究的可能方向；结束语部分作简短总结。

一、中国构建俄苏研究范式和智识体系的简要谱系

要论述当前和今后中国俄苏研究的取向问题，就必须从其历史说起。应该说，俄国^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研究客体。从国际学界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别研究像俄国研究这样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和争议，特别是对苏联时期的研究。需要提出的是，中国的俄苏研究学术史可能仅仅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重心进行论述是不够的，应将其回归到更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来认识。为了便于叙述，本文将中国俄苏研

^① 此处用“俄国”涵盖其整个发展时期，包括基辅罗斯以降的各种形态的俄国，帝俄、苏俄、苏联直至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都在其中。下文在使用“俄国”时同样针对着某一种形态或多种形态的混合。有关“俄国”的丰富含义及其在不同语境下各种指称的具体分析参见 Ewa M. Thompson,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0, pp.16-20. 中译本可参见[美] 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5页。

研究的学术历程划分为“中国俄苏研究的史前史”、“起步阶段”、“加速阶段与黄金时代”、“危机阶段”。

（一）“中国俄苏研究的史前史”（从明末清初至民国）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中俄两国很早就相互关注。1619年，明朝万历皇帝曾致函沙皇瓦西里·苏伊斯基，表示沟通的愿望。同样，从16、17世纪开始，沙俄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也陆续向中国派遣外交使团和传教士团。^①这种悠久的人员往来催生了两国对彼此的想象，也促成了中国知识界了解俄国的需求滋长。

早期中国的对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共有两种形式：一种可以称之为“记载”，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传译”。清人对俄罗斯的记载就其资料渊源而言大致有三类：一是图里琛、张鹏翮、钱良择、松筠等直接参与中俄事务处理的官员所写行记或纪略；二是官修书籍及其修撰过程中产生的著作；三是林则徐、姚莹、徐继畲、魏源等江南沿海具有“筹办洋务”经历的官员学者的记述。^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人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在这一阶段的俄国研究中是具有风向标和转型意义的重要作品，其特点在于高度重视域外史料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对中国文献的编撰和考证。《朔方备乘》将此前有关俄罗斯的文献作了一次较彻底的清理，并采用了文献互证的方法，对前人的研究颇多超越，也因此受到清廷关注，其本人也因“通达时务、晓畅戎机”而获擢升为员外郎。^③

至于“传译”，则是在两种不同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是早期因战争和交往的实际需要，二是清中晚期开展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需求。在早期两国交往史中，战争曾是一种特殊的形态，经过两次雅克萨战争和尼布楚谈判，清政府有力地遏制了沙俄的军事滋扰。但由于少有接触，两国在尼布楚谈判之际竟只能使用拉丁语作为中介。此后，康熙帝从两国交往较前密切、往来文书频繁的实际需要出发，于1708年下旨创办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翻译人才，从此开始了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学习。^④至同治年间，1862年京师同文馆正式创立，其中俄文馆于

① 参见 В. Г. Дацыше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Братство святых Первоверховных апостолов Петра и Павла. Гонконг, 2010; Н. Ф. Демцова,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66; 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兰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页；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105、209-282页。

②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63页。

③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264-276页。

④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7-48页。另可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次年设立，从历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人数看，当时学习英语的人数最多，法语次之，俄语居第三。^①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俄文馆的学员已经参与翻译有关俄国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编译的 29 种外国文献中，除法律、数学等学科外，国别和地区研究作品中俄国颇受重视，共计有《俄国史略》(History of Russia)、《中亚洲俄属游记》(Russian Central Asia by Henry Lansdell)、《西学考略》(A Resume of Western Education by W. A. P. Martin, 由俄文馆学生贵荣等译) 数种。而同期关于其他国家的译著仅有《法国律例》(Code Napoleon)、《新加坡刑律》(Penal Code of Singapore)、《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外语原著名称不详) 三种。^②广东同文馆则自 1897 年起增设俄文等三馆，拥有两名俄国教习。^③此后，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于 1893 年在湖北创办自强学堂，设立了专门的翻译处，并与其他外语教育机构作了功能性的区分，即侧重于对商务、铁路、种植、畜牧等“厚生之书”和对西国“治国养民之术，由贫而富，由弱而强之陈迹”的可资参考的文献的翻译。^④在自强学堂，学习俄文的人数一度仅次于日语。从 1899 年该校汉、洋教习名录看，当时的俄文外教最多，共三名，相比之下，专事日语教学的外教只有 1 名，其余两名是担任普通学兼体操科目的老师。^⑤整体看，当时的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学习在洋务外国语学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上海方言馆和台湾西学院没有俄语教学外，其余的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和湖北自强学堂均有此科目，而新疆俄文馆和珲春俄文书院则进行单一的俄国学教学。^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都十分重视对国际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其中就包括对苏联问题的分析和书写，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汇编资料。比如，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东方杂志》设有专门的国际外交栏目，对俄苏问题多有论著。到 30 年代初，几乎没有哪种刊物不谈论苏联，不发表关于苏联问题的文章，其时连篇累牍地刊登苏联研究文章蔚为风尚。^⑦对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思想论战，有学者指出，中国各派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同时，当时的思想界也试图从苏俄的社会改造工程中吸取营

① 其中 1879 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俄文学生为 15 人，1888 年为 17 人，1893 年为 11 人（初级 2 人，高级 11 人），1898 年为 22 人（初级 15 人，高级 7 人）。参见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New-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29.转引自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 85 页。其中 1879 年参加外语大考的俄文学生为 15 人，1888 年为 17 人，1893 年为 11 人（初级 2 人，高级 11 人），1898 年为 22 人（初级 15 人，高级 7 人）。

② 根据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第 103-106 页表格梳理。

③ 高晓芳前引著，第 160、162 页。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北京：北平文化斋刊，1928 年年，卷 100，公牍 15，第 26 页。

⑤ 高晓芳前引著，第 188-189 页。

⑥ 高晓芳前引著，第 230 页。

⑦ 郑大华、张英：“论苏联‘一五计划’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世界历史》，2009 年第 2 期，第 121 页。

养。^①据统计，直接以俄苏为研究对象编纂、译介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俄苏研究作品，或者是编译俄苏学者的国际问题研究成果，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在当时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分量。^②

（二）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中国俄苏研究（起步阶段）

应该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俄苏研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特殊现象，并伴随着中苏关系的起伏跌宕而发生主题和话语的转换。

从 1949 年建国直至 1950 年代的中国俄苏研究与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整体布局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新中国刚刚诞生，极度缺乏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因此此时的研究主要任务是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并相应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及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华态度，明显偏重于实际应用。仅在 1949 至 1952 年的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共翻译出版了 3000 多种苏联出版的著作，发行总量高达 1200 万册，在全国范围内还创办了多种介绍苏联理论和建设经验的译丛类刊物。^③

从机制建设上看，由原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而成的中共中央直属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机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于 1953 年成立，其主要任务被规定为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翻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中央重要文献，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收集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图书文献资料。^④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稍后的 1956 年成立，加上《俄语教学与研究》在 1954 年创刊，《俄语学习》在 1959 年创刊，《国际问题研究》也在同年创刊，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俄苏研究。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新中国俄苏研究的初创期，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指导思想、干部准备上以及对苏东国家知识的掌握上都为中国后来开展苏联东欧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必须强调，本阶段的苏联问题研究是在“中苏友好”的大框架下推进的，多为对策研究，受苏联的影响颇大。这除了是制度上学习苏联的国内需求外，还配合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

① 冯峰：《国难之际的思想界——1930 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思想论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年，第 233-282 页。

② 参见王军、但兴悟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附录 1），第 392-404 页。

③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 1 页。

④ 相关数据取材于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部的介绍，<http://www.cctb.net/zzjg/mlb/jj/>。

的现实需要。^①这一时期的重大学术贡献主要反映在对马列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上。其中,《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从1953年开始,到1959年全部出齐,共38卷(当时俄文版第39卷尚未出版),总计1500万字;《斯大林全集》第1卷于1953年11月正式出版,到1958年全部出齐,共13卷,340多万字。^②

随着中苏“蜜月期”的终结,中共和苏共两党围绕国际形势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分歧日增,矛盾逐渐激化,且日趋公开。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将苏共定为修正主义,并将“反修防修”作为重要政策。相应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和支援世界人民革命。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外国问题研究机构,逐渐地招收专业学生,开设专业课程,正规地培养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在这一阶段,苏联东欧研究所于1964年7月开始筹建,1965年3月正式成立。最初该所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此后不久又归属中联部。此外,为了配合国际范围内的反帝反修要求,其他地区性和国别性研究也有所增加,而苏联在其他地区的政策走向同样是被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学术界彼时不再一味褒扬苏联,大幅减少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介绍,并开始转向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与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60年代末到1978年的第三个十年,中国的俄苏研究并未被文化大革命所阻断,尽管总体而言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但相关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大量以苏联问题为主题的国际问题译著陆续出版。^③但受到当时国际斗争和国内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化”、“片面性”的缺点。^④

整体上讲,我们不能不承认,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俄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缺乏,科班出身的俄苏问题研究人员较少,大多数是从语言和文学研究学科转型而来。从问题意识看,这一阶段的俄苏问题研究因带有强烈的“政治导向”而高度“意识形态化”,“革命”、“反修”、“反帝”等政治话语成为主要基调,不带浓厚价值判断的实证性研究几不可见。从研究范式看,这类研究正是资中筠先生曾尖锐地批评过的80年代之前的政策解释型研究范式:

① 李琮、刘国平、谭秀英:“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第6页。

② 相关数据取材于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部的介绍(<http://www.cctb.net/zzjg/mlb/jj/>)。此外,尽管不是直接的俄苏问题研究,但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也从1955年开始,历时30年时间,至1985年全部出齐,共50卷,总计3200余万字。据笔者所知,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出版了21卷。

③ 相关书目可参见王军、但兴悟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14页脚注。

④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2页。

我国当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对外政策不可分，……专业工作者（其中也包括学者）的任务是提供材料在先，撰文诠释在后，谈不到独立思考。^①

（三）改革开放后“长十年”的中国俄苏研究（加速阶段与黄金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直至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长十年”，是中国俄苏研究的一个黄金发展期。刚刚从文革内乱中脱身的中国俄苏研究界，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俄苏问题的研究中去。冯绍雷教授描述道：

每一个曾经身处那个时代氛围的中国人，都会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的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拼搏精神。从外部环境来看，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已经将如何向外部世界学习的任务放到了知识界和决策界、乃至全国有志人士的面前。邓小平率先访问日本和美国，毋庸置疑地提供了一个向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借鉴和学习的范例，而几乎在同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把对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察和研究作为这一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由于50—60年代的留苏、留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管理精英都处于党和国家以及研究机构的关键岗位上，所以，很短的时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也获得了不少关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变化的新的认识 and 知识。^②

冯绍雷教授的描述道出了80年代的俄苏研究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背景，即中国当时的智识辩论主要是围绕三个国家展开的。其一是苏联，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旧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新的以改革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一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波兰学者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奥塔·锡克、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等人都曾是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座上嘉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议程设置产生过重要影响，广受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和俄苏问题研究界的关注。^③但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进程后，俄苏研究的重心迅速转移到当代苏联的改革问题上，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则成为重要的补充。苏东国家改革的成败利弊对中国改革直接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1）战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系以苏联为楷模建立而来，其基本框架和苏联的传统经济模式

① 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②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5页。
③ 关于东欧改革经验对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影响参见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70、279-306页。

没有本质区别。双方改革的出发点接近，面临的任務相同；（2）双方基本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商品经济均不发达，在深化改革中，都必须把改革和发展很好结合起来；（3）苏东一些国家改革比中国起步早，他们走过的弯路和历经的曲折，有助于中国认识经济改革的内在规律性，避免重蹈覆辙；（4）苏东国家改革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模式，这对探索和选择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模式大有裨益。^①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是最受中国高层领导关注的，也因而被学者所重视。其二是美国，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问题，因为政治敏感性，这些争论多为内部研讨，“自由化”问题在后期成为美国模式的诟病所在。其三是日本，中国学术界对日本问题的兴趣点在于传统与开放的关系平衡问题。如何既迅速地推进现代化进程，同时又不致于破坏本身的传统，不在打开窗户的同时把苍蝇蚊子带进来。整体而言，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国希望能够汲取改革的经验，避免改革方向的误差；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国更希望学习现代科学和技术，谋求在国际劳务分工中的庞大利益；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则希望能够在对西方开放的同时保持传统的延续。围绕上述三种类型的国家和社会模式的讨论，是中国 80 年代俄苏研究的宏大知识语境。当时中国学者尤其关注苏联的经济改革。这种经世致用的态度也是出自于上层的决策需求。当时相关研究人员在接待国务院各部委干部的过程中，后者往往提出希望能够得到“本部门改革可以借鉴的东西”。^②

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在整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性研究机构日益增加，专业性研究学会逐步创建，人才培养机制初步确立。

自改革开放以来，按照邓小平同志有关加强世界政治研究的意见，国内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俄苏研究界也不例外。这一时期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社科院东欧中亚所（因中联部内部机构改革，于 1980 年 1 月起由中联部划归中国社科院）、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苏联研究室（1980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0 年）、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1981 年）、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1984 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1984 年）、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1987 年）等。与此同时，各类研究学会也开始纷纷成立。（参见表 1）

① 参见高铁生、张晶：《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今昔》前言，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年。转引自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世界经济》，1989 年第 3 期，第 86 页。

②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苏联东欧问题》，1986 年第 3 期，第 92 页。

表 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俄苏问题研究学会名录（不完全统计）

学会类型	学会名称	成立时间	首任会长（理事长）
全国性的综合性学会	中国苏联东欧学会	1982	钱俊瑞
全国性的专门学科学会	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	1978	钱俊瑞
	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	1979	余绳武
	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	1980	叶水夫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学会	1981	胡孟浩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1985	陈之骅
	中苏比较文学学会	1980 年代	李明滨
地区性综合研究学会	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学会	1978	不详
	西北地区中俄关系史学会	1979	不详
	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学会	1982	不详
省市级研究学会	吉林省苏联研究学会	1981	李树藩
	吉林省中俄关系研究会	1982	礼长林
	上海市苏联东欧学会	1986	施平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统计所得，不排除受访者记忆失误的可能。

尽管这一时期，研究队伍的扩大仍主要是依靠从历史学、语言学等方向转入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人员，真正接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国际关系学科训练的人士较少，但对于整个俄苏研究界而言，搭架子的战略意义将在今后数十年中逐渐显现出来。

第二，专业性刊物的创设和发行。

众所周知，学术期刊对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尤其是在 80 年代的中国，政府对出版物的管理依然很严格，相关专业杂志较为稀缺。但在这一时期，众多的俄苏问题研究杂志（包括公开发行的和当时的内部刊物）开始创办。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共有 20 多家学术期刊的名称中包含有“苏联”、“俄国”、“俄苏”、“远东”或“西伯利亚”等字样。

表 2 80 年代的中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杂志名录

期刊名称	首次出版年份	编辑机构	备注
西伯利亚与远东	1974	黑龙江省社科院西伯利亚研究所	1974-1980 年不定期，1981-1987 年为双月刊，1988 年起更名为《西伯利亚研究》
苏联与东欧文学	1979	吉林师范大学外语系苏联与东欧文学研究室	年刊，共出版 2 次
苏联与东欧	1980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	
苏联文学	1980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继承自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室（1973-1979）编辑发行的《苏联文学资料》，1980 年更名为《苏联文学》；1980-1981 年为季刊，1982-1993 年为双月刊，1990 年第 4 期起吸收《当代苏联文学》与《俄苏文学》，1994 年更名为《俄罗斯文艺》

苏联问题参考资料	1980	上海外国语学院苏联问题研究室	季刊, 1981年起有总期标示, 1984年第2期起编辑出版者改为上海外国语学院苏联问题研究所, 1987年第5期起开始有国内统一刊号(内部刊物), 1990年起改名为《苏联研究》, 1993年正式更名为《国际观察》
苏联哲学资料	1980	吉林大学哲学系苏联哲学研究室	
苏联文艺	198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79-1980年不定期发行《苏联文学》, 1980年4月起更名为《苏联文艺》季刊, 1981-1984年为双月刊, 1985年改名为《当代苏联文学》
苏联科学与技术	1980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双月刊, 1981年起国内发行并有总期标示, 1988年第5期起由该刊出版
苏联东欧问题	1981	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	双月刊, 1982年第2期起有总期标识, 1992年第2期起改名为《东欧中亚研究》, 2003年更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今日苏联东欧	1981	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	双月刊, 1992年起改名为《今日前苏联东欧》, 2000年更名为《俄罗斯研究》, 季刊, 2007年起改为双月刊
苏联中亚研究资料	198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院中亚研究所	不定期, 1983年改名为《中亚研究资料》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	1981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1981-1983年为季刊, 1984-1992年为双月刊, 1993年起改名为《俄罗斯研究》季刊, 1994-1998年调为双月刊, 1999-2001年重新改为季刊, 2000年休刊, 现已停刊
中俄关系问题**	1981	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	继承《中俄关系研究会通讯》, 1981-1984为季刊, 1985年休刊, 1986-1990为年刊
东欧	1982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	季刊, 1988年起有总期标示, 1999年起改名为《国际论坛》
苏联历史问题	1982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苏联史教研室	季刊, 继承《苏联史译文选辑》, 1989年起有俄文并列题名, 1991年起有俄文要目, 1993年终刊
中国俄语教学	1982	中国教育学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2-1983年为季刊, 1984-1990年改为双月刊, 1991年至今复为季刊, 1993年第3期起由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	1983	中国苏联东欧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辑, 具体出版单位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该刊前身为1979年8月创刊的《苏联问题译丛》, 共出10辑, 从1982年8月起改名为《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1983年不定期, 曾

			一度更名为《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5年下半年恢复现名。1988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单独主办并公开发行。1985-1992年为双月刊，1992年第2期起改名《东欧中亚问题译丛》
苏联历史	1983	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研究室	1983-1984年为季刊，1986年起为半年刊
中亚学刊	1983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	不定期，1984-1986年休刊，有英文目次
苏联哲学	1984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苏联心理学	1984	中国心理学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苏联心理学研究组	年刊
苏联经济	1985-1986	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	1985年出版《苏联经济1983》，1986年出版《苏联经济1984》
研究与借鉴	1985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苏联和远东问题研究中心	季刊，1988年起主办单位改为黑龙江省苏联与远东问题研究中心
苏联社会科学研究	1985	吉林大学苏联研究所	季刊，1990-1991年休刊，1992年曾出1期
远东经贸导报	1988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周报，1999年11月1日起由黑龙江大学单独主办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上海图书馆数据统计而得

从这些期刊的地理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苏联和俄国研究的力量分布以及志趣所在。比如，近一半俄苏研究期刊主办地在北京，其余的分为三个地区，一是东北，包括黑龙江和吉林；二是西北，包括陕西、新疆和宁夏；三是华东，包括上海和安徽。而且各地的研究分工不同，比如黑龙江主要从事对与其接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方面的研究，西北地区则更多以苏联所属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作为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华东地区的俄苏研究的规模在当时相对要逊色一些。最早的期刊是《西伯利亚和远东》，1974年开始发行，其他期刊在1980和1981年开始问世。最早的杂志相当一部分是人文领域的，比如文学和艺术，且当时多以译介为主。最权威的期刊被美国学者认定为《苏联东欧问题》、《今日苏联东欧》和《苏联文学》。^①上述刊物直到80年代中期仍多以内部资料方式发行，在1985年后情况逐渐开始起变化，《苏联文学》和《中国俄语教学》公开发行。此外，当时中国还有许多内部刊物，尽管不都是集中于讨论苏联和东欧问题，但俄苏问题在这些学术刊物上也都有

^① Gilbert Rozman, *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p.439.

相应的阵地，几乎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内容与苏联问题相关。^①

根据美国学者罗兹曼的研究，当时中国学术界每年从俄语资源翻译的资料不少于 500 篇，同时还有不少有关苏联问题的研究作品系从其他语种译介到国内，且多为内部资料的形式。这些材料使中国学者可以及时了解到有关苏联问题的最新成果。1979 年初，内部刊物对于苏联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尚不明显，当时平均每个月的相关作品少于 50 篇，而到 1983 和 1984 年，有关俄苏问题的文章平均每个月都有 150—200 篇左右，过半内容是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大约四分之三被定为“内部参考”。^②同期还有不少图书翻译，大部分为苏联图书，但也有部分译自英文。

第三，研究领域和内容的拓展及研究成果的激增。

尽管仍不时受到时代政治风潮的影响，但整体而言，80 年代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围不再过于政治化，而是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哲学、教育、艺术等各领域拓展。各类作品急剧增加，成绩斐然（参见表 3）。一些有创见的代表性作品开始在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形成重要的影响力，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表 3 1980 至 1991 年中国俄苏研究的论文数及类别调查表

内容	主题词检索				题名检索			
	俄罗斯	苏联	东欧	中亚	俄罗斯	苏联	东欧	中亚
政治·军事·法律	458	9390	1537	99	4218	3353	557	12
经济·管理	222	9667	1949	296	21	3875	721	27
教育·社会科学综合	829	10421	758	524	72	2550	146	62
文史哲	1867	9061	344	715	184	1957	47	78
合计	3376	38539	4588	1634	4495	11735	1417	179

资料来源：安成日「中国におけるロシア（ソ連）・東欧・中央アジア研究」『比較経済体制研究』第 16 号、88 頁。

笔者认为，80 年代俄苏研究是中国俄苏问题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即便是放在全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当领先的。这显然得益于这一时期研

① 最常见的刊物名录如下所示：《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国外社会科学动态》、《国外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参考资料》、《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国外社会主义情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社会学与现代化》、《国外社会学参考》、《民族译丛》、《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外国史知识》、《史学月刊》、《国外法学》、《外国法学译丛》、《国际问题研究》、《外国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外国教育》、《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研究》、《经济学动态》、《外国经济学参考资料》、《外国经济管理》、《计划经济研究》、《现代经济译丛》、《外国经济管理》、《国外金融动态》、《世界经济译丛》、《世界经济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外贸调研》、《财政研究资料》、《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合作》、《世界农业》、《农业经济译丛》、《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动态》、《参考资料专辑》、《共运资料选译》、《国际共运参考资料》、《国际工运》、《中央联络部资料》、《国家体改委资料》等。

② Gilbert Rozman, *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p.442.

究者的功底较好。此时俄苏研究队伍的骨干大致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曾以俄语为第一外语并经过 60 年代国际政治专业训练的前辈学人，另一部分则是 50—60 年代经过全国性选拔的优秀留苏（包括东欧）学生^①。

表 4 中国派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人数变化表（1950—1963）

年度	留学生数量
1950	35
1951	381
1952	231
1953	675
1954	1518
1955	2093
1956	2401
合计	7233
1957	不详（400-500 名左右）
1958	不详（400-500 名左右）
1959	不详（400-500 名左右）
1960	不详（400-500 名左右）
1961	不详
1962	不详
1963	不详
1964	不详
1965	停止派遣
合计	不详
总数	9594

资料来源：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刘克明等人估计从 1951-1964 年共派遣了 8000 多人到苏联留学。^②同时，自 1982 年中苏恢复双边教育领域的交流后，我国派往苏联东欧国家的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多，有的已经学成回国并成为科研战线的骨干力量。^③另据美国学者研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少有 13000 名大学生留苏，也可能有 38000 名左右，这取决于对“学生”的定义。大约三分之二集中在理工科，剩下的以学习社会科学为主。^④

① 关于留苏学生的社会学分析系受冯绍雷教授指点，在此特表感谢。

②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 1 页。

③ 参见文夫：“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苏关系大事记），《世界知识》，1989 年第 3 期。转引自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评述”，第 81 页。

④ David M. Lampton et al. “The Scope of U.S.-China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draft repor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5, Chapter 2.转引自 Douglas P. Murray, “China’s Soviet Studies Programs”,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67-68.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者基本功普遍非常扎实，又是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的受益者，因而具有时不待我的拼搏精神。他们对于经典文献的阅读能力是当今大多数俄苏研究从业人员所难以企及的，而在对所研究问题的把握方面，也因经过历次运动的考验而更显成熟圆润。

此外，特殊的历史时期也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批判意识和自我反省精神，研究态度上十分端正。我国经济学权威刘国光先生 1983 年 7 月发表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了这一因素对中国苏联经济问题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过去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一是因为对苏联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五十年代主要是跟着苏联学而“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研究”，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文革的发生使得资料来源十分有限同样影响到研究工作；二是因为“缺乏一种实事求是地研究态度”，具体表现为学苏联的时候只看到苏联好的一面，在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尤其是文革中则只看到苏联坏的一面，研究工作“往往主要不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分析，而是为了配合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相应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俄苏研究界“逐步纠正了过去在苏联问题研究上的片面性，树立起科学的、实事求是地态度”，因而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①

我国俄苏文学文艺研究大家刘宁先生在《我的学术之路》中的一段回忆也反映了这种认知和反省：

回顾这 50 年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我所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也是弯弯曲曲的，其中不少遗憾和欠缺，也有不少值得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我不像许多我的同时代人一样，由于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中断学术研究去搞一些与学术无关的事情，消耗了大好青春年华，而且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仍然……无法静下心来搞学术研究。虽然这一时期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有些是“奉命”、“应景”之作。选题也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缺乏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深入、持久的钻研精神。^②

刘先生十分谦虚，这是那个时代学人特有的一种气质，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还是以无畏的勇气在俄苏研究领域大踏步前进。

另一方面，80 年代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其实是在和西方类似的条件下进行的，双方都缺乏对苏联东欧问题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可能。美国学界在苏联解体后反思“苏联学”研究的弊端，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术客观性被政治偏见所遮蔽，或过左（对苏联毫无敌意）或过右（对苏联太多敌意）；其二，

① 刘国光：“进一步深入开展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1983 年在‘苏联经济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3 年第 9 期，第 1 页。

② 刘宁：“我的学术之路”，《俄罗斯文艺》，2007 年第 4 期，第 81 页。

苏联区域研究从方法论上看因隔绝于核心社会科学学科而相当脆弱；其三，专家们缺乏对在地语言和历史、尤其是苏联内部非俄罗斯族地区的深度介入；其四，试图在苏联进行深入内部研究的人员遭遇到一系列困难，比如不可靠或干脆缺失的数据、无法获得信息、或者是苏联官员与学者有意无意的混淆信息；其五，职业的、个人的或政治上的竞争使得苏联或东欧移民学者难以保证不偏不倚的立场，使得苏联学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得内在的视角；其六，顶尖学者受到媒体和预言者的诱惑，使得他们无法集中精力于严密的实证研究。其七，对政府基金的依赖使得情治部门或军方可以轻易地设定学术研究议程。^①同时代的中国俄苏研究尽管不是在每一条上都与美国同行有相似的情况，但很多问题是具有共性的，比如对于一手资料的获取，对于在地研究的缺失等等。换言之，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的是意识形态背景。恰巧在意识形态这一点上，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学界具有优势。说句公道话，当克里姆林宫学在西方大行其道之际，中国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并没有被西方拉下多少距离，甚至在某些问题、个别领域还要超出。这是基于曾经的盟友关系以及共同但有分歧的意识形态的趋近解读，在同样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中国 80 年代的苏联问题研究不乏精彩之作。赵常庆先生明确提出当时“与国外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相比，我国的研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水平不在其他国家之下”。^②其原因之一或许正如沈志华教授所说的：“西方人对苏联的理解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隔膜，它们那个文化、那个政治制度跟苏联相差太远。而我们一般都能知道苏联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包含着什么东西，我们能看得懂，因为大家的话语语境是相同的。”^③

从 80 年代中期李静杰出席亚太国家苏联研究的研讨会的情况看，当时中国是国际苏联研究学界的重要一员，完全可以平等地参与国际对话。^④当时，中国学者应邀出国访问和外国学者来华交流非常频繁，仅大型学术交流活动就包括：中美学者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会，中日学者关于苏联问题及关于亚太安全问题和苏联政策问题的讨论会，中英学者关于苏联经济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的讨论会等。^⑤

80 年代的俄苏研究另一个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苏联问题参考资料》在其 1980 年首期的发刊词中明确写道：

① Peter Rutland, “Sovietology: Who Got It Right and Who Got It Wrong? And Why?”, Michael Cox(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p.37.

②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第 92 页。

③ 沈志华：“发现曾经真实的苏联”，《中国改革》，2009 年第 12 期。

④ Li Jingjie and Mei Yan, “Soviet Studies in China”, in Charles E. Morrison and Pushpa Thambipillai (eds.),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89-98.

⑤ 刘克明：“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第 3-4 页。

……试图通过这本刊物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有关政策，以及社会问题作一些探索，并尽可能结合我国四化建设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来选择研究课题。^①

而到 1984 年在北京召开的有关座谈会上，与会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业已形成了“研究苏联东欧问题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等共识，强调俄苏研究学界有责任把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应该采取更加客观的态度，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②

以《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为例，1982 年起至 1986 年左右，苏联东欧问题始终占据了该内部刊物的重要篇章（参见表 5），并且其讨论问题的深度、开放性直至今日重开其卷时仍能体会到当时思想解放的春风扑面而来。无论是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还是苏联模式，无论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凡是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都可以在这本内部刊物上找到相关的讨论。

表 5 《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苏联东欧问题论文篇目变化表（1982—1986）

年份	苏联	东欧	合计	总篇目	所占比例
1982	74	15	89	183	48.6%
1983	56	24	80	186	43%
1984	42	20	62	174	35.6%
1985	44	13	57	168	33.9%
1986	44	17	61	170	35.9%

注：文摘内文章未纳入计算。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所得

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开放同时也是令人振奋的大舞台。尽管表 5 同样透露出一个重要信号，即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征途上，不仅仅有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用于咨鉴，前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同样扮演了重要的参照系作用，并且随着改革的愈发深入而日益受到重视。但不得不承认，这一代的研究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在强烈的问题意识指引下，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资政参考。身处特殊年代的这一代学人善于学习，勇于创新，能够把握好吸收与转化的节奏，懂得意识形态并能巧妙回避意识形态乃至超越意识形态，注意兼听，从而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许，今天的我们

① 杨希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国际观察》发刊 100 期有感”，《国际观察》2009 年第 4 期第 1 页。

② 舒岩：“把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京部分苏联东欧问题专家、学者座谈会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4 年 11 月，第 3-4 页。

显得更加训练有素，也许有不少人对这“长十年”的俄苏研究学者及其作品很不以为然，但事实能够证明这种观点有失偏颇。^①

在追求客观真理和服务中国改革的意识指导下，中国的俄苏研究取得了相当快速的发展。美国学者罗兹曼对于中国 80 年代的苏联东欧研究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指出，一个尚未引起其他国家注意的全新而重要的俄苏研究学派突然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就规模而言，中国对苏联问题研究的出版物仅次于英语。逾 20 家专业性刊物增加了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学术体的持久发展的可能。罗兹曼强调说，中国专家因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度理解而将赢得尊敬。中国的苏联东欧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对苏联文献资源的娴熟运用，对苏联东欧经济改革进程的持久兴趣，以及比较社会主义的宏观视野。罗兹曼甚至乐观地认为，中文可能将会成为研究苏联问题中仅次于俄语和英语的有效工具。^②

（四）后冷战时期的俄苏问题研究（危机阶段）

苏联解体后的两个十年，就中国俄苏问题研究学界而言，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年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部分领域、个别命题上，中国的研究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在于俄苏研究成果爆炸式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方法应用和理论总结的双重失范，从而使得整体上中国的俄苏研究全面落后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西方俄苏研究，甚至面对亚洲邻国韩国研究界的后发式赶超，我们也感到应对乏力。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同样给中国俄苏研究界以深刻震撼。80 年代这一领域研究的繁荣，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以“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经验”作为我国改革的借鉴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意识因为借鉴的对象都瞬间消失而面临重构的难题，刚刚起步的中国的苏联东欧地区研究突然面临着迷失方向的可能。

在短暂的“休克”之后，中国俄苏研究学界很快为苏联解体带来的研究空间而兴奋。如果说苏联解体给西方的俄苏研究带来了巨大挑战的话，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恰恰是冷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种火山迸发式发展的可能正在出现。具体而言，这一学科的新的增长潜力将因以下因素而变得更有可能是：其一，苏联各加盟国纷纷独立，使得国别和区域研究对象增加；其二，过去出于高度保密或蓄意

① 80 年代学术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正在并将继续不断被发掘出来。比如，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2 页；甘阳：“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代序）”，《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1-24 页。甘阳在此强调的是“文化研究”的突出意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各类学科“群起性”爆发的时代。

② Gilbert Rozman, *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p.473.

虚报的社会和经济数据得以问世，档案资料的大量解密，提供了全新的信息空间；其三，俄罗斯本国以及其他国际学术机构大量的数据收集和扩展；其四，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束缚日益淡化。

后苏联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在议程设置上受到了汪道涵先生的影响。汪老在 80 年代初担任上海市领导时就十分关注苏联问题研究。苏联解体后，他又直接推动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理论探讨。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汪道涵先生推动全国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学者相聚于华东师范大学，研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发展演变和历史经验教训，探讨俄罗斯转型期的内外事务走向，也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和推动中俄关系的全面发展。^①据邢广程研究员回忆，1997 年汪老在与时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徐葵谈话时就表示，愿意帮助学会每年在上海召开一次内部学术讨论会，首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即为苏联解体的原因。^②此处应该强调的是，90 年代中期汪老是建议中国俄罗斯东欧学会主办，具体委托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此会，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后又由该中心出面组织。汪老当年所创设的会议机制，在教育部领导、中国俄罗斯中亚东欧学会和各地同行的大力襄助之下，一直得以延续至今。^③

从全国俄苏问题内部讨论会历次的议程看，后冷战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90 年代早期至中期的主要研究命题是苏联解体问题。

——90 年代中期以后至新世纪前期，更多地集中讨论俄罗斯的转型问题。

——2004 年以后围绕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话题进行了多项研究。

——贯穿整个 20 年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特别是中俄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国俄苏研究的增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性研究机构的更名改组和新设进程同步进行，研究队伍继续壮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体制崩溃发生后，中国俄苏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相应地，各地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以及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学会都进行了相应的更名改组。

这一时期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1994 年）、华东师范

① 冯绍雷：“宗师风范”，《老先生》，香港：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第 363 页。

② 邢广程：“长者风范，智者气度”，《老先生》，香港：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第 295-296 页。

③ 参见冯绍雷：“三十年改革开放和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6 页脚注 1。在原有资金用完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自 2006 年起仍然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后又增加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该项年度内部会，同时迄今已先后举行三次全国青年骨干研究人员的高级培训班。

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1999年，次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2000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所（2001年）、北京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2001年）、对外经贸大学俄罗斯与独联体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200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中俄经济技术合作研究所（2004）、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中亚研究所（2005）、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所（2006年）、哈尔滨师范大学俄语教育研究中心（2007）、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2009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2010）、辽宁大学俄罗斯东欧经济政治研究所（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2011年）等。

第二，研究作品数量保持高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2007年间，中国俄苏研究界共出版320种以上有关俄罗斯、东欧和中亚以及苏联问题的个人和集体专著，相关译著超过90种。论文数量则更为庞大。（参见表6）

表6 1992至2007年中国俄苏研究的论文数及类别调查表

内容	年份	主题词检索				题名检索			
		俄罗斯	苏联	东欧	中亚	俄罗斯	苏联	东欧	中亚
政治·军事·法律	1992-2000	8422	8690	2262	727	2838	1048	516	310
	2001-2007	11303	7534	984	1231	1825	1095	188	503
经济·管理	1992-2000	11780	5767	2327	2275	4135	509	630	406
	2001-2007	17615	2863	1337	2147	2767	257	303	822
教育·社科综合	1992-2000	5937	6902	1091	635	1814	719	196	159
	2001-2007	9747	6394	705	963	1200	815	97	327
文史哲	1992-2000	6461	7348	561	950	1315	927	105	194
	2001-2007	10259	7160	473	919	902	1040	65	207
合计	1992-2000	3376	28707	6241	4587	10102	3203	1447	1069
	2001-2007	48924	23951	3499	5260	6694	3207	653	1859
总计	1992-2007	52300	52651	9740	9847	16796	6410	2100	2928

资料来源：安成日「中国におけるロシア（ソ連）・東欧・中央アジア研究」『比較経済体制研究』第16号、90頁。

由上表可见，国内俄苏研究界同仁对苏联问题的关注度在新世纪前后基本持平，若以10年为一个周期，则2000年以来苏联问题的论述将比90年代更多；中亚问题的热度上升，而对东欧问题的关注度明显呈下降趋势。

笔者认为，近20年来的俄苏问题研究，如果单从数量上看，似乎已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如果从定性的角度看，可能除了偶尔局部开花外，退化的势头可能大于进化的态势。以往之大师名家，多半已年老凋谢，学术衰敝之状渐次显现。这20年俄苏研究所谓的繁荣实际上只体现为数量的膨胀，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国际学

术界中日益被边缘化，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也同样日益边缘化，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导致这种“双边缘”格局的现实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发展的大局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路径转向和对外关系重点的变化，使得对俄苏研究的需求日益萎缩。一个可供观察的指标是，中国俄苏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在 90 年代之后急剧萎缩，目前连同 90 年代新创的刊物只剩下不足 10 种。（参见表 7）

表 7 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专业刊物名录

杂志名称	曾用名	创刊年	所属机构	现任主编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苏联东欧问题》 《东欧中亚研究》	1981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	吴恩远
《俄罗斯研究》	《今日苏联东欧》 《今日前苏联东欧》 《今日东欧中亚》	1981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冯绍雷
《西伯利亚研究》	《西伯利亚与远东》	1974	黑龙江省社科院俄罗斯研究所	曲伟
《俄罗斯文艺》	《俄苏文艺》 《苏联文学》	1982	北京师范大学	吴泽霖
《中国俄语教学》		198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利民
《俄罗斯学刊》	《远东经贸导报》	1988	黑龙江大学	靳会新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东欧中亚市场研究》	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	常邈
《转型国家经济评论》*		2008	东北财经大学	郭连成

* 以书代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查资料统计而得。

第二，与形形色色的研究机构不断建立^①相比，中国俄苏研究人才储备不足的弊病日益显现。目前接受俄苏研究训练的中国学者，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语言出身，属于典型的半路出家，对于俄苏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内容了解不多；一种则是其所学外语并非俄语，在政治学或其他学科方面有积累，但对俄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等在地知识知之甚少。这两类人员要在短短几年的硕士或博士学习中，同时掌握语言、历史文化和所在学科的理论架构，实在是非常艰难。

即便仅仅从俄语教育的角度看，像黑龙江等省份，俄语专业的本科生就业形势很好，但这主要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俄边贸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对经贸翻译等从

① 有不少的机构并非实体性的，其科研人员往往分散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从而使得俄苏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缺乏认同感。

业人员的刚性需求造成的，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研究人才储备较前增多。^①

第三，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不仅未能缩小，反而还在加大。80年代相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俄苏研究界，我们的优势地位在俄罗斯急剧转型的背景下重新转化为劣势。可以说，中国俄苏研究学界本可借着80年代与西方同行基本平等对话之势，在冷战结束之后延续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抢占国际俄苏研究的前沿高地。遗憾的是，我们错过了这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80年代的问题仍本着惯性在俄苏研究的轨道上徜徉。

对此，回顾美国学者罗兹曼的评论是有益的。他认为，80年代妨碍中国在苏联问题研究上的全面繁荣，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交流的隔绝使得只有少数中国学者能有机会在苏联进行部分实证性研究。大部分学者不得不采用二手材料，而非一手资料。其二，中国俄苏研究的成果绝大多数用中文撰写，很难让苏联学术界了解和熟悉，也基本上没有作品直接用英文撰写或翻译成英文。其三，当时对内部资料的严格控制也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学术圈和国外（非苏联）学术圈的互动。罗兹曼认为，这些问题也是由历史上承继下来的，至今都没有得到全部的解决。^②

当西方学者，包括日本等亚洲同行，利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信息大爆炸良机作为验证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之际，中国的俄苏研究仍然基本保持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小宇宙状况。^③不仅对于英语世界的广泛材料利用不足，即便是俄语材料的使用也不够充分，鲜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国际刊物上基本上看不到国内俄苏学界的大作。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已有学者以苏联经济研究为案例关注到中国俄苏研究这种不进则退的危险趋势：

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此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工具：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等。可惜，迄今为止，这些工具还殊少用于国内的苏联经济研究中（如果说在国内问题的研究中已经开始了运用这些工具的过程，那么在苏联问题研究中，还看不到哪怕是一点这样的迹象）（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过时的定性描述取代需要定量的分析就成为必然。不论谈到什么问题，经济形势分析也好，增长速度预测也好，消费者福利评价也好，研究者皆“以不变

① 与俄语毕业生需求升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语生源至今还未走出低迷的状态。以黑龙江省为例，2006年该省高考俄语卷数量是7000余份，而到2009年降至5000份，占全部考生的四分之一。参见“人才需求增加生源萎缩俄语人才培养面临窘境”，<http://www.mostgroup.com/html/NewsCenter/20091124/9D2B79445EDBB88E.html>。

② Gilbert Rozman, *China's Soviet Watchers in the 1980s: A New Era in Scholarship*, p.474.

③ 某知名学者2010年夏在出席国际会议期间与作者的私下交流中曾用“一锅粥”来形容当前国内的俄苏研究局面。为尊者讳，此处略去其大名。

应万变”，用体制弊端、结构困难、劳力短缺为“定式”，一、二、三、四地“分析”一番，做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断语。由于缺乏分析不同问题所适用的特殊工具（诸如增长理论用于增长速度的预测，投入产出知识用于结构分析，生产者行为理论用于体制研究）结论难免贻笑方家。不仅如此，计算机模型分析和技术预测的失效，还不时被当做反对采用这些工具的理由。这就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而且是研究者观念的问题了。这里应该指出，国外苏联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用分析取代描述，用逻辑结构取代简单罗列，用定性定量的结合取代纯粹定性分析，意味着研究的进步而不是相反。^①

与其同时，中国本土的俄苏研究刊物至今也没有完成国际化的进程。而赵常庆先生早在 80 年代中期即提出俄苏研究学刊面向海外发行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种刊物可向国外发行，这与我国苏联东欧研究地位很不相称。在我国出版的国际问题刊物中有很多是可以向国外发行的，如《国际问题研究》、《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研究》、《日本问题》等。苏联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刊物《远东问题》也用四种文字（俄、英、日、西）公开向国内外发行。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出版一份可向国外发行的苏联东欧问题专业刊物，这对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扩大国际影响，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学术刊物的国际化是近年来教育部才开始大力推动的方向。上述建议充分表明中国俄苏研究学者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问题是，这一 20 余年前的富有前瞻性的建议言犹在耳，但却始终未能落到实处。

另外一个层面是，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程度明显不足。以 2010 年 7 月底 8 月初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中东欧研究会 5 年一度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为例，亚洲国家中日本有 70 名余名专家与会，韩国学者有 15 名，中亚国家学者有数十名，印度作为学会执委会观察员也首次派出 2 名学者参会，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俄苏问题的学术大国只有 4 名学者到会。在会议组织方专门辟出的“亚洲视角”圆桌会议上，该学会第一副主席松里公孝介绍情况时，将韩国和中国放到一起谈，称中国和韩国共有 20 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显然有保护中国人面子的用意。

第四，如果从学科分野来看，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世界历史等一级学科中，俄苏研究往往因无法提供所谓普遍的知识贡献而在各自所属的学科内得不到认同。

① 王跃生：“走出摇篮——读《今日苏联》谈当今的苏联研究”，《读书》，1989 年第 9 期，第 101 页。

上述种种俄苏研究之现状，不能不令人深感焦虑。如果长期得不到改进，很可能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二、从“苏联学”到“后苏联学”：以美国为例的参照

美国对俄国问题的关注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有关俄国和东欧的学术兴趣可以回溯到 19 世纪，^①但严肃的研究则开始得比较晚。直至 1914 年，美国只在 3 所重要大学中开设了俄罗斯语言与文学课程，而俄罗斯历史只有 2 所大学教授。^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只有少数的专家接受过专业的俄苏研究训练，且主要是为了适应美国国务院培养驻俄外交官和一些媒体培养高水平记者的需要。当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在 1938 年设立斯拉夫研究委员会时，美国学术界并没有对其予以过度关注，也不认为俄苏研究领域有多少前景，更多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直接赋予了美国的俄苏研究强大的活力，并直接影响了冷战期间的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尤其是当时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设立的研究与分析分部工作的数名学者，此后成长为苏联东欧问题研究领域的巨擘。^③

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仍然广受美国公众的普遍关注。加上冷战的铁幕迅速落下，“国家需要”和“国家利益”催生了第一批有关苏联研究的专项课题和研究中心。后来美国学术界将这种俄苏问题研究称之为“苏联学”，指 194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针对苏联内政和外交展开的研究活动，它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是冷战的产物。相当多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官和政府官员投入到这场研究中，创造了大量苏联学的作品和文献。

冷战结束后，世界体系理论的缔造者、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共同撰写了《冷战与大学：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史》一书，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就冷战时期的大学、大学内部的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与美国国家政治，尤其是军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详尽的描述。该书认为，美国冷战期间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度源自二战期间的战时学术安排，即在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国家动员中，知识分子被

① 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苏联东欧研究》，1983 年第 1 期，第 17 页。

② 参见 Cyrillic E. 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hilip E. Mosely, “The Growth of Russian Studies”, in Harold H. Fisher (ed.), *American Research on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徐葵：“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第 18 页。

③ Arnold Buchholz (ed.),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p.11-12.

调集和组织起来。这种战争赋予学术配合政治的合法性在二战结束后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逐渐定型为美国最为稳定的学术界与政府间相互联动与协作的国家科研体制。在一切为了抗衡苏联的前提下，这种特有的战时科研体制直到 60 年代一些大学师生以激进方式表示抵制后方才略有改观。^①

当时，首批成立的是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在二战后的头十年，一批研究生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多在二战期间学习过俄语，也因为曾经常驻过苏联或东欧国家而对这一国别和区域研究深感兴趣，由于经历过二战或者有过其他工作经历，他们对于学习和研究生活更为投入。这一时间段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基本上都成了美国苏联东欧研究或实务的主力。（参见表 8）部分学生后来逐渐升迁至美国派驻苏东地区的大使，部分则成为层出不穷的各项俄苏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则在美国政府内部担当处理苏联东欧事务的官员。坦率地说，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战后头十年美国的苏联研究仍处于一个夯实基础的阶段，总体质量不高，静态研究多，动态研究少，平铺直叙多，理论总结少。但也应承认，其最大的价值和功劳在于收集和积累资料，为以后的“苏联学”的拓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表 8 美国俄苏区域研究研究生就业情况调查表（1946-1957）

（以哥伦比亚、哈佛、印第安纳和华盛顿大学为例）

工作岗位与俄苏有关	人数	占总就业的比例 (%)
教学	84	20
学术或个人研究	53	13
以学术为业总人数	137	33
政府研究部门	50	12
其他政府部门（包括联合国）	112	27
政府部门就业合计	162	39
行政	8	2
商业和法律	7	1.5
新闻业和广播	28	7
非俄苏领域	78	18.5

注：研究生和非研究生总数约 670 人；继续接受研究生训练的学生数量为 75 人；第一份工作情况明了者为 420 人。

资料来源：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65.

科尔顿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发表过题为“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

① 阎光才：“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读书》，2010 年第 10 期，第 36 页。

的演讲，他当时透露：

在冷战开始的最初十年、二十年，当时苏联是美国的敌人，苏联研究是美国国家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印象后来加以强化，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 1957 年苏联的卫星上天，这使得当时美国感到苏联研究更加必要。可以说政府对俄罗斯研究的支持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包括物质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当时的苏联研究，包括现在的俄罗斯研究，在整个学科研究和教育当中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军方、情报部门对俄罗斯研究人才有很大需求，我所指的人才是了解一些俄国的情况并且懂俄语的人。当时美国政府花了几百万美元来翻译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资料，让美国的官员了解运用。后来这些关于苏联的资料慢慢流向民间，让学者加以运用研究。美国当时也建立了一些智库，主要是从事战略和军事研究。当时最著名的是兰德公司，主要研究苏联以及他们眼中的苏联威胁。毫无疑问，这些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个人在 50、60、70 年代经常可以走向政府的高位。布热津斯基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尔布赖特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赖斯曾经也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是苏联俄罗斯研究出身。^①

科尔顿道出了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战后在美国迅速崛起的“公开秘密”，即这显然跟政府驱动有关。

第一，美国意识到，在苏联 1957 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可能会陷入一个被苏联超越的风险，这种恐惧感推动了美国加大对苏联东欧研究的投入，以求深刻了解和理解冷战期间的最大敌手。艾森豪威尔政府借此说服了美国国会在 1958 年紧急通过了国防教育法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按照该法相关规定，美国将对所有地区研究中心进行超过 25 年的资助。^②苏联问题显然是美国外交政策即便不是唯一也是重点予以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经济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除了研究自己的基本学科外，还沉浸在研究作为对手的苏联，包括其语言、历史和文化。

第二，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实施和福特基金会不遗余力的财政支持，从整体上推动了“区域研究” (Area Studies) 作为一门学问的形成和增长。这同样是“苏联学”发展的战略机遇。

“区域研究”受到美国学术界、政界乃至各项基金会的广泛扶持，主要是它的学

①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 年 9 月 27 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由冯绍雷教授主持，笔者为评论人，上海社科院梅俊杰先生担任翻译，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冯冲笔录。

② 於荣：《冷战中美国大学学术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55 页。

术旨趣符合了用西方的方式理解非西方的尝试和努力。为了突破过去局限于欧洲大陆的世界观，同时更是为了适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透过雅尔塔体系建立起的霸权地位，一种结合了国家资源、私人基金和学院体制的“美国式区域研究”开始在美国学院体制中占据显著位置。这种区域研究从被推广伊始就带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主要的重点指向那些阻碍美国试图准备成为世界领导的地区”^①。其目标包括：第一，努力用一种整合的学科融合，而非单一学科甚至是多学科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他者社会。在此过程中，各种专业学科的细化和相互之间的孤立状况将被打破。相应地，知识的整体性将得到展现，由此可以催生新的学术立场、新的洞察力，新的技巧也将会形成。第二，由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框架是基于北大西洋共同体的现实提炼，对其他非西方地区可能并不适用，因此，试图借助区域研究提供非西方世界的信息和比较数据，从而克服美国学者狭隘的地方主义立场。第三，通过整合性的知识尝试去认识、分析、诠释异文化社会，也有助于外部研究者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反省。^②由于苏联体制的特殊性，要认识其本质，了解其运作规律，厘清其利益所在，只能借助于区域研究的方式，而不能依靠传统的分科知识。

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愈加重视对于苏联的研究。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和机构投入到对苏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之中，一批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相继成立，一些大学开设了关于苏联历史和政治的专业课程，各类智库也将其关注点转移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1991年的一份报告总结道：“冷战的意识形态成为推进美国苏联研究的一个重要导因。政府部门成为苏联学专家的重要雇用者。同时，很多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本身从一开始就是来自于苏联东欧的难民。毫无疑问，上述力量的结合快速地推动了这一领域，但同时也扭曲了政策研究的智识议程。”^③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研究苏联第一代政策的专家的来源分析可以彰显出早期美国俄苏研究的两面性：

……对苏联政策的解释，基本上为一批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前共产党人或至少是当年的同路人所独占，这些人对马列主义造诣颇深，而且数十年来一直密切注视着苏联以及国际共运的发展。他们彼此在看法上未必能取得一致，再说他们的见解也不见得都正确。然而，他们毕竟都具有相当的感

① Fersh Seymour H. Teaching of Area Studies, in Lee C. Deighto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The Macmillan and the Free Press, 1971(1), p.261.转引自於荣：《冷战中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第152页。

② Cyrillic E.Black and John M. Thompson (eds.), *American Teaching about Russia*. pp.50-51.

③ Daniel Orlovsky, “Judging the Past, Charting the Future: On Aquariums and Fish Soup”, *Beyond Soviet Studies*, p.7

性认识，使他们对苏联内部的动向、对斯大林及其信徒们的意图，能够把握住实质，能够猜侧到苏联所可能作出的反应。很明显，这批老一代的专家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因此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带有倾向性，而且偏激得厉害。尽管如此，这种偏见丝毫也没有妨碍他们对问题有精辟的真知灼见……^①

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后半期和 60 年代，一批以苏联东欧作为研究对象的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开始在美国学界政界呼风唤雨，其中主要来自布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堪萨斯大学、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研究型高校。

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文学。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从研究范式上看，人类学的路径优势较为明显。这并非偶然。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就是人类学家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该中心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即哈佛难民项目，同样是由人类学家领衔。关键问题是，由于冷战无形的铁幕隔断了苏联与西方阵营，使得研究俄苏问题无法采取象研究法国或者英国那样的方式。为了研究俄苏问题，或者说为了接近俄苏问题的“真相”，不得不更多地采取人类学的方式，即通过某些“线人”、来自苏联的个别社会成员的知识传导。通过这样的研究显然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向的，“非客观性”的一面难以避免。^②同样，由于美国学者当时几无可能赴苏联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在地调研，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很快就被其他方法所挤斥。

上个世纪 60 年代，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淖，并最终在 70 年代初期铩羽而归，这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也影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作为共产主义体制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影响又波及到了苏联东欧研究。这一时期苏美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的推行，苏联社会非斯大林化的展开，苏联报刊相对来说自由度变大，这就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东西方交流特别助理莱西和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扎鲁宾于 1958 年经过两轮谈判后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苏美文化交流协议。此后，此前一直冰封的苏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得以正式推进，许多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可以到苏联进行一到两年的实

① [美]沃尔特·拉特：“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1984 年第 2 期，第 54 页。

② 拉特指出，“一般认为，移民在评价自己的原籍国家方面未必是最出色的评判员。他们缺乏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他们的评价往往带有夸大的成分。苏联移民尤其如此。”参见[美]沃尔特·拉特：“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第 57 页。

地研究，不少苏联学者也有机会前往美国。据统计，从 1958 年到 1985 年底，大约有 2000 名美国学者和 2000 名苏联学者通过相关项目到对方国家访学交流。^①同期，美国在比较政治科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些新观念、新方法、新概念应运而生。^②

在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学术进展两股浪潮夹击下，美国学术界对区域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提出了质疑，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这股浪潮最早出现在亚洲区域研究领域。一些专家在 1964 年召开的亚洲学研究学会年会上提出了如何处理中国研究和传统分科之间的关系。此后，一些杂志也开始刊登区域研究与学科导向关联性的文章。美国的苏联东欧研究界迅速参与了这一场大辩论，开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③一部分学者甚至专门修正对苏联研究的方法，对过去近 20 年苏联研究进程中积累的工具、研究模式开始抱怀疑态度，希望进行修正。有学者公开宣称，是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研究，为研究共产主义体制提供了更具想象力的概念和方法。^④当时出现了对俄罗斯研究、中国研究以及拉丁美洲研究进行整合的趋势。这种整合更多地是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展开。

70 年代时，大批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和部分德意志移民迁居到西方国家，这给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沉寂一时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重张旗鼓，展开了大规模的访谈研究，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1980 年代初，里根政府觉得苏联研究做得还不够，特别是不能深入到很多苏联现象中，因此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整个 80 年代是美国的苏联研究相当兴奋的时期。^⑤1985 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苏联的改革更激起了美国学者的研究兴趣。

整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研究围绕着苏联的政治特征、苏联变革的可能性、苏联政治统治的代际变化、苏联文化及历史等核心问题最终分成了三块壁垒森

① Yale Richmond, Foreword by Marshall D. Shulman, "U.S.-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Westview Press, 1987, p.32.

② Robert A.Dahl,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V.4. December, 1961, pp.763-769.

③ "Soviet Area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Studies", in Frederic J.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p.1.有趣的是，在美国召开研讨会从方法论角度讨论共产主义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时，位于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召开了圆桌会议探寻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如博弈论，是否适用于苏联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参见 Allen Lynch, *The Soviet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3.

④ Robert C.Tucker,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sm",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2, Jan., 1967, p.49.

⑤ 日本学者长谷川毅在《共产主义与国际政治》1984 年第 2 期中曾涉及到 80 年代以来美国大力促进苏联问题研究的种种举措。参见：[日]长谷川毅：“美国的苏联学危机”，《今日苏联东欧》，1985 年，第 2 期，第 64-65 页。

严的阵地：文学和历史研究者集中精力钻研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文化和革命、内战以及二战前后的历史；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者试图理清后斯大林时代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而“苏联学”专家则转变为对苏联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被戏称为“克里姆林宫学”的知识成为这批学者的主业，一门心思放在苏联高层的人事变化、权力斗争等问题上。^①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在整个过程中相对处于边缘位置。在学科导向与区域导向的争论中，二者最终分道扬镳。基于社会科学背景、运用相应理论对苏联问题进行研究，后来被归纳为“套模型”（Model fitting）。极权主义模型、结构功能模型、政治文化模型、发展模型、多元模型、利益集团模型、合作主义模型、政策网络模型、官僚政治模型、主从关系模型等纷至沓来，不一而足。正如王绍光所批评的，这些理论中没有一种是从研究共产主义制度自身运作规律中产生的。基本上是什么理论在学术界时髦，什么理论就会被用于共产主义研究。外来模型也许对认识共产主义制度不无启发，但问题在于，简单地套模型就不免有点粗糙，有点生硬，有点勉强。^②但总体而言，“苏联学”、包括后来的“克里姆林宫学”，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保持了与美国当局的紧密合作，从而确保了对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

但正在“苏联学”处于鼎盛时期之际，苏联突然解体了。整个世界对此毫无准备。除了《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等，基于帝国的成长规律，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对此早有预测外。美国学术界对苏联的解体大多十分茫然。美国研究俄苏问题的专家也是如此。科尔顿教授在1991年9月还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苏联政治的活力”。但正在他向学生们传授苏联体制的超稳定性并强调这一体制的活力时，存续了73年的苏联（含苏俄）一夜之间红旗坠地。科尔顿教授自嘲说，“结束课程讲解后，苏联就不复存在了，这显然很滑稽”。

苏联的崩溃毫无疑问带来了美国俄苏问题研究的危机。按照科尔顿的论述，这场危机从以下几个层面可以感知：

首先，苏联研究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学眼中变得不再特殊，不再受照顾。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迅速进行亲西方的制度改造，进入了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蜜月期。冷战的敌人消失了，意味着美国的俄苏研究界再不能用对敌人的研究的重要性来塑造自己的研究身份。

第二，有志于从事苏联研究的学生人数急剧减少。以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① Daniel Orlovsky, “Judging the Past, Charting the Future: On Aquariums and Fish Soup”, p.8.

②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苏力、陈春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8页。

为例，其成立伊始开设的苏联政治课程有 60 个学生听课，而到科尔顿 1989 年开设这一课程时已经增加到历史上最高纪录的 75 人。但在苏联解体后两年的 1993 年，选修和专修这门课程的学生人数就降到了 25 人。

第三，苏联研究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开始“碎片化”。曾经是有近两亿人口的大国一朝分裂为 15 个国家，连俄罗斯都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遑论其他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碎片化的一些国别研究变成了俄罗斯研究的简单衍生品。

第四，上述演变是在美国整个苏联研究人员代际更迭的敏感时刻发生的。当时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学者在苏联解体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科尔顿感慨说：

我们不知道如何替代他们，也不知道新一代应该继续研究什么。还有就是对社会科学领域做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我们对研究的对象也处于急剧变化之中，用美国的一句话说，我们在追一个本身在移动的目标，其挑战之大可想而知。^①

所以苏联解体后的 10 年时间，基本上是一个美国俄苏研究“失落和反思的十年”。如前文所述，美国学术界曾集中讨论为什么美国的“苏联学”非但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相反却成了西方意识形态僵化的一个源泉。但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建立起“后苏联学”的重要阶段。经过了深刻反思的美国学术界抓住了苏联解体带来的空前机遇，社会科学利用其学科优势迅速地主导了对俄苏研究的议程设置，并利用传统学科的理论强势将“让人迷茫、有时显得矛盾重重”的俄罗斯当作了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新的俄罗斯本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兴奋点。美国学术界当时受到激励，不断研究新的问题，拿出新的模型，设立新的范式，收集新的资料。冷战时期被批评为“套模型”的研究方式，此时因为大量一手资料的获得而具备了证实或证伪的可能，有了用武之地。其中转型理论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到 90 年代末期，美国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产生研究兴趣的学生人数，已经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新世纪以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西方有多少俄罗斯问题的作品问世。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新冷战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倒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火花四射。就这样，“正常化”而非“特殊化”的“后苏联学”在美国学术界成功复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俄苏研究的复活，尤其是政治科学，是付出了代价的，即不得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纯粹的学术根本不存在。英国学者波波·罗对此批评道，在西方，对于俄罗斯的研究日益以政策为导向。大学、研究机构和智库不断

①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苏联”，2009 年 9 月 27 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

向基金机构、政府、多边组织（欧盟、联合国等）以及企业部门寻求资助。为了获得资金，他们需要展示他们的研究是“意义重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的老套。因此，有关俄罗斯这样充满争议和分歧的议题，往往反映出特定的思想、政治、甚至是商业的观点。当今大部分有关俄罗斯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都更注重提出特定的观点（“鼓吹”），而不是进行客观的分析。由于过去几年中俄罗斯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发展，这种趋势得到了强化。^①

三、作为方法的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 一项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的案例分析

如果说美国的俄苏研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②的产物的话，日本的俄苏研究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选择。作为与俄罗斯隔海相望的东亚大国，日本对俄罗斯、独联体、波罗的海以及中东欧国家在内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的研究具有相当雄厚的研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根据日本学者木村汎（Hiroshi Kimura）的研究，按从业专家人数计，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大国，超过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等传统的俄苏研究大国，更不用说瑞典和芬兰这样的北欧国家。^③统计数据表明，最新一期的斯拉夫—欧亚研究人员名录共收录了 1529 名日本国内学者，比 2003 年增加了 30 名。^④与这种积极发展的态势相呼应的是，近年来日本学者在国际俄苏问题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也在递增，每 5 年召开一次的世界俄罗斯东欧研究国际学会会议将于 2015 年在日本举行，这也是该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亚洲召开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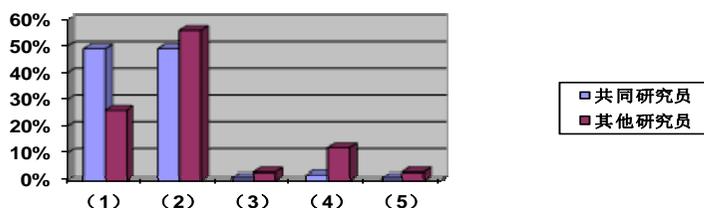
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则是日本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的代表，它不仅在日本国内成为公认的本领域顶级研究水准的学术机构，在国际上也得到了高度认可。调查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该中心的研究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参见图 1）。

① [英]波波·罗：“西方俄罗斯研究方法论”，《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3 页。

② 福特基金会一位主管苏联东欧研究领域的项目负责人盖尔（Felice D. Gaer）曾精辟地披露了这种现象及其严重的后果。参见 Felice D. Gaer, “Russian and Sovie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versity Scene”, (unpublished memorandum), 1980, p.6. 转引自 Arnold Buchholz (ed.),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Financing and Political Relevance*, p.29.

③ Hiroshi Kimura, “Slavic Area Studies in Japan: Features and Tasks”, in (Osamu Ieda eds.), *Where ar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eaded in the 21st Century?*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5), p.49.

④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名簿（第 7 版），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2003 年；スラブ・ユーラシア研究名簿（第 8 版），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2006 年。



注：(1) 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 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 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 不知道；(5) 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一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9年，p.25.

图1 对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活动的整体评价

上述调查表明，如果将共同研究员和其他研究员的数据累计相加，认同斯拉夫中心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的高达 75%，其在日本国内已达到一流水准更是毋庸置疑。本文接下来将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取向为例，揭示其组织学术研究的特点、方法，通过介绍其代表作，以及今后的发展思路等，看看作为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办学经验的缩影，可以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哪些参照和借鉴。

（一）斯拉夫研究中心前史（1953-1978）

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设施（机构）成立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二战前，从日本的总体战略需要出发，作为学术机构的斯拉夫问题研究曾一度被废止，日本国内从事斯拉夫地区研究的学术机构在二战前集体失声。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成立，标志着在日本高等教育体制框架内的斯拉夫问题研究传统得以重新恢复。

早在 1947 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开始在法律文学部中设立俄罗斯语言文学讲座，这也使其成为日本国立大学中最先设立这类研究设施的学府。这一年，执教于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者木村彰一成了该校斯拉夫研究室以及斯拉夫研究设施的奠基人。与其他研究机构较为相似的是，斯拉夫研究设施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独立身份。根据外川继男的描述，此时的斯拉夫研究室不但研究人员数量很少，而且并非一个独立组织。该机构之所以能够诞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教授木村彰一（斯拉夫研究室主任、斯拉夫研究所首任主任）和同为文学部副教授的鸟山成人（斯拉夫研究所第二任主任）想在该校设置从语言、文学以及历史的角度进行斯拉夫研究的场所。所幸的是，当时的北海道大学校长杉野目晴贞以及法学部教授尾行典男同样希望成立一个集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斯拉夫地区研究组织。同时，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也非常乐意向日本国立大学中唯一设立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北海道大学提供成立苏联和东欧研究机构的资助。这三股力量最终催生了

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前身——斯拉夫研究室。洛克菲勒财团在斯拉夫研究室正式成立前向该研究室捐赠了价值约 500 万日元的图书和文献资料，这也成为后来著名的斯拉夫研究中心丰富藏书的基础。

根据笔者对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访谈，尽管现存资料并未详细说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成立背景。但自成立之日起，斯拉夫研究室的功能即已经被确定为以下几点，并成为该机构此后 50 多年发展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多学科研究理念。斯拉夫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是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斯拉夫区域研究。

第二，坚持开放原则组建研究团队。换言之，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成员可以超越北海道大学的范围，面向日本所有高校和从事斯拉夫—欧亚研究的学术机构。

第三，坚持从事纯粹的学术性共同研究。也就是说，有意识地不从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决策研究角度和战略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以学术性为基本导向。

1953 年成立之初，斯拉夫研究室的成员主要是大学内外的兼职研究员，既没有固定编制，也没有固定预算，活动经费全部来自日本文部省下拨的科学研究经费。这种状况在 1955 年改制之后并没有明显变化。当时研究室的正式编制为 1 名副教授和 1 名助手，其余均为大学内外的兼职研究员。

这一时期的斯拉夫研究室学术活动和研究的组织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研究室的管理和运转实行首长负责制，主要由主任研究员负责；每年召开两次教授会议，籍此对研究设施的运转、组织人事和其它重要事项进行审议。由于无法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单独活动，当时斯拉夫研究室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附属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

借助校内外相关专家的集体力量进行合作研究是斯拉夫研究设施成立之初即开始遵循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机构当时的规模非常有限，但仍然从政治史、思想文化、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有意义的共同研究课题：1、关于俄国和苏联社会中间阶层作用的研究（俄罗斯平民主义）（1953—1958）；2、俄国革命研究（1957—1959、1968—1969）；3、俄国社会现代化研究（1964—1965）；4、东欧的联邦主义研究（1965—1966）；5、俄国和东欧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1970—1973）；6、苏联社会的变迁和对外关系（1973—1975）。

从经费来源看，以上所列课题的研究经费主要出自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补助经费。从使用途径看，大部分用于购买必备资料 and 支付差旅费用。从组织形式看，这些共同研究主要通过研究报告会^① 和 1970 年开始组建的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会

① 每年举行两次，与教授会议同时举行，每次共三天。

①进行讨论和发表。从成果载体看，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刊载于 1957 年创刊的研究纪要——《斯拉夫研究》。^②

经过研究人员的努力和日本国内相关人士的帮助，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设施的规模不断扩大，开始逐步完成由虚体化到实体化的转变过程，即由原本的讲座形式转变为研究实体的形式。1957 年设立了经济研究方向，1964 年设立了历史研究方向，1977 年设立了政治研究方向，最终形成了拥有 6 名专职研究员、1 名客座教授和包括法律研究方向在内的 6 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望月哲男教授认为，总体而言，当时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的规模并不是很大，而且也极度缺乏进行持久的合作研究和实地调查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的经费。无论是从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从所藏资料的规模来看，都远远比不上 1964 年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设置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以及 1965 年在京都大学设立的东南亚研究中心等区域研究机构。^③

造成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在各个方面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整个社会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该区域的综合性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在行政上隶属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而非独立研究机构的事实，也是妨碍斯拉夫研究机构成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改善这种局面，1969 年，百濑宏设施长（主任）试图将斯拉夫研究设施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独立出去，并成立新的“苏联东欧研究中心”，这样就拉开了近 10 年的“独立运动”的帷幕。在 70 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斯拉夫研究机构成立 20 年后，经过外川继男和木村汎等历届主任对北海道大学以及文部省的多次呼吁，终于于 1978 年春成立了作为北海道大学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的斯拉夫研究中心。

（二）校内共同教育研究设施时代（1978-1990）

新成立的斯拉夫研究中心采取大讲座的方式，从事文化、经济和政治等三个方向的斯拉夫区域研究，编制规模也扩展为 7 名教授、1 名客座教授和 2 名访问学者。为使中心保持高效运转，特别设置了由专职教职员工和校内文科各专业的若干名教师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事、预算等与中心管理有关事项的审议工作。虽然此时差旅费等中心经费的数量仍然相对有限，但较之于头 20 年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也使得该中心具备了进行合作研究和海外实地调查研究的一定基础。1981 年，北海道大学法学部进行了扩建，扩建后的法学楼中有 3 层分配给斯拉夫研

① 该会成员主要是北海道从事斯拉夫—欧亚研究相关领域的专家，基本上每月都举行研究成果的发布和讨论活动。

② 1957 年创刊的《斯拉夫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杂志，至 1983 年外文纪要创建为止，一直是各种语言的论文混载。这一纪要不仅展示了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历史，也是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变迁的重要资料。

③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 40 年，札幌：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5 年，p.5.

究中心进行研究、管理及图书资料的保存，使得中心办公条件明显改善。

上述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这一时期，在保留合作研究、研究报告会、各种交流会、在其它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斯拉夫研究》纪要等传统的研究活动之外，中心增设了以下研究活动：

1、《斯拉夫研究中心新闻》（1979年3月创刊，第一年共发行3期，随后以季刊形式发行）；

2、《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系列》（1979年创刊，主要刊行研究报告会、各种研究会的报告和讨论集）；

3、《Acta Slavica Iaponica》（1983年创刊，系外文年刊）；

4、《公开讲座》（1985年前为试刊，1986年后每年刊行一次，每次7—8讲）；

5、“铃川基金奖励研究员制度”（1987年开始实行，利用铃川正久的捐赠资金资助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青年学者的访问研究）；

6、“学术交流协定”（与巴黎第三新索邦大学国立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等五个国家的6个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协定）；

7、《苏联东欧研究文献目录》（该目录从1978到1989年为止，每年出版一次，主要收录了《斯拉夫研究》卷目的国内研究文献与信息。1990年以后建立了数据库）；

8、《书籍杂志信息》（主要收集了从70年代以来中心以及国内外的图书杂志和图书馆信息）；

9、“基本图书整備计划”（从1981年起按照当时拥有藏书约55万册的伊利诺伊大学苏联东欧研究中心的1/5的规模，利用特别经费进行基础文献的收集）。

由于访问学者在中心进行长期研究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会议的国际化色彩逐渐增强，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起得到了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国际学术研究经费和驻札幌美国中心的援助之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正是在这一时期，该中心组织的夏季研究报告会多以国际会议的形式举行，一部分成果收录在《研究报告系列》里，一部分收录在外文论文集中。

而以午餐交流会的形式进行学术讨论成为这一时期的惯例。中心的休息室里设置了苏联卫星电视的接受装置，利用该设施，中心研究人员一边观看苏联的新闻报道，一边同来访的外国学者就戈尔巴乔夫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讨论。

望月哲男教授是日本国内研究俄国文学的顶梁柱，他于1986年加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据他回忆，他当时对中心与其它大学文学专业不同的学术氛围深感诧异，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与自己专业不同的外国学者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各类研讨会非常频繁，且大部分研究会不但

使用日语，也使用外语进行。

第二，学术批判精神浓厚。在研究会（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会进行激烈的相互批判。

第三，集体意识和团队意识很强。每周一下午例行的教师会议，有边喝酒边交流的惯例。同时，关于斯拉夫研究中心的预算、人事等管理方面的问题，组织的扩充、研究生院的设想等问题，报告会的日程和研究费的申请，出版物的编辑，以及各种学会信息和海外学者的研究动向、外国学者的接待等与中心有关的一切事务，都经由全体讨论的形式研究解决。“不参与自己专业之外事务的做法在中心行不通”。比如，在访问学者的人选问题上，在从与自己专业不同的 A 教授和 B 博士中选择一位合适的人选时，中心的研究人员被要求根据访问学者提供的申请资料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理念不同，通常下午 1 点半开始的会议到傍晚 7 点还没有结束的事例也不少。望月哲男教授说，这可能使刚到任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感觉不适应，觉得这简直就是中小企业的业务会议。但是现在日本的大学改革要求大学老师具有跨专业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同时具有企业家的创新思想。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感觉还是很怀念的。^①

（三）打造全国核心研究机构的努力

随着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日益扩大以及在日本国内影响力的逐步提高，其发展目标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如果说截止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目标是将斯拉夫区域研究确定为一门学科，同时将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作为研究载体的话，到了 80 年代，加强与日本各专业的斯拉夫研究机构的合作，同时提高中心研究的国际水平，并为此以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确立全国规模的共同研究、共同利用的学术机构，就成为中心孜孜追求的战略目标。

1982 年，伊东孝之担任中心主任期间，斯拉夫研究中心即提出了建立“苏联东欧研究所”的设想。按照伊东孝之的思路，这一研究所的目标是不仅在日本，还应在东亚及环太平洋地区的斯拉夫区域研究领域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伊东孝之呼吁，在充实合作研究、各类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共同研究员制度、资料的收集和共同利用等传统的研究活动之外，斯拉夫研究中心应致力于定期进行海外学术调查、青年学者的实地培训、以国内青年学者为对象的夏季讨论会（seminar），并开展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和研究梯队的建设。他认为，“苏联东欧研究所”应成为以文化、政治、经济等三个研究方向为主体，并设置共同利用部门、信息资料部门和事务部（办公室），拥有教授会议及其他管理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总人数达 42 人的大型学术机

①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 40 年，札幌：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5 年，p.6。

构。要实现这一宏伟的设想，斯拉夫研究中心必须克服研究经费不足和人才不足两大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心在各界支持下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推动日本斯拉夫研究现状的调查。在此之前，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机构已经分别于 1957 年及 1975—1976 年间进行了两次关于日本的斯拉夫研究的专家问卷调查，并出版了研究者名录。1986 年，中心获得了北海道大学教育研究校内特别经费——“对日本的苏联东欧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改进措施建议的基本调查”，利用这一资源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最终编制了包含研究主题、研究成果、所属学会等信息的 1202 名日本俄苏问题研究专家名录。同时，在这一摸底普查前，外川继男、伊东孝之和长谷川毅等学者已经就日本斯拉夫研究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相应的文章进行论述。^①

第二，推动国外斯拉夫研究状况的调查。中心研究人员利用自己的留学经历和同外国研究人员在不同场合进行交流的机会，努力了解国外的斯拉夫研究情况。1987 年，在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国际学术研究课题“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和“西欧苏联东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框架内，木村汎教授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调查，分两次对法国、以色列、比利时、英国、西德、美国等国的共 32 个从事斯拉夫问题研究和教育的机构进行了访问，并对各个机构的特征和未来发展的空间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此前，斯拉夫研究中心负责文献资料管理的秋月孝子已经对欧美的与斯拉夫研究相关的图书馆进行了实地调查。

第三，推动日本斯拉夫研究的研讨。在进行上述调查的同时，中心还定期举办日本全国各专业的专家出席的关于促进斯拉夫研究的讨论会。1984 年 7 月和 1985 年 2 月举行中心研究报告会期间，中心专门组织了题为《我国苏联东欧研究的现状》的学术交流会。与会学者分别对日本的斯拉夫研究与欧美的研究、教育现状进行了比较，并对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后，日本学者又在 1987 年 7 月和 10 月、1988 年 1 月分别于札幌和东京召开了几次关于促进斯拉夫研究的专题讨论会。

在 1984 年 7 月的会议上，长谷川毅提议，建立一个囊括当前所有学会的组织，促进国际交流，有计划地开展梯队建设，促进图书的统一购买等 10 项措施。这些提议后来被称为“长谷川毅倡议”，成为 1987 年一系列研讨会的基础。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87 年 10 月在神田学士会议馆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

^① ТакаюкиИто,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вЯпонии: история, учрежденияипроблемы», *スラブ研究*, №25(1980); Takayuki Ito, “Slavistik und Osteuropa-Kune in Japan”, *Osteuropa*, 33-5,6(1983); ЦугуоТогава, «СлавистикавЯпонии: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еисегоднешнеесостояние», *Обзорение*, 1984, №8; Tsuyoshi Hasegawa, “Soviet Studies in Japan: Histo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Morrison Thambipillai, *Soviet Stud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986.

提出了各专业学术带头人的“问题意识”问题。比如，气贺健三（苏联东欧学会）、佐藤经明（社会主义经济学会）、山口严（JSSEES）、越村勳（东欧史学会）、和田春树（俄国史研究会）、佐藤纯一（日本俄罗斯文学会）、盐川伸明（苏联史研究会）等就学会组织问题；加藤一夫（国立国会图书馆）、秋月孝子（斯拉夫研究中心）、松田润（斯拉夫研究中心）等就图书馆信息体制问题；藤本和贵夫（大阪大学）、下斗米伸夫（成蹊大学）等就教育问题；川端香男里（东京大学）、竹浪祥一郎（桃山学院大学）等就国际交流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研讨会后，与会学者联名起草了两个倡议书——“关于设立斯拉夫区域杂志中心的倡议书”、“关于基于日苏文化交流协定的政府留学生交换制度的倡议书”，并提交相关政府部门。

随后，在1988年1月斯拉夫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伊东孝之提出了设置“日本斯拉夫协会联合会”、“斯拉夫区域文献中心”和“斯拉夫区域杂志中心”、日本斯拉夫学委员会以及开设“国际交流窗口”等四项措施，作为改善日本斯拉夫区域研究的主要方法。他同时提出，为了实现这些措施，需要强化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的职能，对中心进行根本上的体制改革，使其成为全国性的研究设施。

中心的这些活动得到了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当然，这也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举世震惊的变化分不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扩大了日本一般社会人士和普通学生对斯拉夫区域的关心，同时信息的多元化、实地研究可能性的增加、国际交流的进展、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也迫使斯拉夫研究中心对现行研究体制进行根本变革。

在这一阶段，由于与斯拉夫国家的文化学术交流的障碍被打破，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日本在斯拉夫研究领域的封闭性，资料收集的延时性，研究机构与学会之间交流的缺乏，教育研究的专业与对象区域的不平衡性，即偏好某一地区的研究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非日本所独有，但相对于积极引进苏联东欧地区的专家学者、招收当地学生、大规模进行资料搜集的欧美各国学界而言，日本的研究体制仍然显得较为僵化。在此背景下，在日本建立全国规模的研究、信息收集、进行国际交流和专家培养的研究中心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为了改变上述不利状况，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每年都向日本政府提出拨付改制经费的请求，最终于1990年6月在原晖之出任主任期间，斯拉夫研究中心成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

（四）作为全国共同利用设施的斯拉夫研究中心

重组后的斯拉夫研究中心下设地域文化、国际关系、生产环境、社会体制等四个方面的研究部门和信息资料部门，以及事务部（办公室），同时还设立了审议组织人事、预算等相关事宜的协议员会（校内组织）和审议研究各种课题计划的学术委

员会（成员包括校外的各界代表）。1993年在皆川修吾担任主任期间，中心增设了民族环境研究部门，编制增加为11名专职教授、3名客座教授、3名访问学者、1名信息资料部副教授、2名助手、3名事务部（办公室）成员。1994年研究中心所在办公楼进行了改扩建。

利用这次改制，斯拉夫研究中心开展了新的研究活动，加大了国际化方面的投入和努力。1990年同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部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同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约定每年互派学者到对方访问。同期该中心还与法国第三新索邦大学国立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延长了于1983年9月25日签署的共同研究协定，与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签署了新的合作协定。^①

中心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考评工作。1991年起，该中心通过由专职教授和外部评论员组成的专职教授讨论会（Seminar）的方式来考查中心研究人员发表的各类论文，并对其相关的学术活动进行考核。这一时期，斯拉夫研究中心成为日本文部省管辖的全全国性研究组织“文部省所辖及国立大学附属研究所主任会议”的成员。在该组织内部，成立了专门讨论斯拉夫研究中心存在的问题及同其它研究机构进行合作问题的平台。从1993年开始，对中心的研究活动进行综合考核的自我评价体系确立起来，并且每两年发表一次自我评价报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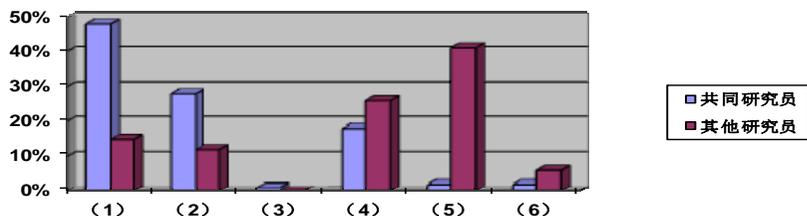
日本的斯拉夫研究现状问题的讨论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延续。1992年2月冬季报告会期间，在伊东孝之主持下，由川端香男里、木户蓊、和田春树和佐藤经明参与的题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我国的苏联东欧研究：反思和问题”圆桌会议上，从苏联解体后的角度对日本的斯拉夫区域研究史进行了反思。会上，伊东孝之提出了信息系统欠缺等体制问题，长期以来日本存在斯拉夫研究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对象设定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及研究方法论的僵化等问题。

1994年，作为斯拉夫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以原暉之为总主编，共8卷的斯拉夫区域研究论文集《“斯拉夫世界”讲座文库》由弘文堂出版发行。共有105名学者参与了该论文集的编撰，这是日本最早的综合介绍斯拉夫区域的文献。

1995年，以皆川修吾为课题负责人的3年重点领域研究项目“斯拉夫—欧亚的变迁：自存与共存的条件”开始启动。该课题有数十名专家和10余个研究团队参与，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现状与历史进行分析。这个综合性的区域合作研究在展示斯拉夫世界现状的同时，也为中心今后的发展和

① 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の40年，札幌：北海道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5年，p.153.

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得到了日本国内学界的高度评价（参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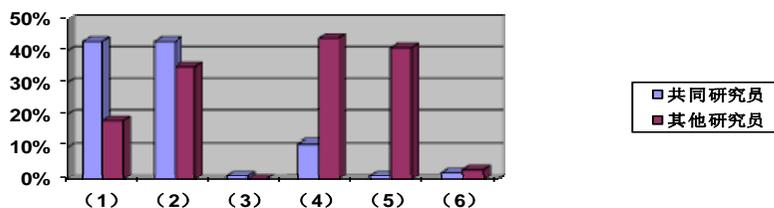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一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9年，p.26.

图2 对皆川修吾重点研究领域的评价

1995年，中心成为日本文部省“核心研究机构支援项目”的支援对象。从此，中心开始利用“提高研究水平经费”、“访问学者经费”、“非常勤研究员经费”等，开展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活动。

中心作为核心研究机构得到日本国内各界的公认。特别是中心举行的国际会议，在主题的选定、报告人的遴选、会议的组织等方面得到了国外与会学者的好评（参见图3）。有关情况被刊登在欧美相应的学术期刊上。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一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9年，p.26.

图3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夏季/冬季国际会议的评价

尽管如此，斯拉夫研究中心自我评价认为，当时的中心管理与研究活动的方式还没有完全达到理想的状态。尤其是考虑到斯拉夫—欧亚世界的辽阔幅员，按照区域的综合研究理念，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部门的组成及编制，无论是从专业方面还是从个别的研究对象区域来说，都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五）新世纪以来的斯拉夫研究中心：朝向世界一流的目标

新世纪以来，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进入了一个新的加速发展阶段，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国内斯拉夫研究的领先地位，同时逐渐增强了在国际斯拉夫学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从2000年开始，中心在北海道大学文学专业框架内进行研究生教育，开设了历史区域文化化学专业。2009、2010年度共有17名博士研究生、15名硕士研究生在读。而且，斯拉夫中心培养的研究生来源非常国际化，除了本国学生外，还有来自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捷克、韩国、蒙古、新西兰和巴西等国的学生。

2003年，斯拉夫研究中心在日本文部省举行的21世纪卓越研究机构计划（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的选拔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该计划2003至2008年度的基金资助。斯拉夫研究中心申报的课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野心”的研究计划——“斯拉夫欧亚学科体系的构建”（Making a discipline of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Meso-areas and Globalization），设定目标为“在欧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新历史环境下为振兴和推动国际斯拉夫区域研究作出贡献”。

2008年，中心获得了日本文部省新学术领域研究重大课题“欧亚区域大国的比较研究”（2008—2012年度）项目。这也标志着斯拉夫研究中心研究范围的日益扩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苏联东欧地区，而是将中国、印度乃至土耳其等大欧亚地区的国家都纳入研究之中，试图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进行地区层次的剖析，通过本项研究对国际秩序、世界体系等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对帝国的崩溃和重组，以及对民族纠纷、宗教对立等影响全球格局的地区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2009年，中心再接再厉，现任主任岩下明裕主持的“边境研究核心机构的养成：斯拉夫—欧亚与世界”研究课题入选日本文部省全球卓越研究机构项目（GCOE）（2009-2013年度）。该课题计划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全国性的边境问题研究学会，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形成竞争力。

2008年，松里公孝教授主持的青年学者国际培训计划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2008—2012年度的资助，打开了日本北海道中心一直呼吁的加强日本斯拉夫研究国家化和培养青年学者的构想的新途径。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的斯拉夫研究尽管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局限于日本国内层次，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公开展示非常有限，尤其是用英文撰写的一流论文严重不足。^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① Hiroshi Kimura, “Slavic Area Studies in Japan: Features and Tasks”, in (Osamu Ieda eds.), *Where are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Headed in the 21st Century?*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5), pp.49-51.

斯拉夫研究中心借助上述计划，每年从日本国内选拔 3、4 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包括博士后和讲师），赴欧美一流的斯拉夫研究机构——如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访学，加强学术素养。

2009 年 6 月 25 日，斯拉夫研究中心在全国共同利用设施的基础上又被认定为共同利用·共同研究机构（2010—2015 年度）。

2010 年，斯拉夫研究中心继续进行体制改革，原先的管理委员会被改组为机构管理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前者作为中心主任的咨询机构，审议中心的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各项活动；后者负责审查中心进行的各种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招投标工作。

整体而言，斯拉夫研究中心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2009 年 2 月，该中心组织召开了东亚首届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会议，来自中、日、韩、俄、美、蒙等国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俄罗斯的振兴及影响问题。同年，日本获得 2015 年俄罗斯东欧研究国际学会 5 年举行一次的国际会议的举办权。这也是此类会议首次在亚洲地区举行。

（六）“北海道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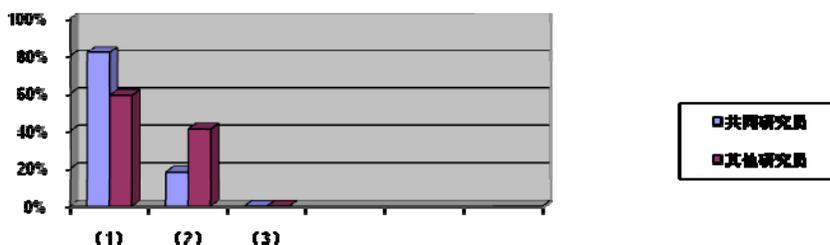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成功给中国的俄苏研究和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学术绝对优先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从成立伊始即将此视为一条不可撼动的基本原则。50 多年来，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斯拉夫研究中心由弱变强，最后成为东亚最佳、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斯拉夫区域研究机构。与此相比，我们国内的斯拉夫研究，尤其是俄苏问题研究，仍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客观性有所不足，特别是一些现实问题的研究往往揣摩上意，实际上不利于科学决策。

第二，坚持微观研究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秉持了日本学术界一贯的扎实风格，对于一手资料的占有尤其关注。在进行各项研究时，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调研和田野调查，从而确保了对研究课题的深度把握，不至于空洞无力。比如，松里公孝教授在做后苏联空间内的“不被承认的国家”现象的研究时，为加深对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研究，数次深入到当地走访民众、学者和政府官员。这种做法在日本学者中较为普遍。

第三，坚持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就已经逐步重视国际化，国际学术交流日渐频繁，在海外发表的文章数量也逐渐增加。即便如此，日本学界仍然有着严重的危机感，认为甚至与韩国相比，日本的斯拉夫研究在国际论文的发表指标上仍有差距，并试图改善这一局面。这也是斯拉夫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青年学者国际培训计划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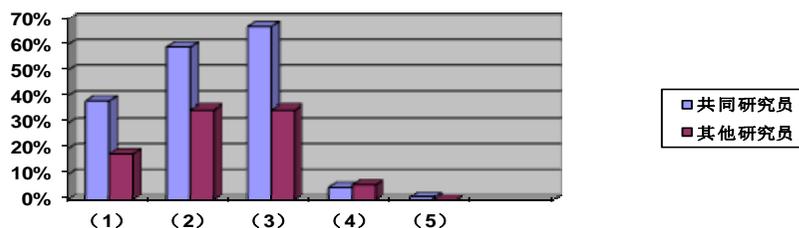
第四，坚持跨学科、多语言研究的研究路径。多学科、跨学科和比较研究始终是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法，这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思路不谋而合。但在多语言的要求方面，我们显然与该中心有较大的落差。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至少要求精通英、俄两种语言，不少青年学者甚至通晓3—4门外语。这也是确保其国际交流无障碍的基础。为提高英语表达和写作水平，该中心每年都组织为期两周的讲习班，聘请外国资深教授讲解英文表达的技巧。在这一方面，中国学术界有必要参照“北海道经验”。



注：(1) 使用过；(2) 未使用；(3) 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9年，p.31.

图4 斯拉夫研究中心资料（报纸/杂志/图书等）使用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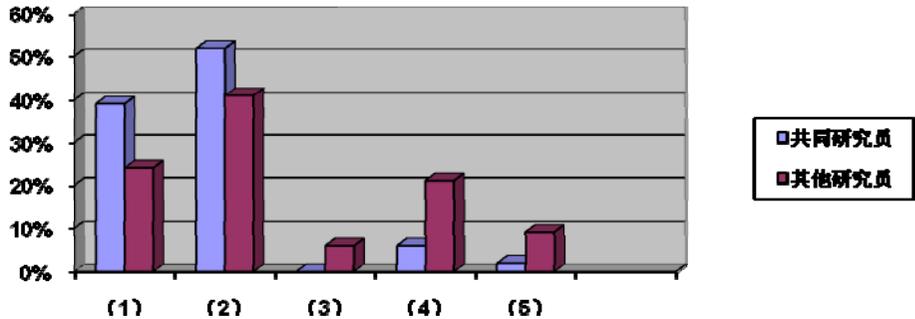
注：(1) 报纸；(2) 杂志；(3) 图书文献；(4) 其它；(5) 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9年，p.31.

图5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资料使用类别的评价

第五，坚持资料优先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具有丰富的藏书。截至2009年，约有15.7万册图书、6万份缩微文献、1600种报纸和期刊出版物，其中含有大量有关俄国革命、日俄战争、共产国际问题的珍贵史料，以及以乌克兰语言学为中心的大量斯拉夫文献学的资料等。同时，截至2008年，中心还收藏了5144份西方出版的有关斯拉夫问题的博士论文。斯拉夫研究中心对研究资料的重视使得他们的研究

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些文献资料也为来自日本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专家提供了便利，得到了高度评价（参见图 4—图 6）。



注：（1）达到国际一流水准；（2）达到日本国内一流水准；（3）改进后有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4）不知道；（5）无回答。

来源：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を研究する，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点検評価報告書（外部評価），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999年，p.32.

图 6 对斯拉夫研究中心所藏资料的评价

与该中心相比，国内尚没有任何一家学术机构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研究资源。所以有必要继续增加在这一方面的资金支持，扩大图书资料的占有量，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础条件。

第六，坚持开放性的原则。斯拉夫研究中心所有课题的组织均是通过全日本范围内的专家合作网络实施的，这一方面确保了研究的高效，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日本斯拉夫研究界的团结，提高该中心的影响力。斯拉夫中心每年为来中心访学的日本学者提供一周左右的费用，供其查阅和使用中心资料。同时，斯拉夫中心坚持严格的考评制度，对考评不合格的人员予以辞退，“有进有出”既增强了机构的活力，也迫使所有研究人员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第七，构建强大的辅助班底。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活动非常频繁，但并不紊乱，这与其配备的强大办公室班底有很大关系。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人员均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而博士后制度以及 COE 项目研究员制度的推行，也确保了中心始终有 3、4 名高学历的青年研究人员参与学术活动的组织，极大地节省了专职教授的时间与精力，使专职教授可以更加省心省力地开展学术研究。

总体来看，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中国同类型的学术机构提供了宝贵的“北海道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需要尽快地提高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

的水平，争取尽快与国际学术前沿进行同等级的对话。

四、他山之石：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智识革命

通过前文对中国俄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对美国苏联学的产生、后苏联学的复活的剖析，以及对亚洲邻国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研究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透过比较的视野清晰地看到一门针对一个大国及其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何以兴何以衰，而最终目的则是试图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发展建言。

显而易见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的诸多变化中，除了国家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外，文化、文明以及其他范畴已经或正在或行将纳入研究视野。而苏联解体以来各种被发掘出来的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宗教、历史、艺术资料，不仅在挑战我们过往的知识、工具和方法，也在丰富着我们此后的视野、理论和领域。因此，在中国俄苏研究的学术转型中，必须要从视野、资料、工具、方法、范式上作出重大变化，逐渐进入前人所未涉足的新领域，以超越前人的治学方法，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周边邻国在俄苏研究问题上的新挑战，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范式重构和智识革命，即在全新语境、全新时代背景之下，对俄苏研究从方法到知识提出全面的中国式回应。为此，我们的俄苏研究界首先应该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在过程中努力克服下文将详细说明的几组张力阻碍。

（一）“退出苏联”的宏大背景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先生不久前撰文提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一个“去苏联化”的进程。^①沈志华教授与左凤荣教授联合为《中国改革》撰写的文章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②这个观点无疑很有道理，但还有加以补充的空间。实际上中国在中苏冲突过程中已经逐渐和苏联模式拉开了距离。不仅仅是相互关系上，国外学者曾有论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没有像苏联那样牢不可破。^③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程则很难用“去苏联化”来简

① 李凤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苏联——读《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1期，第26页。

② 沈志华、左凤荣：“改革即去苏联化”，《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合刊，第211-214页。

③ 比如，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茨·舒曼则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撰写专著论证了中国和苏联政治体制的差异，尤其是有关毛泽东时代摆脱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论证较为精彩。关于这部分内容可参见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36页。

单地加以概括，这其中包含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容。用冯绍雷教授的话说，“这是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在全球化的崭新条件下不光是重获生机，而且是重新立足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过程；这是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人类先进文明在中国这样复杂背景之下的大国得以具体化为革新体制的伟大创新过程；这也是一个国内体制变迁与外部国际环境互相激励、互相影响之下的一个互动的学习进步过程”^①。

当然，“改革即去苏联化”的观点有一点是很值得推崇的，即它点出了中国 1978 年以来日益明确的“退出苏联”和“进入世界”的两大任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兹曼曾撰文指出，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俄苏研究界并未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中国的改革仍然希望从中汲取养分。^②前述赵常庆教授关于中国俄苏研究期刊的情况介绍中也披露了当时中国高层对于学术界提供苏联各领域改革相关资讯的期盼，这样从反面证明了“退出苏联”至少在 80 年代中期前还没有成为一个定论。苏联模式的某些内容我们在批判，但同时在改革中我们既是摸着石头过河，同时也在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为参照拟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议程。所以，中国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全球化，进入现代性，进而开始融入世界的过程是在 90 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至少在经济上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学术研究也快速地逐渐完成了“退出苏联”的书写，尽管现在还有一些痕迹，但已经不甚浓厚了。但同时要注意的是，我们似应避免将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史进行“格式化”论述：从最初的“以俄为师”到“兄弟之邦”，到谁是正统的“社会主义”之争，再到冷战结束后的中国优越论，以致到近来出现的所谓俄罗斯“以华为师”之说。这种模式化叙事的背后，是一种所谓中国“超越”俄罗斯的缺乏根据的乐观主义和某种程度的自大主义，忽视了俄罗斯发展的独立人格。也因为如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重新认识”俄苏问题的基本智识系统和心智结构的需求。因为我们以往对于俄苏问题的很多看法，以及根据这种看法而形成的种种对策思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重新检讨。有的观点、看法甚至已经固化，比如曾经相当长时期内“俄罗斯不行了”的论断非常流行，但事实上未必正确乃至根本就是错误的。^③

① 2008年在申请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课题委托项目《中国改革与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时，冯绍雷教授对本课题学术意义的修改定稿中的相关表述。

② 参见 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es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笔者自 2003 年起开始使用常喆、卢冠霖、陈扬等笔名为《环球时报》等媒体撰写评论或深度不分析类文章，当时遇到的一个极为困惑的问题就是要不厌其烦地向责任编辑解释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糟糕。2003 年笔者开始使用“重新崛起”描述当时的俄罗斯发展态势，但这种立场至少彼时在媒体看来多少有些“难以想象”，当时主流的描述仍然是磨难重重的“颓势”

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被“世界”体系外在化，所以中国人“加入世界”的愿望分外迫切，相关的争论和建言不绝于耳，这可能也是一个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日益“退出苏联”的非常有特殊性的学术氛围。尤其是在中国连续 30 多年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话语环境很大程度上不是是否崛起的思辨，而是已经转换到如何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①在这种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国显然比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更迫切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更希望东方文化的复兴。与这种中国“进入世界”的渴望相比，同时伴生的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排斥和畏惧。这一语境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俄苏研究，使得很多研究伴随着对俄苏问题一厢情愿的诠释或过度诠释。

其实，今天中国俄苏研究所要关注的问题，和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都要求关心下列问题：一是世界学术潮流如何？二是中国在此学术潮流中的位置如何？三是在弄清世界文化发展阶段和现代思潮的走向，并将中国智识与世界潮流进行对比，探寻一种合适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现代世界思潮之轨，并逐渐将其融入世界文化之流。^②

（二）中国俄苏研究范式转换和智识革命的战略机遇

尽管中国俄苏研究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仍然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的俄苏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如果不抓住这次机遇，我们在国际知识界的竞争之中将会非常被动。

这种机遇期首先是和中国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界所面临的机遇是一样的。经过 80 年代的译述、90 年代的发展、新世纪在危机感刺激下的追赶，我们确实有面临平等参与国际对话的可能。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可以跳过一些历史的厚重积累，在最近的话题中与西方学者同等竞争。国际体系的转型、欧亚大陆的巨大变迁、俄罗斯自身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崛起等等都为俄苏问题研究的知识系统变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我们有机会创新，我们有机会迎来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只要能够敏锐地发觉冰山的另一面，就有可能建立起中国在国际俄苏问题研究领域的话语体系。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特质。新的俄罗斯让人迷茫，有时显得矛

俄罗斯形象。事实却是，俄罗斯变了，而且当时在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变化着，但我们由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对俄罗斯的表现变现出一种无知乃至偏见。

① 时下对于“中国模式”、“和平崛起”的各种讨论已经不绝于耳，相关的评论、论文和图书可谓浩如烟海。

② 相关表述见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 1 卷第 1 号，第 1 页。转引自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第 86 页。

盾重重，往往是非常规的发展。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它本身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兴奋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研究新的问题的过程中，拿出新的模型，设立新的范式。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的极大丰富。科尔顿曾经讲过，美国人一开始做苏联问题研究时，得一个一个地访谈，冷战期间为了获取丰富的资料，美国政府花了许多经费，动用了许多人力资源。而我们现在处于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丰富的资源。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都订购了各种数据库，各种分析文章铺天盖地，俄罗斯问题的文章同样多如牛毛。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为例，我们花了相当多的经费购买了两个专业的电子数据库，每年还至少拿出 10 万人民币采购最新的俄苏问题研究纸质资料。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我国俄苏问题研究界的代际转化。年轻一代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在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更为自由的学术环境、更为广泛的学科背景下不断成长。我们站在前辈巨人肩上，没有理由不做的更好。

这种机遇期还在于国内俄罗斯研究学科的现状。无需讳言，俄国问题研究同其他国别或地区研究相比，或者同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相比，我们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地位。可能是因为研究的人员少，研究得不够深入，俄苏问题才会有无数的题目可做，才有无限的发展空间。^①

（三）在克服张力过程中实现涅槃

机遇总是垂青于有所准备的人。中国的俄苏研究界仅仅看到这种机遇还不够，更关键的是要克服长期存在且不仅仅在中国出现的一些张力障碍。

1、学术/政治（问题/主义）

中国的俄苏研究当前最重要的一组张力就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主要表现为把政策价值当作判断俄苏研究的核心乃至唯一的判断标准，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决策层出谋划策，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价值。

应该注意到，中国俄苏研究的体制背景并非这门学问所特有，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并不是一切问题都出自作为个体的学者的研究。^②梁启超曾经说过，“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③

① 2008 年 4 月，外交部时任副部长、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冯绍雷教授和笔者，听取我们汇报了俄中心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未来的设想。他反复强调一点：研究俄罗斯问题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②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第 379、384 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 38 页。转引自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 页。

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这一状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王逸舟曾经形象地将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圈的特征称为“基辛格症候”，即“一个国际政治学者的权力背景（或者说与权力的联系渠道）越明显有力，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越大，在学界和政界的地位也越高”。^①资中筠先生对于这种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咨询的现象同样有过精妙的论述：

……再从高层次上讲，开放以来的美国的“思想库”体制对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这刚好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当政者出谋献策而被采纳的学问才算“有用”。……

……至少有一点，他们的（指美国的“思想库”，引者注）实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论自由、多家争鸣的基础上的，方面很广，学派林立，与现行政策相左的论述也可以广为传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证明其正确。这一条件在中国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实用层面，“思想库”的作用也变质为与“注六经”差不多。不过在这一风气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彀，正好符合“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给独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间就更有限了。

李永晶博士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指出，至少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性格，它们不过是出于特定功利与现实目的的政治活动。^②

很明显，这种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以政治取向代替学术分析的做法并不仅见于中国的日本研究，它同样阻碍了中国俄苏研究的深入和学理的发展。当然，出现当前的局面决不仅仅是学者的问题，也因为需求方的引导，久而久之，反而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③正是改革开放打破了政府力量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经济的全面计划，正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隆重登场，正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应用型”研究的“路径依赖”。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学者的我们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说真话，而不能随波逐流。我们最迫切的工作可能在于回归学术性研究。如果说学术研究要为政治服务，那也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和事物本质的研究才是有用的研究，才符合国家民

①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② 李永晶：“告别‘对日工作式’研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0月31日。

③ 包括俄苏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不景气在学术圈内多被归咎于学术界和学者本身的“学术文化”，但实际上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绝不能忽视。可参见唐世平、张洁：“中国东南亚研究现状：制度化阐释”，《当代亚太》，2006年第4期，第9页。笔者对二位学者有关制度性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不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可能忽略了学者独立人格的重要性。确切的说，是学界/学者与政界/政客双方紧密的有意识地互动和中性含义上的互相“利用”造成了当前异常复杂的“政—学关系”。

族的最高利益。那种“注六经”式的“研究”，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往往会产生误导的作用。现实的需要与政治的正确性，并非绝对意义上决定学术价值的基本尺度。西方世界的俄苏研究，无论是冷战期间，抑或是冷战后，的确有一部份研究（这部分研究直接对应于我们定义的“政策解释型”和“政策建议型”研究）是在意识形态对立的驱动下进行的。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多数俄苏研究作品还是尽量秉持了韦伯所孜孜以求的“价值中立”原则。^①学术和政治之间诚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价值中立”可能更多是一种永远无法企及的理想状态，但作为学术人，我们仍然应该遵循应有的学术底线。或许，可以将对策或战略研究与学术研究区分开来，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使得学术成为政治的从属。

比如关于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论述。这是一种政治性论述，中俄关系友好是大局，成就是主要的，这些都毋庸置疑。但这种表达不应成为一种学术性证实的命题，更不能将其视为不能挑战的公理，不应该成为一种中俄关系唯一的叙事模式。学问之道在于寻求问题。笔者相信，所有提出问题的学者都是出于对中俄关系的爱护，出于对中俄关系未来继续向好的一种期盼，这恰恰是一种负责任的爱国立场。中俄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成就可以由官方作充分总结，而学者的责任则要求我们对存在的问题作深入分析，否则讳疾忌医，积累的问题可能某一天突然爆发。

比如所谓“‘中国机遇论’在上升，‘中国威胁论’在下降，机遇大于挑战”等等习以为常的表述，其实是罔顾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从来都是很有影响力、很有市场的。笔者曾经在 2004 年至 2006 年，以两周为一个周期，对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做过统计分析。基本上，只有在两国领导人互访前后较短的时间内，俄罗斯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较多是正面的，其余时间负面报道最少占 30%左右，最高时可达到 70—80%，至少说从媒体以及大众视野看，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切实的存在，尽管这可能根本与俄罗斯精英的中国观截然不同。

坦率讲，中国的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虽不敢说与西方并驾齐驱，但至少是一个相距不远、可彼此平等对话的境况，甚至在某些问题、个别领域还要超出，确实不乏精彩之作。尽管其时的研究目前看来同样具有“奏折化”等特征，但这一代学人追求真理的精神、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使命感，乃至对所从事研究工作的热情，都是当下所不及的。唯因如此，美国学者罗兹曼才会对中国当时的苏联问题研究表示了高度的赞扬，认为西方不应忽视这一庞大研究群体的研究成

^① 这种“以学术为业”的情怀，可能更多是一种理想类型，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似乎无法真正对政治无动于衷。科学家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还要以事实为据，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这大概是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了。参见阎光才：“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第 37 页。

果。^①而当前社会浮躁已经或多或少感染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其走向，而有关的一些政策措施，实际上助长了这种不良趋势。

应该认识到，崛起的中国，不能仅仅是财富意义上的成功，可能更在于思想的健全^②，文明意义上的发展^③，同时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即我们也应该与国际学术界共同创造和分享学术上的“公共产品”。尽管只是学术上的研究，但绝不孤立于国家和公众的共同需求。我们的责任在于放弃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先行的论述，在不丧失政治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一个尽可能客观、尽可能中立、尽可能扎实、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多元的实证性的智识供应。这是时代的机遇，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追求一定要避免当前整个学术体制的“美国化”、或者准确地说是“伪美国化”倾向，即形式上或皮毛上的美国化，但忽视或无视其创新精神、自由思想的另一面。

2、学科导向/区域研究导向

在学科导向还是区域研究导向的问题上，西方语境下的俄苏研究同样也有过很多论争，但在苏联解体前，一直是区域研究占据了俄苏研究的主流。尽管这一时期取法于区域研究的“苏联学”成了政治学等形形色色学科理论的跑马场，但两者之间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有意思的是，“苏联学”的创建者和消费者们一方面不断地从各个学科借用种种理论，比如，极权主义模式以及现代理论等就曾在西方的俄苏研究界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依然可以从当代西方的俄苏研究作品中看到即便冷战已经结束也未能抹去的深厚痕迹；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在地知识将自我与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隔离开来。同时，“苏联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也因研究对象的“非西方性”而被遵循学科范式的研究者们视为无用之物而日益边缘化。除了一些共有的概念外，两者似乎“老死不相往来”。

但当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区域研究的取向被抛弃，而学科导向开始占领原属于地区研究的领地。这种格局的出现是美国国内学术论战的结果，主要是针对苏联在一夜之间突然瓦解、冷战骤然结束的大背景。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国“苏联学”，遵循了典型的区域研究范式，主张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基本要求包括：（一）强化型的当地语言学习；（二）利用本地语言进行深度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三）对在地的历史、观念、物质乃至解释予以近距离的关注；（四）检验、推敲、批判、发展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而不仅仅是细节观测；（五）

① 参见 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es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冯绍雷：“强国之道在于思想的健全”，《解放日报》，2005年8月27日。

③ 范昕：“许纪霖论析《富强与文明：现代中国的文明梦》”，《文汇报》，2010年8月23日第9版。

多学科的互涉经常越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边界。^①从 4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美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集中研究最大的对手苏联，以“区域研究”作为主流方法的“苏联学”造就了全世界最庞大的苏联问题研究队伍，也创造出了规模最大的苏联研究作品。但问题在于，这样一支专业的学术队伍竟然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从此，“苏联学”褪去了“显学”的外套，成了一段被灰尘遮蔽的黯淡历史、一个少人问津的美丽传说。

显然，将苏联解体解释为偶然性很难令人信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美国俄苏问题研究界寻求新的出路。所以，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苏联学”的既有范式进行了深刻检讨。^②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又被视为重中之重。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的一大学术影响就是区域研究在美国逐渐式微，1990 年代中期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共同组织的各地区研究委员会甚至终止工作，可以说一直到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的区域研究已经逐渐让位于学科研究。有学者总结称，苏联解体对“苏联学”的拥趸们是一个震撼性的打击，对学术界而言，至少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作为一门职业，它不得不重新解释自己的身份，被迫认清自身的优劣；另一方面，直到 80 年代末期还甚少关注共产主义体制世界的带有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介入新的研究议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那些可能花费了平生时间和精力研究这一地区和这一制度的研究者。^③

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研究中心前主任、现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科尔顿 2009 年 9 月 27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时曾明确表示区域研究被学科研究所挤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科学领域，不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经济学，单纯了解一个国家不是一条好路子。这样一些新派学者认为有数学模型，有量化指标，用这些东西来研究就够了，没有必要亲自去研究对象国家采访调查，学习他们的语言。这种观点不奇怪，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普遍，很多人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错的，我们要加以回应。^④

我们承认，“后苏联学”的理论范式显然是基于西方的知识谱系，而且往往将苏

①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UCAS Edited Volume 3. <http://files.us.splinder.com/7e7e185d69201623a24f809208230bc2.pdf>.

② 代表性作品包括：Michael Cox(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London and New-York, 1998.

③ Ron Hill, “Social Science, ‘Slavistics’ and Post-Soviet Studies”, Michael Cox(ed.),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p.203.

④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 年 9 月 27 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

联和俄罗斯视为一种欠发达的类型，以此对俄（苏）进行种种指责。这种立场最大的问题在于，要用某种理论范式去解释俄苏的历史或现实，总会产生一种削足适履的效果。任何理论都有其假设、前提，都有其适用性，而非具有普世性，因为解释力总会相对有限，必然有其不足。在研究和揭示各种现象时，绝不能奉行理论先行的做法，这很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解，从而使得所研究的对象与研究结果之间出现想象的鸿沟。

即便如此，也得承认美国学者对于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诉求，其错误可能就在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但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套模型，而可能在于一如爱德华·汤普森所说的“理论的贫困”^①。中国的俄苏研究似乎非常抗拒理论，而理论的重要性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挪威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托布约尔·克努成所指出的，学术从业者与其他议论、阅读和撰写国际政治的人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方法”，学者用方法论为自己压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获得特定科学技术哲学和学术规范的指导；二是“理论”，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能自觉地沿着一条前人已经走过几个世纪的道路来探究战争、财富、权力和和平问题。^②

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与国外俄苏研究同行的对话似乎有点像聋子之间的对话（且不说这种对话目前依然很少）。^③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这样描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互动。^④实际上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的对话可能比布罗代尔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聋子对话还要严重。布罗代尔所强调的是，不同的学科拥有各自的语言、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并不断被各自的训练进程或“社会化”所强化，并因此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山头主义”，而且相互挑剔对方的缺点。与西方日益重视理论和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发生的理论转向相比，中国俄苏研究界长期对理论予以漠视，视之为无用之物。资深的中亚问题研究专家赵常庆研究员早在80年代中期就曾撰文透露过中国俄苏研究界轻视理论的风向，他在比对了各专业刊物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各类论文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很多文章是资料性的或情报性的。有些文章则是内部报告略加扩展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内部报告痕迹。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是形成苏联东欧

①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 1978.

②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中译本序”，《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③ 一种更让俄苏研究界感到尴尬的流言是，我们的理论水平如此低下，以至于其他学科都可以跑到国际关系学科来客串，甚至是普罗大众谈起跟俄苏问题相关的话题时，其讨论的水平未必比我们学者低。据说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的某些评论就被视为“仅仅与新闻从业者相当”或者“甚至还比不上媒体的敏感度”。

④ F. Braudel, “History and sociology”, English trans. In his *On History*, Chicago, 1980, pp.64-82.

问题中国学派的关键的一环。”^①遗憾的是，这一状况迄今仍未有明显的改善。多数论文仍然保持了一种“回顾——现状——展望”的八股文模式，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研究的“两张皮”现象仍很突出。

形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俄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已经拥有了相对较为发达的学科体系或研究范式，而是一种较低水平的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材料的累积，甚至连中长期的问题导向都算不上。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陈兼曾指出，中国理应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正是因为问题意识的缺乏，导致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学者只有材料可以参考。这类似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的学者在他的老伴——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此外，需求方的引导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学者适应其要求，久而久之，遂形成新八股。

当然，本文所说的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套用，依靠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型去解释俄罗斯的历史或现实，也不是单纯地借用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借来的概念或方法，作一种工具主义式的应用，而是立足于俄罗斯事实，以政治科学或其他学科为背景的，俄苏历史或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对既往的理论进行校正，要提出属于俄苏研究的特殊范畴、概念等。

在笔者看来，单纯强调学科导向和单纯强调地区研究导向都失之偏颇。前者往往沉溺于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争辩，沉溺于构建高度抽象的模型，而对于需要得到解释的复杂的行为模式或事件却无法提供真正的洞察。后者则显示出“对社会科学理论怀有敌意”，对于发展和运用超越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和陈述不感兴趣，且缺乏概念上的先进细致和方法上的严格精密。^②以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因为未能预测苏联解体就被学术界抛弃是否明智呢？只有经世应用之道才有用吗？其实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过往所有的研究知识都出了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美国的俄苏研究专家散见于各学科，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有了学科知识的支撑就更具解释力，更有前瞻性了呢？其实这种以理论为预设去探讨俄苏问题，必然只是一种单面镜子的观察，不能深入到其内部，且各种理论都有假设、前提，西方学科的理论应用到俄罗斯身上往往并不一定适合，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枳”也。应该承认，是实践成就了理论，而非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

① 赵常庆：“苏联东欧问题国内期刊述评”，第92页。

② Mark Tessler, Jodi Nachtwey and Anne Banda, “Introduction: The Area Studies Controversy”, in Mark Tessler (ed.),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转引自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88页。

国的俄苏研究面临的学科建设任务非常艰巨，一种理想的状况是，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在地知识，还要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包括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等各种背景知识。

3、宏观研究/微观研究

由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引发的张力，其实质是复杂性和简单性的分野。复杂性和简单性之间的张力古已有之。简单性一般在两种意义上加以使用，一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认为事物都是由简单的东西构成，因而可以根据构成要素描述整体系统；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为可以运用尽可能少的概念、公设等构成的理论，对客观世界进行统一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认为“最精确的学术是那些特重基本原理的学术；而所包涵原理愈少的学术又比那些包涵更多附加原理的学术更精确”。^①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始经历了从简单性向复杂性的转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自然科学的这种转向也影响到了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也正在越来越重视国际系统、国际格局乃至一组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问题。^②美国学者杰维斯依据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些案例详细论证了国际系统的复杂性问题。^③杰维斯强调，在分析系统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架设桥梁或者避免进行大的划分，比如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在聚焦行为体和检查结构之间，在研究个体和检查更大的单元和整体之间。^④杰维斯通过自己的著作，对美国社会科学界多数人或明或暗地支持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杰维斯本人是在个体行为有着精深研究造诣的基础上进行更复杂的系统效应的研究的，其复杂性包含在简单性之中。

事实上，国际学术界对俄苏研究已经步入了、或很久之前就步入了微观研究阶段，或者说在大战略等宏观研究的背景下，更多侧重于对俄苏问题的局部细节剖析，并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国的俄苏研究就目前的文献看，更偏向于从宏观层次上去理解俄苏，是一种系统用的复杂性研究法。一种显而易见的弊病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俄苏历史或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这使得相关作品往往充满了简洁性，好似烟囱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页。

②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Robert M. Cutler, “Complexity Science and Knowledge-Cre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stitutional and Infrastructural Resources*, in *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 Oxford: EOLSS Publishers for UNESCO, 2002.

③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杨少华、宫志雄译：《系统效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中文版前言，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V页。

和电线杆那样笔直，而不像有主干有枝叶的大树。^①

中国学人擅长宏观研究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喜欢抓住主要矛盾，抓住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长处之所在。但这种宏观把握能力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要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之中抽出最本质的东西，可能只有部分学者具备这种深厚的功底，而大多数学者力有不逮。这种注意大面的做法的缺点在于，由于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俄苏学界的研究没有能够深入进去，没有能够做到像杰维斯所表明的那种立足于简单性基础之上去研究复杂性，使得我们的认识支离破碎，甚至可能因而忽视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细节，因而我们只能看到俄罗斯的表层，只能展示出俄苏真实面貌的轮廓，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摸清其细部。这尽管有其正面的意义，但时代发展到今天，这种粗放式的研究方法已经绝不能再作为中国俄苏研究的唯一度量衡。

中国的俄苏研究亟需融入国际斯拉夫—欧亚研究界。以目前这种大而化之的研究路径，必然会出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各说各话，甚至互相听不懂的尴尬局面。一条可能的路径是，中国学者将自身熟悉的、或者具有传统优势的宏观研究，与西方学术界通行的微观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我们的宏观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能在中国学派的旗帜下回避学习国外俄苏研究的长处做法。为了中国俄苏研究的整体推进，我们可能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深入、系统地学习国外的俄苏研究成果。无可争议的是，西方俄苏研究在全球范围的俄苏研究知识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强势地位。我们不能忽视或无视这种情况，既不要妄自菲薄，更要迎头赶上。

4、功利实用/基础研究

这一张力实际上是第一组张力即学术与政治之间张力的伴生物。中国的俄苏研究，史学作品相对好一些，而对于当代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尚性和功利性，即什么时髦研究什么。这种时尚化的研究必然导致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结果。一些命题从诞生之日起就声势熏天，但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却相当鲜见。过一段时间，一个新的热点产生了，研究者再一次一哄而上，开始扎堆研究某一热门课题，而原先的那个问题就慢慢演变为一个冷门话题，难以引起学界的跟踪和关注。

造成中国俄苏研究困境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非常功利的实用主义态度。一批又一批学人前赴后继地进行各种政策解释型研究和政策建议型研究，没有深入到俄苏问题的灵魂深处。实际上每一个西方“苏联学”的训练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学习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历史、文化、艺术、法律、宗教等各方面知识的过程。一位

^① 此处借用了罗志田对于中国史学研究对于历史丰富性和史料的有限性多被忽视的批评。参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西方学者在回忆自己作为苏联问题的研究生的经历时曾经反躬自问：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无关的科目？为什么不能直接投入对作为研究客体的区域的相关研究？当他后来接受了政治学的专业训练后，再度从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他又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事对苏联政治的研究，而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研究俄国史、俄苏文学、俄国艺术、经济、地理以及其他科目？^①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界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其背后隐含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果没有上述诸如历史、地理、文化等所谓“其他”方面的背景知识，我们不会出现对俄苏问题的曲解？换言之，这些背景性知识是不是我们通往俄苏政治或其他本质性问题的一座必要的桥梁，使得我们在这些基础性问题—上花费再多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基础的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凸显。假如我们对于俄苏的基本知识结构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扎实，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对俄苏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呢？

比如说，关于普京对俄罗斯部分战略资源实现“重新国有化”的解读，历史学家派普斯等美国学者马上从俄国历史上的“产权观念”缺失角度入手批评普京当局。中国国内一些评论和分析也会对这种“去私有化”或“逆私有化”的过程给出一种“纠正叶利钦时代私有化政策”的定位。问题在于，我们可能忽视了在“国有化”进程的同时，普京政府每年始终不断地加大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国内学术界多没有计算在 18 家俄罗斯特大型公司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只有 3 家；更没有从“私有产权”背后隐藏的俄罗斯经济组织制度的历史渊源进行深入的分析。实际上，与西方通过“买—卖”关系构建交换运行的市场经济不同，俄罗斯历史上更常见的经济组织方式是基于“缴纳—分配”原则的。如果对这些基础性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可能在解释当代俄罗斯以及其他俄苏问题时能更有说服力。

从构建中国俄苏研究知识结构的需求出发，对俄苏经典文献的译介以及对俄罗斯文化、文明模式的研究已经日益迫切。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了好头，但需要更大的投入。这种研究可能短期内不会有资政上的功能，也不会直接和国家发展的需求相关联，但对于我们把握俄罗斯问题的实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俄苏的经典作家、重要的思潮和流派，应当像我们研究孔子—样，不绝于缕，—代又—代地积累，形成传统，并且每一代都有所推进。这才能为中国的俄苏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5、感性/理性

—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俄苏问题研究常常会受到情绪的左右，或者说很难摆脱从业者个人的好恶感情，也常常受制于现实中的国家立场。俄苏研究的特殊之处在

^① Frederic J.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p.vii.

于，中国人素来有一种特殊的俄罗斯情结，是一代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迷思。尤其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情结对于中国对俄国的认知，对于中俄关系，对于中国所构建的外部世界图景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已经习惯用俄罗斯作为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习惯于将其作为中国所需要寻找的外部思想文化的源泉。五四时期，俄被认为是能帮助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的正义之国。20世纪30年代起，俄是能精神上正确指导中国抗日的盟国。1949年以后是中国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最佳样板和最值得信赖的盟国。20世纪60年代起它又成了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俄不再是值得中国仿效的国家了。^①

更为重要的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们对俄罗斯的审视同样成了国内政治话语的争夺对象并日益意识形态化。一方面，这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度量工具。一部分知识分子把俄国看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政治合法性的最大来源之一，俄转型的阶段性失败则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好的反面教材；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则对俄政治生态的保守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向历史回归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并以此从侧面说明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社会各界受西方智识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构建的“俄罗斯形象”对中国的俄国认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俄苏问题研究中的“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化”，构成了中国近20年来对俄认知的宏大叙事背景。

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俄的正反感情纠葛似乎是全世界俄苏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特质。科尔顿曾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俄苏问题研究专家对各自研究客体的态度作了精彩的表述。他承认研究一个国家往往会使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对象国怀有感情，之所以出现汉学家对中国有强烈的好感，是因为“美中关系密切，美国当时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有跨太平洋的贸易”。余英时先生在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汉学家费正清博士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的台湾译本作序时也提到这种研究中的感情因素，正好是科尔顿先生观点的补充。余先生强调，“一般而言，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解释中共的兴起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带上一层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②科尔顿的理解是，俄苏问题研究者不存在类似的强烈感情：

因为在研究的起步时，许多研究者采访的对象是移民或难民，或者这些人

① 参阅林精华：“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关于20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第112-113页。

② [美]费正清著，薛绚译：《中国新史》，序言（余英时），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余序中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论断显然同样带上了强烈的个人好恶，我们应该予以理性认识。但就关于学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的情感因素的描述，笔者认为还是深得个中三昧的。就本人向日本、欧洲等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的咨询，这似乎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的后代（美国哈佛大学最早设立了关于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研究项目，由于无法到苏联实地调查，只能采访那些曾经在苏联居住后来出走的难民或者移民。包括去奥地利、德国查访这些前苏联公民。——引者注），而这些人在苏联曾经有过艰难的遭遇。通过这样的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向的。所以，在我们的领域中，相当常见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对苏联或俄罗斯怀有特别热烈的好感。

在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兴盛麦卡锡主义，此时苏联问题专家受到监控。如果流露出对苏联的感情，会受到处罚。

另外，比较复杂的是，对于美国的俄罗斯研究而言，没有很多俄罗斯人在美国进行游说。但是亚美尼亚，乌克兰人，华人等会有游说。没有俄罗斯人的游说，很容易使得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和俄罗斯政策走入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在这个研究中，要体现出一些正面的感觉，人们往往会这样想，我把政权和社会分开，所以我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政权，但是对于这个社会还是抱有一定同情心的。对于政权的话，也可以有更深的理解：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个政权有过集中营，但是也战胜过希特勒等。总之，要看在政权研究方面采取什么样的观点。^①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的俄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类同于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这一现象：

由于日本同中国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切身利益太多，“学生”、“先生”几经变化，因而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难于超脱，其间参杂了不少个人感情，故而大褒大贬、大扬大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则不象日本人囿于各种成见，其对中国的研究也客观、公允得多。……中苏两国乃咫尺近邻，山水相连，中苏关系史上有过血与火的刀光剑影，也有过诗与歌的宁静和平，有过同一战壕的并肩作战，也有过互不相让的反目成仇。中苏交往史的这些恩恩怨怨，不可能不深深地影响着甚至是亲身经历了这些变故的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恐怕也难“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感情色彩代替了理性判断，自我中心的主观估价代替了客观公正、言之有据的经济评价。^②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俄苏研究者所表现出来的，的确确实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正反感情并存症”，加上中苏关系史上的复杂情况，尤其是涉及到领土等的历史记忆和感情纠葛，我们一方面习惯于为俄罗斯的一些政策辩护，另一方面又对俄罗斯的行为过度诠释。有学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某种程度

① [美]科尔顿：“美国学术界如何理解俄罗斯现象”，2009年9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学术讲演。

② 王跃生：“走出摇篮——读《今日苏联》谈当今的苏联研究”，第102页。

上说，苏联问题就是中国问题，或者说，如何看待苏联向来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多年来，在中国无论苏联问题还是中苏关系问题的研究，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受政治影响很大，没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很多涉及苏联及中苏关系的问题，广大群众受传统宣传的影响很大，在认识上存在很大偏颇。”^①这也是近年来以沈志华为代表的一代研究者致力于通过档案还原历史的动力所在。显然，中俄现在各有各的历史记忆，不同的历史记忆和立场始终会影响到我们对俄苏问题的研究，当上述意识、立场和感情内在地渗入到研究者的思考之中时，如何超越这种过多的非理性因素和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结束语：中国俄苏研究的再出发

笔者认为，中国的俄苏研究完全有可能，而且理应成熟起来，从一个国外俄苏研究的“消费领域”（依赖外来概念和理论）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有能力产生出独创的分析框架并有助于启发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中东欧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相比，曾经被东西方对立的格局所阻碍，人为地与既往的与西欧同出一源的学术传统形成了“大分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政治上以“回归欧洲”为身份指向，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开始转型，并在学术组织、学科范式、基金扶持等各方面融入欧洲，形成了迅速“赶超”的新局面。^②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参照，加入追赶国际俄苏研究先进水平的行列，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至少实现个别问题、个别范畴、个别领域的突破，进而全方位地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

诚然，西方俄苏研究种种理论范式背后往往隐含着一些“未经严明”的假设，我们对此应有清醒认识，不能动辄奉为神明，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而要有所取舍，因为这些基本预设如果本身存在问题的话，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任何再花哨的理论框架必然是随时可能崩坏的空架子、假把式。^③特别是，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特殊的“非西方”文明体，基于西方现实发展起来的某些理论是否适用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笔者的个人感觉是，我们现在的状况甚至还够不上国外俄苏研究的“消费领域”。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所形成的大量的成果中有意义的寥若晨星。换言之，中国的俄苏研究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同时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我们要在批

① 吕瑞林、左凤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苏联问题——《苏联真相》首发式暨苏联问题研讨会综述”。

②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atching up'-a myth or a strategy*. Edited by Ilona Pálné Kovács, Dagmar Kutsar, Routledge, 2010.

③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第322页。

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参与各国俄苏研究学者间的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国际俄苏研究范式的重构。所以，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和智识革命绝不意味着我们仅仅充当一个国外俄苏研究的概念、范畴、范式、方法的消费者、进口者的角色，我们的最终目标指向应该是将中国的俄苏研究转变为一个“生产领域”。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即就文化、知识和学术生产而言，中国的俄苏研究和其他国外同行相比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事实上，如果参照相关的统计材料，甚至俄国人对自身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也并非主流，或者说全世界斯拉夫—欧亚研究圈内没有人能够忽视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刊物、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相关情况，但相反，即便是中国本土存在一些相当有分量、相当有价值的俄苏研究成果，可能正是因为使用中文出版，而难以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所以，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任务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快速地融入西方的俄罗斯—欧亚问题研究学术圈，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我们需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而非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惯势下进行俄苏研究，否则就有可能陷入萨义德所描述的“东方学生的东方学困境”，即东方的学生跑到美国投到东方学家的门下，然后回到本土重复美国东方学教条的陈词滥调。^①

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的新俄苏研究，从可能的路径选择上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呈现出某种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至少是西方俄苏研究界所不能呈现的对俄苏问题研究的范式；二是与西方学术界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先从模仿做起，逐渐融入、内化到西方的俄苏研究路径上去；三是平衡上述两种取向，既学习西方的特点，也有中国自身的观察；四是就事论事，既不追求与西方同步，也不追求中国的个性。我认为这几个路径之间并非零和关系，而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进行就事论事的事实研究，然后更多吸纳西方的俄苏研究知识，熟悉之后就有可能试图在中国与西方的俄苏研究范式和知识谱系之间进行平衡，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苏研究新格局。也可能在同一阶段呈现出每个范式的部分要点，甚至在同一阶段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这同样也有助于中国俄苏研究的未来发展。

在笔者看来，所谓“新俄苏研究”，其特征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对象的时间结构不再是厚今薄古。对早期俄国、帝俄、苏联以及当代俄罗斯的研究当然不应该平均分配精力，但不能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所谓的现实问题研究，要甘于坐冷板凳。

^① 萨义德：《东方学》，第416页。

——研究对象的空间结构不能仅仅是俄罗斯当局，应该打破地方、全国、地区和全球的局限而兼容并蓄，即形成“从俄罗斯地方看俄罗斯”、“从俄罗斯看俄罗斯”、“从地区看俄罗斯”和“从世界看俄罗斯”的齐头并进的格局。

——在知识系统上，当代政治经贸知识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化文明等相关知识，应该有较为完整的塑造。

——在语言工具方面，对古俄语、当代俄语、俄罗斯境内及其境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语言以及英语等，可能都要运用，不能单一化，要尽可能做到占用各种语种资料的融通无间，至少要能在汉语、俄语和英语之间相互转换，这对于我们增进对俄苏问题的理解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对话都有好处。

——在研究方法上，不能依然停留在“前实证”阶段^①，传统的人文考证方法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应该相辅相成；应该打破学科细化的藩篱，而不仅仅是做到像马赛克似的仅仅将其拼接在一起，要重在学科的互涉和交叉融合，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应该构造出一个把俄罗斯视为直接的对话者，把其他国家的俄苏研究界作为间接对话者的情境，让我们自身成为俄罗斯进程的“不断参与的观察者”。

——在研究志趣上，不仅要研究与俄国相关的热点问题，也要研究基础命题。不仅要研究宏观问题，也要研究中观和微观命题（微观问题与微观情境，往往因为我们强调政治格局、社会结构、文化模式、思想潮流等学术思考，而一向处于容易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不仅要研究单一的学科领域，还要研究边缘的、或者说“之间”的问题。

——在思维方式方面，不仅要走正向思维，更要有逆向思维，要强调反思性研究，对于我们在俄苏研究领域知识谱系中的一些定见、成见、偏见都要作深入的探索，要勇于尝试我们未曾思考过的思想范畴（对边缘、边界与异例的研究，往往可能突破我们自身的学科偏见）。

——在学术追求上，应该将参与与国际俄苏研究学界的平等对话作为一个中短期目标，长期则是提出属于中国立场的问题和概念、范畴，达到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水平。

——在学术组织方面，要克服长期以来俄苏研究界潜流涌动的门派意识，打破或者是以地域甚至小到单位为区隔的画地为牢，砸碎各自的边界和壁垒，以学术共同体的方式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对于今天的俄苏学界，孤独的天才和英雄似

①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1页。

乎很难独存。

——在学术氛围上，必须构建起健康的、建设性的学术批评意识和环境。必须牢记：批评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裁断，也不是一种平复怨恨之心的补偿性行为，应该消除自己的偏爱，不怀成见地投入作品的“世界”。^①但相较于国内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文学、法学、社会学、语言等，“国际关系学界缺少比较充分的学术批评”^②，这确实是制约俄苏研究进步空间的一个重要因素，理应加以克服。

总之，与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或其他国际问题研究的同事们不同，包括俄苏问题在内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要求我们先在理论和在地知识之间搭建起一个可以自如地在二者之间自由来往的桥梁，在不知疲倦地连接过程中还要不断调停二者的固有矛盾，我们的梦想才能在此放飞。所有的有志者都感觉到从事俄苏研究的难度。我们也不必惊讶于中国的俄苏研究已经在国际范围内的同类研究的重心之外，承认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俄苏研究再出发已经时不我待。通过范式重构以及相应的智识革命，通过国际化、实地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重新赋予中国俄苏研究的活力，它就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学术的广阔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这本身就孕育着无穷的机遇。尤其是在一个中国日益崛起于世界东方的历史关头，发展包括俄苏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的战略机遇期正在来临，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兴旺意味着不断扩展的利益，所以需要更多和更好的地区研究”^③。

一言以蔽之，革命可能即将发生而且理应推动其发生，新的时代好像就要到来了！

（责任编辑 陈大维）

① [比利时]乔治·布莱：《批判意识》，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 王逸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6页。

③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9页。

专题文稿：国外俄苏研究

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

于滨**

【内容提要】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庞大和繁杂的体系。在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美国对苏政策三者之间寻找交叉点和互动处，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奠定基础。乔治·凯南和马丁·马里亚分别于1947年和1990年以“X”和“Z”为笔名发表的长文，不仅代表了战后西方苏联研究的起点和终结，也构成了学界与政策界、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点。在前苏联问题上，学界与政策界的互动不一定合拍，有时甚至南辕北辙。43年间，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具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信奉现实主义的凯南被边缘化，美情报界也因此对苏屡屡误判。相比之下，西方苏联学界的主流却日益学术化，多以“正常”眼光看待前苏联，其中不乏马里亚认为的“亲苏”倾向；Z文对前苏联的笔伐和近乎完美的预测，其实也是对西方和美国苏联学的大批判，尽管这一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不甚公平。

【关键词】西方苏联学 国际关系理论 美国对苏政策 凯南 马里亚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1-0069-(18)

一、问题的提出

1989年，象征着传统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分野的柏林墙顷刻之间倒塌，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全盘重新洗牌。然而，“历史”并未像西方自由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就此“终结”。欧亚大陆各类民族主义滋生繁衍，其惯性和冲击力不仅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JJD810005）的阶段性成果。

** 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兼东亚项目主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太平洋论坛俄中关系特聘研究员。

继续支配欧亚大陆“后共产主义”制度/地区的政治生态，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欧洲本身的政治—经济整合、欧盟与俄国的关系以及美俄关系。在“9·11”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在亲西方的理想/自由主义和更为传统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之间摇摆和探索，寻求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欧亚大陆未来的政治走向前景如何？欧亚大陆最大的政治实体俄罗斯如何应对其“渴望”又不可及的西方？基本上错过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良性”运作时期的俄罗斯如何摆脱目前全球化的“厄运”期？美国主导的西方又会怎样对待一个劫后重生、欲振乏力但雄心未泯的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如何看待一个与其若即若离的俄国？什么样的俄罗斯更符合美欧的利益？俄罗斯又如何自我定位？一个在西方化与俄罗斯化之间永久徘徊的俄罗斯到底是正常还是反常？这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走向又意味着什么？西方俄罗斯研究与西方对俄政策之间有何种联系和互动？

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是冷战期间“苏联学”的继承和发展。本文的任务是对西方/美国的“苏联学”研究进行梳理，并将其置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加以比较和考察，同时兼顾美国对苏政策的制订和走向，以寻找三者之间的交叉点和互动之处，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提供一个基础。

二、X先生与“苏联学”（Sovietology）

冷战后美国和西方的俄罗斯研究，对冷战时期的“苏联研究”有继承也有扬弃。从苏联到俄罗斯的转型剧变，对西方的苏联/俄罗斯研究和政策制订，以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造成了强有力的震荡和冲击。

二战后西方“苏联学”研究之拐点，一般要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7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以“X”笔名发表的“苏联行为之根源”（“The Sources of the Soviet Conduct”）一文。^① 该文提出的“遏制”观念，不但被杜鲁门政府立即转化为美国冷战时期的对苏政策，也影响了几代西方苏联学学者。

冷战期间，西方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学界、政策界和政府部门设立了众多的“苏联研究”项目和机构。政府的外交、国际事务高官中也多有研究苏联问题的重量级学者，如基辛格（尼克松、福特政府）、布热津斯基（卡特政府）、赖斯（小布什政府）等。^② 不仅如此，战后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拓展，在相当程度上也借助了苏联研究的动力和资源，前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

^①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②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历届国家安全顾问中，从未有“中国通”。

和份量，更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无论是以国家实力为研究基本出发点的汉斯·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① 还是立足于国际体系、高屋建瓴的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structural or neo-realism），^② 均与苏联在二战后崛起、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强国有关。而在七十年代出现风靡一时的所谓“极派”（polarity）学者，更是与中苏两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相同的大国由结盟转向对抗、并因此产生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在以往泾渭分明的国际两极体制之外开拓了“三度”的想象和操作空间有关。^③ 总之，前苏联的盛与衰，催生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大批理论性著作，其中包括约翰·盖迪斯（John Gaddis）的“持久和平论”（long peace），^④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⑤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⑥ 甚至冷战结束以后开始成气候的建构主义，也是建立在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之上的。而批评的矛头所向，就是这两个学派都未能预见苏联的解体。^⑦

建构主义对主流学派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在苏联问题上误判误导的绝不仅仅是学术界。美国情报界和决策界也未能预见强大的苏联会突然解体。中情局资深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盖茨（后任中情局局长、现任国防部长）在1986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就曾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政策毫无新意（“nothing new”），“在苏联只有暴政才能行得通（The Soviet Union is a despotism that works）”；全然没有察觉到戈尔巴乔夫与众不同的能力和致命的施政弱点，及其在以后的几年里给苏联政

①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ition, New York: Knopf, 1978.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③ 有关“大三角”的主要著作有：Joseph L. Noguee, “Polarity: An Ambiguous Concept”, *Orbis* 18, Winter 1975;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esp.837; 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7; Herbert J. Ellison, e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 Global Perspecti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Gerald Segal,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82; Gerald Segal, ed., *The China Factor*, London: Croom Helm, 1982; Douglas T. Stuart a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Strobe Talbott,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Enemy of Our Enemy, or True Friend?” in Richard R. Solomon, ed., *The China Fact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1;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4, July 1981; Kenneth G. Lieberthal,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70s: It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1978; Steven I. Levine, “China and the Superpower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0, Winter 1975-76; Min Chen,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d Regional Conflicts: Lessons from the Indochina War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1; Harvey W. Nelsen, *Power and Insecurity: Beijing, Moscow, and Washington, 1949-1988*,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9.

④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86.

⑤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⑥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⑦ Russell Bova, *How the World Works*, 1st ed., Longman, 2010, pp. 24-25.

治和社会带来的巨变。拥有众多类似盖茨这样的“苏联通”的中情局，因此也只是年复一年地编织着苏联强国强军的神话，直到编不下去为止。^①

苏联问题研究是美国外国问题研究领域投入最多的项目，但其最终结果却远不如人意。这种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的现象，与美国情报界 10 年以后未能预测到“9·11”恐怖袭击的背景完全不同。当时以小布什总统为首的美国决策界和情报界几乎完全忽视了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②“9·11”前的几个月，小布什总统的注意力实际是在俄、中两国——2001 年 3 月驱逐 50 余名俄国间谍、4 月 1 日中美军机相撞，可以证明这一点。

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密切关系，但美国对苏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似乎有自身的逻辑和惯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简单地认为美国学界和政策界之间是无数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s）——即学者与政府官员和智库人士经常转换位置，互相配合——进而认定学界与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可能是过于武断的推论。

一般来说，中情局如此“钟情”甚至迷信前苏联的“长治久安”，其主要目的之一很可能是为了美国国内军工集团的利益而塑造一个强大的对手，以便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种政治化的情报当然无法客观和精确。对于中情局夸大苏联实力的做法，居然还有人匪夷所思地认为，该局在对苏分析中的“盲点”是前苏联谍报机构在中情局内部长期卧底的间谍阿尔德瑞奇·艾姆斯（Aldrich Ames）所造成的。在最高决策层面，老布什本人从内心不希望戈尔巴乔夫失败。而他的国务卿贝克及其助手对苏联事务的了解几乎是一张白纸。相比之下，其前任舒尔茨国务卿和他的副手们则精通对苏事务。贝克本人出身律师，擅长言辞和谈判，但对历史和地区事务知之甚少，对苏联的突变当然缺乏直觉。^③

其实，决策者所需要的不一定是非常专业化的知识，而是战略眼光和对历史的把握。在这一点上，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早在 1821 就对俄国日后的发展有言在先：

很难设想……俄国未来的扩展仍然会一帆风顺。如果俄国不能教化那些居住在俄国统治所伸延到的天涯海角的游牧族类，这些被征服的部族就算不给俄国添乱，也不会给俄国帮忙。而教化这些部族的过程又会使俄国成为一个膨胀

①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McGraw-Hill, 2008, pp. 344, 349.

② 见 Richard A. Clarke, *Against All Enemies: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③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pp. 344, 352, 355.

过度的帝国，它必然会重蹈历史上无数帝国最终分崩离析的覆辙。^①

麦迪逊的先见之明是建立在类似“物极必反”的常识基础之上的。他虽然不可能精确预测前苏联解体的具体时间，但对苏联帝国的长远走向显然有相当的洞察力，至少避免了中情局众多“苏联问题专家”们的双重错误：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不相信他会改革，而在戈氏执政后期则低估了改革的风险。

三、Z先生的“苏联必亡论”

中情局的失误不是偶然的。苏联剧变前夕，西方和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主流沉浸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引发的亢奋和企望之中，对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1990-1991年）陆续出台的激进改革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伴生的风险毫无察觉。甚至有学者在戈尔巴乔夫激进改革开始之前就宣布西方已经胜利，可以高枕无忧了。^②在西方政府、媒体和学界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齐唱赞歌时，美国的一家名为《代达罗斯》(Daedalus)的人文学术杂志在1990年冬季号发表了一篇署名“Z”的长文，指出苏联的极权体制必定会走向灭亡，而戈氏改革只会加剧这一进程。对“苏联问题”和国际关系学界来说，该文的署名“Z”立刻使人联想到凯南当年以“X”笔名为冷战“定调”的长文，在西方和美国造成了轰动效应。^③

在这篇题为“通向斯大林的墓地”的文章中，Z先生严厉斥责西方苏联学界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第296-301页)，指出了前苏联制度的“不可改革性”，原因是苏联制度不是一般的官僚体制，而是以意识形态构成的意识形态—官僚体系(ideocracy)；任何背离这一体系的举动都会引起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苏联的问题不是如何改革其共产主义制度，而是如何使之解体(dismantling，

① 引自麦迪逊给理查德·布什的信，1821年11月20日，in James Madison, *Letters and Other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Philadelphia, 1867, III, pp. 235-236, cited by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p.349.

② 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是这一时期典型的乐观派，“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8；另见Michael Kaufman, “Martin Malia, 80, Soviet-Era Skeptic, Dies”，*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2004, <http://www.nytimes.com/2004/11/24/obituaries/24malia.html>.

③ 在前苏联存在的74年里，各种预测苏联消亡著作不计其数。其中主要的学者以及著作有：George Orwell, *James Burnham 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London: Socialist Book Center, 1946)；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Robert Conquest, *The National Killers: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0)；and Zbigniew Brzezinski, *Dilemmas of Change in Soviet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Greenwood Press, 1970),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cay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9). 然而上述预测均未引起Z文所造成的轰动效应。

第 337 页），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自掘坟墓。^①

Z 的真实身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苏联历史学教授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②使用匿名是为了保护为此文提供消息的前苏联人士。在西方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一片赞歌中，马利亚在苏联解体近两年前做出极为悲观的预测，似乎有“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洞察力。Z 文的论述基于两点：对前苏联历史系统和细微的观察，以及对西方苏联学主流的有力批判。在马利亚看来，在苏联解体前的 20 余年里，西方苏联学的主流学者及其各种“理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苏联集权制度的辩护士；他们看到的只是制度表面的超稳定性^③，认为苏联体制已逐步过度到“成熟的工业社会”，甚至具有“向多元社会发展的潜力”，全然忽视了前苏联社会变迁所经历的巨大震荡和付出的沉痛代价。

据马利亚观察，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苏联学界对二战以后一直占据苏联研究主导地位的“集权模式”（totalitarian model）进行了数次“修正”，以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等“底层问题”的研究，却忽视了对集权模式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等“高层问题”的专注，即以“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取代了“政权研究”（regime studies）。^④ 在这些被修正了的、非集权化的模式中，西方的苏联学界几乎把前苏联描述成了具有西方民主特点的政体，认为苏联模式虽然是从乌托邦开始，但经历了城市化和教育普及后，最终发展到了“现代化”。^⑤ 根据这种逻辑，斯大林的“暴政”不过是过眼烟云（a passing phase），或一个“非正常”现象（an aberration）；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实际上恢复到了所谓“正常状态”（normalcy）。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出现了所谓“机构性多元主义”（institutional pluralism），苏联军方、企业管理阶层、或科学院学者，都可以通过多元方式表达各

① Z, “To the Stalin Mausoleum”, *Daedalus*, vol.119, no.1, winter, 1990, pp. 295-344. “代达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建筑师和雕塑家，传说曾为克里特王国建造迷宫。

② 1993 年，马利亚出版了 *The Soviet Tragedy: 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1917-1991* (Free Press, 1994) 一书，基本沿用了 Z 文的观点。

③ 甚至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在其 1968 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把前苏联的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提并论。见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④ 其代表作为：Robert Tucker, ed.,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7.

⑤ 对“现代化”问题（modernization）的研究是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所致力的重要议题之一。有关苏联“现代化”的研究，见 Richard Lowenthal, “Development versu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Richard Lowenthal, “Beyond Totalitarianism?” and Michael Walzer,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Totalitarianism in Our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3.

自的见解。^① 最令马利亚反感的，是西方苏联学界中有人把斯大林时代描写成由一个从下至上、由“恐怖社会”经过“进步”发展，达到社会“流动”（terror, progress, and social mobility）的“民主现象”，使得勃列日涅夫一代领导人能够由底层脱颖而出，^② 等等。他认为，西方苏联学主流未能透过表象看到前苏联极权主义的本质（第300页），过分注重前苏联集权政治的程度和数量（degree and quantity），而非本质和质量（nature and quality）。在马利亚看来，尽管戈尔巴乔夫对前苏联体制动了大手术，但该体制的基本内核（党政体系、中央计划、警察系统、党务系统等）基本上得以延续（第301页）。

作为苏联史学家，马利亚认为要真正把握现状和洞察未来，必须以史为鉴。首先，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基于乌托邦式的理念。之所以“侥幸”成功，是由于俄国在一战期间的深度危机。革命后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以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对沙俄旧军队的控制，以政治警察（或契卡）来打击布尔什维克的一切“敌人”。在1917-1920年间，有1500万到1900万俄国人死于战乱、饥荒和疾病，其中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式的奢望和执政不力（第305-310页）。三十年代的苏联经济高速发展和1929-1935年代强制性集体农庄运动，造成了600万到1100万人死亡；3000万农民迁入城市从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因此遭受严重破坏，农村生活水平倒退至1913年以前的水平，俄国由一战前欧洲的“粮仓”沦为谷物净进口国，至今元气尚未恢复。

在工业方面，前苏联政府发布的三十年代的年经济增长率为20%；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西方经济学界估计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6%。^③ 此外，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增长极为畸形，绝大部分是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几乎没有发展。整个苏联经济犹如一个庞大的军工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第312页）。而确保这一庞大体系运行的则是1936-1938年间斯大林的“大恐怖”（Great Terror），以此来制止任何可能对其农业政策和“一五计划”的怀疑和批评。马利亚援引西方和前苏联学者的统计，从1936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

① 马利亚把“机构性多元主义”的代表作、Jerry Hough 与 Merle Fainsod 的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一书，与 Fainsod 本人 1963 年出版的 *How Russian Is Rul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相对比，认为后者是建立在“集权主义”模式基础之上。

② 此种观点的主要著作有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78; 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见 Abram Bergson, *The Real National Income of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恐怖”的受害者可能高达 1000 万，而这还是比较保守的统计。^①

在这千万人的受害者中，包括 80% 的苏军军官（第 314 页）。苏军受到如此重创，为何还能在二战中击败德军？马里亚认为是“地利”的原因：苏联幅员辽阔，斯大林有足够空间去换取时间，使希特勒自己犯错误而步步走向失败；同时苏联有时间转移大量军工企业，保存实力，并伺机反击。卫国战争的胜利，使苏共政权拥有了新的合法性；四十年代末的原子弹、五十年代末的人造卫星、七十年代与美国实现了核均势……，这一切华丽的表象，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粗糙内涵。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经济，建立在对资源和人力大量消耗、不计成本的基础之上，在工业化和战时可以有傲人的业绩，但在高、深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就日渐乏力。到七十年代末，苏联的发展模式达到巅峰。1979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同年，苏联的经济增长为零（第 316-319 页）。

后斯大林时代被马里亚划分为赫鲁晓夫的解冻期（*thaw*）、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stagnation*）、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期。对赫鲁晓夫来说，在政治上清算斯大林似乎并不难，一纸秘密报告就可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也可一挥而就。然而赫鲁晓夫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改革前苏联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在马里亚看来，恰恰是因为赫鲁晓夫在三个方面触动了苏联官僚体制的最敏感处，最终导致其下台。首先，赫鲁晓夫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新成立的“地区经济委员会”（*Regional Economic Councils, Sovnarkhozes*），从而削减了中央部门的权限。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把党务系统分为主管农业和工业的两部分，引起众人反对。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赫鲁晓夫力图对重要的党内职务的任期加以规范和限制，触动了一大批党内高层人士的根本利益。赫鲁晓夫在这些国内政策上的失分，甚至超过了古巴导弹危机，最后墙倒众人推（第 320 页）。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 18 年（1964-1982）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被称为“停滞期”。其政策走向包括停止非斯大林化，因为过分贬低斯大林不利于政治稳定；虽然勃列日涅夫政权从未以官方名义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但停止了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迷信”的攻击。在经济方面，由于工业部门的反对，柯西金总理试图用以某种有限的权力下放提高生产效率的政策也裹足不前，工人对工作没有积极性，得过且过，经济效益低下；与此同时，“地下”经济却大行其道，最终导致相当的经济管理部门、党务系统、甚至执法部门“黑社会化”（*Mafiaization*）。到八十年代初，随着前苏联执政的老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脚下，整个苏联的体制已病入膏肓，滑向一座巨大的斯大林式的墓地。

^①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Roy Medvedev, *Argumenti I Fauty*, September 1989, cited from Z, op. cit., note25, p.342.

在马里亚看来，医治这些制度上的痼疾，挽救这一垂死的机体，对经历了 18 年“停滞期”以后上任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以悲剧（drama）收场的改革尝试。然而，戈氏还是知难而进，对已经不可救药的政治、经济体制施以“重建”（perestroika）、“透明化”（glasnost）和民主化“三板斧”。戈尔巴乔夫的重建政策始于 1985 年 4 月，目标是为举步维艰的苏联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以加速经济发展；为此，戈尔巴乔夫问计于专家学者，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对政府经济部门进行改组和合并，撤换了一大批官员；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酗酒运动，实行质量检验制度。然而这一切均未能重振经济，反而适得其反：反酗酒运动迫使伏特加的销售转入地下，国家失去了一大笔收入；质量检查制度使大批企业完不成利润计划，收入下降；机构调整和人事变动又使各级官员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到 1986 年秋，戈尔巴乔夫的各项“重建”政策均遇到重重阻力。

不得已，戈尔巴乔夫发起了“透明化”运动（glasnost），力图通过知识界和舆论，营造开放、改革的气氛，对体制内的官僚体系和僵硬的思维方式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甚至亲自打电话给正被流放的萨哈罗夫（前苏联主要持不同政见者），请他“出山”并保证其言论自由，希望他能改革推波助澜。其结果是苏联的政治生态急剧分化，自由/改革派的交锋日益白热化，来自反改革派的阻力也越来越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利加乔夫（Ligachev）指责说，自由知识分子的批评会使苏联的体系、传统和价值观念毁于一旦（到 1989 年，前苏联的几乎所有政治和价值观念都受到公开指责、批判和诋毁）。对此，戈氏的改革派认为，不存在除了重建以外的任何其他选择；如果苏联经济继续停滞，苏联会很快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以致亡党亡国。到 1989 年初，由“透明化”运动引发的改革和保守派之间的辩论白热化，并在苏联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中造成强烈的危机感。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败笔是打开了遍及苏联各地的分裂、分离运动的闸门。就在改革、保守两派争论不休、苏联经济每况愈下时，前苏联除俄罗斯以外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日趋明显。从 1988 年初到 1989 年，在亚美尼亚、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来自底层的分离运动与经济保障、政治民主、个人自由的各种诉求合为一股力量，严重地动摇了各地党政机构权力的合法性；戈尔巴乔夫的“透明化”运动实际上对各地的分离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一切是改革的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马里亚认为，前苏联领导人之所以错判形势，是由于俄罗斯中心主义（Russocentric）的自大和天真。诚然，俄国在二十世上半叶已攫取了周边大片疆土，但俄国人在这些地区统治的合法性一直是个问题。戈氏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要削弱中央官僚体制，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周边地区控制的削弱。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第 325-326 页），但戈尔巴乔夫却完

全忽视了民族分离、分裂的危险。

“重建”苏联经济未果，推动政治“透明”受阻，戈尔巴乔夫最后在 1989-1990 年启动激进的民主化进程，以期解开苏联政治、经济的死结。根据马里亚的观察，1989 年的民主选举苏维埃人民代表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一向令人生畏的苏共一夜之间开始惧怕平民百姓了（第 327 页）。在 1989 年 5-6 月间，苏联电视台在两个星期里实况转播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代表实际上把大会变成了对苏共进行控诉和批判的大会。与此同时，大会并未就困难重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到了 7 月份，苏联各地开始出现各种形式的公民社团，实际上开始干预和管理地方事务。至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入死胡同。其结果是旧制度瓦解的速度远超过新体制建立的速度，或者说破旧而未立新。更确切地说，1989 年苏联的问题是旧制度拒绝死亡，而新制度无力出生。到当年秋季，莫斯科已有政变的传闻（第 331-332 页）。至此，前苏联制度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了。

马里亚的这篇文章止笔于 1989 年底（*Daedalus* 杂志 1990 年 1 月号），离莫斯科的“8·19”政变还有 20 个月。事态的发展从多方面验证了其逻辑和预测的准确性，正如马里亚在该文一开始引用法国作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之日（The most dangerous time for a bad government is when it starts to reform itself）”。而在这同时，西方苏联学的主流仍陶醉在对戈氏改革的赞歌之中，中情局也仍在编织苏军强大的神话，美国高层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寄予厚望。

四、X 与 Z：非主流派的沉浮

从凯南冷战宣言式的“X”长文，到苏联解体前夕马里亚的“Z”调“挽歌”，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走过了 43 年轰轰烈烈的历程。在政府、军方、情报界、学界和私人的合力下，形成了美国“外国研究”（foreign studies）最庞大的“国别/地区研究”（country/area studies）体系，同时也对西方/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二者之交叉、借鉴和互补，几乎难分彼此，构成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环节。由此产生的众多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反过来又影响着苏联研究的发展。

X 的身份是外交官，Z 则终身执教。两篇文章发表时间相差近半个世纪，但都文笔犀利，逻辑严密；谈古论今，一气呵成；不仅有论述，也有政策建议。虽然二人侧重点不同（凯南侧重苏联的外部行为；马里亚则聚焦于苏联内政），“X”“Z”二文在西方繁缛枯燥、过分学究式的书山学海中，都有相当的可读性。在方法论上，二人都是从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都因发表匿名文章而名声在外，然

而二人在各自领域（政策界和学界）内却均不得志。凯南出名后，美国外交界和政策界日益强烈的意识形态化，使他倍感忧虑又无回天之力，只好自我“流放”到学界。马里亚在成名前的几十年间也难以苟同学界四平八稳的实证主义流派，于是对苏联的看法日趋极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凯南与马里亚的为学和个人境遇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对前苏联体制和行为的认知方面，二人几乎是南辕北辙。

马里亚对前苏联政治史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有强烈的价值观取向，对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与事事考证、自我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社会科学主流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完全不同，倒是与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更为相近。二战以后，西方苏联学一度由“集权主义”模式主导；此后社会科学的发展陆续开辟了众多的模式，比如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ism*）、官僚/机构模式（*bureaucratic-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研究等。这些治学路径（*approaches*）和方法论被陆续引进苏联学，对传统的集权模式造成强烈冲击，并从六十年代起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在西方的苏联史学界，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蒂芬·科恩（*Stephen F. Cohen*）1980年出版的《布哈林传》^①，以及影响了西方整整一代新左派的伊萨克·戴舍尔（*Isaac Deutscher*）三卷本的《托洛斯基传》^②，对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并不完全否定，而是认为苏联有可能回到类似二十年代那种更为入道的新经济政策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西方苏联学在六十年代“转向”、致力于寻找和发掘一个“正常的”苏联，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内部的政治走向息息相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深陷越战，经济不振；国内政治危机重重，暗杀成风（肯尼迪总统和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分别于1963年和1968年遇刺身亡），民权和反战运动高涨，美国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制度对立面的苏联似乎蒸蒸日上，对西方左派和自由派人士有强烈的吸引力。像戴舍尔这样探求人性化共产主义的学者，在学界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中的影响力剧增。西方/美国学界一直由中间偏左的自由派占据，乃是六、七十年代新左派运动的惯性使然。而在西方知识界向左转的大潮中，马里亚认为根本不存在人性化的共产主义。在他看来，列宁的新

①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伊萨克·戴舍尔分别于1954年、1959年和1963年出版了托洛斯基的三部传记：*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1954),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1959),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1963), 见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Trotsky: 1879-1940*, Vol.1-3, Verso, 2009. 出生于波兰的戴舍尔二战时移居英国，后在西方多所著名大学讲学。其托洛斯基的传记是戴舍尔在哈佛大学多年研究的结晶。

经济政策不过是通向集权的第一步，戈尔巴乔夫主义不过是这一制度的最后挣扎而已。^① 这种“极端的”、非学术的观点，在西方的苏联学界无疑属于“另类”，并一直被边缘化。^② 在此种大环境下，马里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学界那些他认为只注重表象的经验主义学派缠斗，而最终以Z文震动学、政界。两年后苏联解体，马里亚从伯克利退休，功成名遂。

五、苏联之命运：在必然与偶然之间

马里亚虽然相对准确地预见到了苏联的解体，但这更出于他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信念：即苏联的制度是邪恶的，而邪恶的制度是不可能持久的。事态的发展与其说验证了马里亚的预测，不如说是实现了他的企盼。在治学/研究方式方面，无论从历史或逻辑的角度，马里亚都并非无懈可击。从历史上看，前苏联的政治制度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集权”特征多多少少是承袭了俄国传统制度的特色。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农奴制在欧洲绝无仅有，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沙俄逐渐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马里亚一味淡化或贬低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历史意义，认为苏联制度本身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断定该制度必定消亡。然而这并不能抹杀一个基本事实，即对前苏联绝大多数人来说，后斯大林时期政治运作的方式和制度的包容性，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少，斯大林时期人人自危的恐怖感已大为降低，一般民众和官员的日常生活开始了某种“正常化”。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是通过政策而非政体的改变而实现的，社会和民众所付出的代价显然比革命性的变化要小得多。同样的道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政治至少在体制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在对外政策方面，戈氏对东欧和阿富汗不仅仅是“撒手”，而且是一种在哲学上和道义上与前苏联以致俄罗斯传统的帝国理念告别。戈尔巴乔夫这样做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的，没有勇气和魄力的平庸之辈难有如此境界。而美国的政治精英在对周边小国和弱国的政策上，一直在实行门罗主义；不仅如此，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实际上是将门罗主义放大到全世界。

戈尔巴乔夫国内改革的最后失败是悲剧性的，但并不能因此断定其改革动机就是为了维护在马里亚看来是“邪恶”的制度。戈氏改革裹足不前，最终失败，不仅有众多必然的和结构性的因素，而且不排除偶然因素。事实上，造成改革后期急转直下的局势是有多种变量的。社会变迁与自然界的自然变化不同，是不大可能加以精确

^① 见 *The Soviet Tragedy: 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1917-1991*, Free Press, 1994.

^② Michael Kaufman, "Martin Malia, 80, Soviet-Era Skeptic,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2004, <http://www.nytimes.com/2004/11/24/obituaries/24malia.html>.

预测的。尤其是苏军在改革后期逐步政治化，为1989—1991年的苏联政治动荡注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① 在更深的层次，马里亚在Z文中为前苏联的历次改革所设计的“要么不改革——要么打碎一切”的两个极端的结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主要思想流派的极端性。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力图严格按照自身的模式和逻辑改造世界，都追求各自体制的最高纯洁度和完美性，都拒绝第三条道路，都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看作是零和游戏，毫无妥协的余地。马里亚的思维方式就是此种极端宗教性的、僵硬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也是违反常理的。现实是一个充满灰色地带、黑白皆有、善恶混杂的“浑沌世界”。戈尔巴乔夫在内外政策上的改革，实际上走出了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的零和式思维。凯南的现实主义也排斥意识形态的极端性，可惜在美国难有容身之地。

其实就是在马里亚执教的美国，宪法保护下的自由也一直是是有条件的。马丁·路德·金所称的“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在二战以后一直在容忍甚至纵容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②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精英最终放弃种族隔离，实行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与前苏联争夺道德制高点。一个在美国看来是“邪恶帝国”（evil empire）的前苏联，客观上迫使美国向更民主、更平等的社会迈出了一大步。以此观之，戈氏改革的最大失败，是在国际体系层面造成严重失衡：侥幸获得单极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实际是在情不自禁地走向帝国。而且，它不仅在国际上为所欲为，在国内政策上也开倒车，开始逐步放弃很多对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③

与马里亚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和“先苦后甜”的经历相反，凯南则更注重前苏联

① 苏军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政治化”，表现出以下若干现象：（1）1989—90年的选举改革，首次允许苏军参与推选军人代表参加选举并进入最高苏维埃。而在改革后期的动荡时期，军人代表往往“被迫”在不同的政治派别中进行选择。（2）由此导致一些少壮军官质疑甚至公开挑战上级。

（3）1990年初开始，苏军和苏内务部高级将领日益强烈要求对国内的分离主义倾向和动乱采取强硬措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事实上，苏军作为一个整体，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满，主要原因是从东欧撤军、与美国达成中导协议等，对苏军的利益和士气损害极大。（4）俄罗斯联邦1990年总统选举中，两位总统竞选人叶利钦和尼古拉·瑞斯科夫（Nikolai Ryshkov）的竞选搭档都是军人，苏军内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态度已呈分裂状态；政客也竞相拉拢军中派别以壮声势。（5）苏联党、政、社会日益深化的改革与保守的分歧，也在苏军内部日益显现，最终驱使苏军保守派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但苏军本身已经严重分裂，军中改革派随即反击，使政变迅速瓦解。详见 Yu B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Transition of Communism: China and Russia”,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Russia*, vol. 4, no. 3/4, New York: Nova Science, 1995, pp. 237-246.

② 见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King, Jr.]”, 16 April 1963, http://www.africa.upenn.edu/Articles_Gen/Letter_Birmingham.html.

③ Yu Bin, “America’s War against Racism”, *Asia Times online*, June 26, 2003, 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EF26Aa01.html.

对外政策的“行为”（behavior）。他对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关注在于其与对外政策的关联，对苏联内政事务则静观其变，由此认为美国和西方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的对外扩张加以遏制。^① 其实X文有两个版本。在1946年初凯南即将卸任美国驻苏使馆代办前发给华盛顿的5300字的“长电”中，把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定义为“俄罗斯传统的和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只是在俄国革命后，这种不安全感才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② 凯南的电文引起了对苏强硬派海军参谋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的注意，他力促凯南将此电文公开发表，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外交季刊》1947年7月号的X文。然而X文中，只是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定位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源，完全不提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传统”的不安全感，这当然包括十九世纪初拿破仑侵俄，更不用说不久前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无独有偶，X文发表前四个月，杜鲁门总统在对国会的演说中，也借用凯南的“遏制”概念，正式推出“杜鲁门主义”。在演说中，杜鲁门强调世界已分为自由与集权两大阵营，美国必须以4亿美元经援军援土耳其和希腊，以制止苏联对这两个国家的“侵略”。在演说中，杜鲁门也只字未提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仅仅把苏联描绘成意识形态的洪水猛兽。凯南事后对杜鲁门政府的“断章取义”十分不满，认为杜鲁门主义严重歪曲了他的本意，由此引发的冷战过于意识形态化、过于强调武力的作用。他认为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援毫无必要，而且会挑衅苏联。不仅如此，凯南在以后近60年的余生里，致力于反对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中日益军事化、意识形态化和泛道德化的趋向。^③

X和Z文及其作者的经历，仅仅是美国和西方在冷战时期苏联研究巨大冰山的一角。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代表这一领域中的“诸子百家”，然而却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角度折射出这一领域中主要学派，以及这些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凯南和马里亚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文章发表前后的个人经历和命运。凯南以X文出名，却因美国的对苏政策日益意识形态化而逐渐远离决策中心，几乎成为“体制外”人士。但他却仍坚持现实主义的观点，直到2005年辞世。Z文的意义在于，走向斯大林墓

①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pp. 60-72.

② Barton Bernstein and Allen Matusow,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1966, pp. 198-212. 凯南的“长电”全文，见<http://www.gwu.edu/~nsarchiv/coldwar/documents/episode-1/kennan.htm>.

③ 关于凯南的“失宠”经历，见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pp. 61, 66-67, 69, 70-71, 104, 134, 208-209; 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日益军事化、意识形态化和泛道德化的趋向，见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Y: Touchstone Books, 2001; George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expande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Walter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175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nd edition, 1994.

地的不仅有苏联体制，还有伴随着这一体制的西方苏联学。美国的苏联学也由此改头换面为俄罗斯学或欧亚学（Eurasian studies）。

六、理论、常识与决策

凯南和马里亚二人的经历，还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即美国的苏联研究与美国的对苏政策之间的“不同步”现象。美国/西方学界在六十年代以后逐步走向非意识形态化，至少主流是如此。与此同时，美国的对苏政策和整体外交政策，除了尼克松政府的短暂时期，基本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① 究其原因，这既有无处不在的麦卡锡主义，也有“美国特殊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缘故。^② 美国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霍斯泰德尔（Richard Hostadter）曾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命运不是有没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It has been our fate as a nation not to have ideologies but to be one）。^③ 在这一基础上，北卡大学历史学家马克·亨特（Michael Hunt）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中，描述和分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三个组成部分：1）民族自大情结（feeling of national greatness）；2）以种族和肤色来区别和看待他国人民；3）怀疑、惧怕和反对革命。^④ 总之，作为一个没有深层文化的移民国家，美国必须以意识形态作为其民族凝聚力。^⑤ 对于美国对外政策中非现实的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在“9·11”数月出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六、七十年代深陷越战而不能自拔，不是因为美国过度使用武力，而是由于美国过度推行其价值观。不考虑历史条件而滥用道德标准，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到了克林顿时期，美国除了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外，已无真正的外交可言了。^⑥

一个拥有阵容最强大的国际关系学的国家何以“没有”了外交？拥有最庞大的苏联研究和最强大的情报系统的美国为何没有预见到苏联局势急转直下的可能？而这些失误与西方对苏联研究的投入根本不成比例。原因何在？是研究资料的问题还是判断有误？是价值观念的问题还是方法论的问题？其实美国学界和情报界的地区

① 见于滨，“‘9·11’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海美国研究所，论文，2006年6月。

② 引自 Godfrey Hodgso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

③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Ibid

⑤ Samuel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⑥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Y: Touchstone Books, 2001, chapter 1, pp. 236, 258.

研究 (area studies) 不是第一次犯类似的错误。包括对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判断, 对伊朗、朝鲜、日本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甚至“9·11”恐怖袭击, 都曾出现过巨大误差。在苏联学和地区研究以外,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也常常对研究对象误读、误判、误导。^①

上述问题可以从多方解读。然而学界和政策界的“不对称性”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即有效的外交并不一定依赖学术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 外交更是一门艺术而非学术, 其成败取决于领袖人物和精英团体的战略洞察力, 而非简单地依靠对对方的大规模的技术性侦查; 是把握战略机遇的大智大勇, 而非时时处处标榜自身、贬低他人的小动作和小聪明。而这些外交的艺术和智慧在美国的对苏和对外政策中, 似乎是日益短缺。2009 年 1/2 月号的《国家利益杂志》刊登了安德鲁·克莱比奈维茨 (Andrew Krepinevich) 和白瑞·沃茨 (Barry Watts) 的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少了什么?” 的文章, 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部门的战略判断力和决策力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下降, 这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评估、战略和政策。^② 相对来说, 20 世纪前半叶, 美国在国际社会以外交为主导, 军事上后发制人, 其业绩可圈可点。这包括 1900 年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不费一枪一弹就获得了进入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权利, 又在名义上维持了中国的“统一”; 1905 年小罗斯福总统在日俄之间调停, 因此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私下里又得到了日本对美国侵占菲律宾的认可; 美国在一战各交战国筋疲力尽时介入欧战, 1919 年又以民主和民族自决的道德制高点, 打开了美国介入欧洲和国际事务的大门; 甚至美国在 1941 年以前的中立政策, 都是美国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缘战略资源, 从交战各方攫取最大利益。为此, 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杜鲁门曾说: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上风, 我们就应帮俄国; 如果俄国占上风, 就要帮德国。让他们自相残杀好了, 尽管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希特勒赢。”^③

可以说, 美国大战略意识衰落的拐点是越战。历时 11 年 (1964-1975)、耗费万亿美元越战的越战, 除了造成数百万的伤亡以外, 美国所得到的唯一的“积极”遗产, 恐怕只是历久不衰的百老汇保留剧目《西贡小姐》(Miss Saigon)。孜孜寻求敌人、刻意夸大对方实力, 从来就是中情局的“职业病”。这包括肆意夸大前苏联的实力, 断定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与此同时, 美国庞大的情报体系居然未能感受到“9·11”恐怖袭击前山雨欲来的种种迹象。就此, 英国记者乔纳森·帕维尔 (Jonathan

① 见于滨: “‘9·11’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上海美国研究所, 论文, 2006 年 6 月。

② Andrew Krepinevich and Barry Watts, “Lost at the NSC”, *The National Interests*, January 6, 2009,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aspx?id=20498>.

③ 见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p.7.

Power)在“9·11”三天过后一篇题为“世人皆知，只有美国蒙在鼓里”的文章中指出，恐怖袭击是针对美国在九十年代的一系列政策。美国在巴以冲突、全球温室效应、海外驻军、反导等一系列问题上唯我独尊的(take-it-or-leave-it attitude)处世方式，使美国处于自我毁灭(self destructive)的境地。帕维尔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傲慢与偏见，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报复。任何政治运动都可能产生诉诸暴力的少数极端分子，但这并不等于这些运动的主流是错误的，它们总是事出有因(elements of truth)。对此，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唯有美国由于其大部分政治领袖和媒体的自我封闭而蒙在鼓里，对“9·11”袭击大惑不解。^①

其实，国与国相处的最基本的原则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老话。在美国学界中，除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以外，绝大多数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定义、假说和概念，似乎连这一基本常识都不具备。在美国的外交和对苏政策中，兼顾对方利益的想法和做法更是少见。对此，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美国是对苏联对外干涉主义最严厉的批评者，但美国本身却从未接受过不干涉内政的原则。”^②冷战期间，前苏联的核报复能力可能是唯一使美国保持自身行动平衡的清醒剂；而美国三权分立的内部结构，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制衡作用。^③

【Abstract】 Sovietology was a huge enterprise in the West. This study tries to identify places where Western/American Sovietolo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theories and policies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intersected and interacted. This paves the way for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West's study of Russia and Eurasia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For this purpose, two articles—one by Mr. X in 1947 and the other by Mr. Z in 1990—are chosen because they represented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Western Sovietology. They are also intersecting and interactive points between academia, policy-making, area (Soviet) studies and IR theories in the West.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Western academic studies and actual Western policies towar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ere not necessarily symmetrical; they may even diverge to opposite directions. In those 43 years between X and Z, U.S. policies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were consistently driven by a strong dose of ideology, while those realists such as George Kennan wer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Meanwhile, U.S. intelligence failures regarding the Soviet Union were also common. In contrast, main-stream Sovietology became more “academic” with an tendency to perceive the

① Jonathan Power, “Everyone but US could see it com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4, 2001.

②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p. 237.

③ 见 Steven Hook, *U.S. Foreign Policy: The Paradox of World Power*, 3rd ed., CQ Press, 2010, 第五章。

Soviet Union as a “normal” state, which was considered by Mr. Z (Martin Malia) as “pro-Soviet.” Z’s 1990 critique of the Western Sovietology, though not necessarily fair, happened to be an almost perfect prediction of the Soviet demise.

【Key Words】 Sovietolo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George Kennan Martin Malia

【Аннотация】Советология на Западе — это большая и слож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оиск точек пересечения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советологией на Западе / в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западными теория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а также политикой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кладывает крепк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 Евразии, а также политик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на Западе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 1947 г. и 1990 г. Джорджем Кеннаном и Мартином Малия статьи под псевдонимами «X» и «Z», не тольк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отправную точку и окончани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Запад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о также они образовали точки пересечения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кругам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и теори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вопросах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научным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кругами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сегда шло в ногу, иногда их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ыли диаметральн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ми. В течение 43 лет, в политике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ильна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краска, с мнением реалиста Кеннана не очень считались,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допускало ошибк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ругов, основ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ауч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 Западе с каждым днём становилось всё более академичным, всё чаще учёные с «нормальны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и бывши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аблюдалось также немало полагаемых Малия «просоветских» тенденций; критика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почти иде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в статье под псевдонимом «Z», по сути,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критико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ветологии на Западе и в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хотя эта критика в некоторой степени не очень справедли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Западная совет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ССР, Кеннан, Мал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朋友还是敌人？*

——1991年后美国的俄罗斯政治研究

彼得·拉特兰**

【内容提要】苏联的解体与转型对国际关系格局影响深远，对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1991年起美国公开发表的俄罗斯政治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通过对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主要议题的总结和评价，可以发现这20年间，俄罗斯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声望日渐衰落。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资金削减，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科学更倾向于进行数理分析，国别研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此外，俄罗斯转型与西方的预期和希望不符，也减弱了美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研究的兴趣。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研究 美国“区域研究” 解体 转型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1-0087-(23)

导 言

本文以对美国政治学家俄罗斯研究情况的一些全面观察为开端，随后论述了自1991年起公开发表的大量俄罗斯政治研究成果。本文说明了研究的主要论题和争议，介绍了每个论题上最为广泛引用的著作。

苏联的兴衰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苏联体制持续吸引了学者和学生们的注意力。苏联突然而且出乎意料的崩溃使得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许多核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JJD810005）的阶段性成果。

** 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政府系（Government Department），教授。

心原则受到质疑。现有理论难以解释这个有着强大军事力量和完整机制的政治体制的突然消失。

取代苏联的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轨迹引起了一系列新的但是同样有趣的难题和挑战。后苏联国家面临着三重转型：独立的民族国家取代多民族的“帝国”(empire)；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崩溃后建立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的一党专制转型为自由民主制（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制）。一些后苏联国家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甚至成功加入了欧盟，另一些国家却后退到了党派政治或是严酷的独裁专制。该地区呈现出了吸引学者们的很多难题，从如何在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建立法治，到如何解决分裂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分离主义者冲突。

转型已经持续了 20 年，但是直到如今专题论文才完成，更多的关于这些复杂转变进程的精妙分析开始公开发表。然而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动态比苏联时更为复杂和分化，对该地区的研究和教学也更具挑战性。很多教授将其学术和教学重点缩小至俄罗斯本身，而其他教授分别就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中亚或高加索进行研究和教学。但是对大学科的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说，后苏联转型的完整蕴涵并没有完全得出。学者们仍然对令人失望的转型结果——民族冲突，经济不景气和政治压制——能多大程度地归因于苏联时期的文化遗产，20 世纪 90 年代制度化方案的失败或是周围国际体系所产生的外部力量的影响上意见不一。

因为以下所述的原因，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俄罗斯研究的声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前十年中经历了衰退。正如我们所见，很多美国使用的该主题的关键文本是由在欧洲和俄罗斯工作的学者或是美国记者所著，而非是大学研究人员。所以，得出美国学术界尚无法处置理解俄罗斯后苏联时期转型的智力挑战的结论似乎是公正的。

俄罗斯地区研究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高校大规模扩展，成为了很多研究领域的世界领袖。冷战的开始，尤其是苏联在 1957 年发射人造卫星，使得美国政府相信科学进步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了社会科学。

这种现代战争在二战中的体现就是全部国家的冲突。胜利将属于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国家。因此，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传统在二战中确立，包括成立特别中心研究日本和德国。这些中心发起对即将赴战的军官的语言培训，参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的交叉学科研究。这种努力基于民族文化形成有机整体的设想。因此，为了战胜日本，必须了解日本人战斗意愿背后的深刻根源。

1945年后，这种方法延至对新敌人苏联的研究。^①俄罗斯研究所——后来的哈里曼研究所(Harriman Institute)——于194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俄罗斯研究中心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成立，分别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s)和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s)资助。在随后的日子里，政府拨款和合同为这些中心和其他中心的扩展提供了资金。他们招待了许多学者并最终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苏联及其历史和文化起源的博士。这些中心的学者与中情局、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政府研究员紧密合作。一些学者直接进入政府机构，并强烈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如成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国家安全顾问的哥伦比亚大学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教授(Zbigniew Brzezinski)，或者加入罗纳德·里根国家安全委员会(Ronald Reagan'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国的研究同其他国家研究的隔离有些不寻常。这却因为共产主义被视作独特现象——和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直接威胁的事实而合理化。此外，这些区域研究中心的一个科学优势是它们交叉学科的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很多大学校长抱怨各个学科的权力和自治，呼吁知识综合。所以这些区域研究中心是校园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能够与历史学家和文学专家一同坐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

苏联地区研究专家网络在20世纪80年代仍继续收到大量的政府资金。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总书记的身份到访刺激了学生对苏联研究兴趣的激涨。那时的感觉是历史性的变化正在发生，学习和研究苏联将有新机遇。注册学习俄语课程的人数激增，在1990年达到顶峰。然而，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崩溃削弱了苏联研究的繁盛。苏联不再，何以研究？

1991后对俄罗斯区域研究的兴趣衰退

很明显一旦冷战结束，俄罗斯不再构成对美国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威胁，美国政府资助俄罗斯研究的动机大减。只有少数几项由政府或私人机构资助的大型研究项目：最重要的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俄罗斯选举研究^②和研究死亡率和发病率的俄罗斯纵向监控调查（起初由世界银行资助，之后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政府提供给一些后苏联地区研究的资金削减，虽然一些新的私人募捐的流入——使得比如说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俄罗斯和后苏联研究的哈佛格斯特中心的成立成为可能。大多数现有的中心变更了名字，去掉了“苏联”(soviet)，通常加上“欧亚”(Eurasia)以表明

^① 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Timothy Colton, *Transitional Citizens: Voters and What Influences Them in the New Rus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它们对中亚的兴趣。因此，哈佛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成为了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

由俄罗斯研究资金流入减少相应的是政治科学家放弃将俄罗斯作为特例研究。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同的时候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自它似乎相当成功而且有能力挑战西方体制霸权起。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大学经济学系一般都会有专家讲授比较经济制度。但是由于俄罗斯正在成为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其处于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的普遍包括法则之下。这些国家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但是它们都被视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相同发展逻辑的影响。

苏联的垮台正是政治科学的大趋势在于将研究和教学带离一般的区域研究之时。美国政治研究长期主导美国的政治科学。美国政治的研究议程、概念研究和分析技术倾向于主导该领域，特别是通过重要期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评判。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易被看作是独特和有瑕疵的。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有股对分析系统化的强烈推动力，通过正规模型和量化技术的使用来检验严密阐释的假设。举足轻重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派主张理解政治的最佳方式是将其作为理性个人战略性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大量标准数据集的编制是为了让这类研究更为便利。

比较政治学的学生们难以对缺乏数据集甚至没有生成这些数据（例如定期的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化组织的其他国家应用这些技术。^①然而，新的量化方法稳步占据优势，特别是在对该行业其余部分起带头作用的美国家主要研究机构中。20 世纪 90 年代，有一些从偏好更为定量和制度化方法的政治科学家中撤退。他们称自己为“新思维运动”(perestroika movement)——借用了戈尔巴乔夫的词汇来表明改革的必要性。^②（没有一个“新思维运动”的成员本身是研究俄罗斯的。）这场运动获得一些成功，这些政治科学家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委员会中赢得一些席位，并劝服他们创办了一份新杂志《政治科学》(PS)。但是，总体上量化模型方法占据优势。相似的趋势——用量化分析假设的偏好——在国际关系的众多分支领域中盛行。这意味着，举例来说，越来越少的研究员分析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进程。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有一些撤退——建构主义学派主张文化的影响，认为研究国际舞台上玩家的话语和身份至关重要。他们还指出对当今世界的分析不能完全集中于国家和国家间组织，因为非国家主体扮演了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角色。

① Carles Boix and Susan Stok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Kritsen Renwick Monroe,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仍有一些国家被认为独特到需要研究员的专门研究和大学级别的关于它们政治制度的专门课程。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因其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而被视为美国的敌人，所以日本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继续保持稳固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也需要单独的关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其经济开始起飞后尤为如此。在美国，中文及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学习经历了繁荣期。但是俄罗斯研究不再同日本或中国研究有一样的重要性。美国各政治科学系逐渐停止聘用俄罗斯研究的专家。相应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受聘的“苏联问题”(Sovietological)教授一代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退休，他们没有被俄罗斯政治的新教授替换。各系不再觉得需要一名俄罗斯专家或是讲授俄罗斯政治的课程，就跟他们不需要巴西专家或者印度专家一样。越来越少的新工作职位指定俄罗斯作为关注领域。2010 秋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招聘列表上，全美国没有一个单独的职位提到俄罗斯是一个需要专家意见的地区。对俄罗斯兴趣下降的消息很快传递到培养政治科学博士的研究型大学。事实上，政治科学中区域研究的整个想法都在衰退。研究生们认识到学习新的统计软件包比新语言更为重要。越来越少的政治科学家会不辞辛苦地花费一年时间去国外进行实地调查。相反，他们被鼓励在研究中包括两三个或是四个国家。他们通常不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只是依靠二手文献和为期几周而非几个月的实地调查。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以对国家杜马发言或是俄罗斯环境政策的著作的详细分析为基础的写作型博士。没有这类博士，关于这些题材的出版书将会更少。

经济学系对俄罗斯兴趣下降的问题比政治科学系的更为严重。在过去的 10 年中，只有两三所美国大学聘用了以对俄罗斯经济的专业知识而闻名的教授。然而在其他学科，俄罗斯进展较好。历史系学生仍然对俄罗斯“特殊道路”(special path)着迷。20 世纪 90 年代见证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对西方学者完全封闭的档案的开放。这意味着历史学家要补上 70 年的历史。任何美国大学历史系都仍然认为需要一名俄罗斯专家。相似地，人类学家感到兴奋，由于之前大部分被禁止实地调查的新地区——包括许多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北部具有近代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的传统民族——的研究前景良好。

由于苏联崩溃和政治科学远离区域研究的普遍趋势，美国学术界对俄罗斯的兴趣骤减——比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兴趣下降更快。很明显各个大学没有做好充足的基础研究为美国政府和商业界与莫斯科交易提供专门知识。俄罗斯仍是世界舞台上一位重要玩家：因为其核武器储存，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商，还因为其

在从中东到巴基斯坦的不稳定弧形带的战略性位置。^①但是美国大学或研究机构发表的关于这些主题的新研究不多。

因此，在美国大学里用于讲授俄罗斯政治和对俄罗斯后续发展有兴趣的其他政治科学家视为原始资料般依赖的大部分关键文本不是由美国教授所著。它们是由记者所著，如彼得·贝克(Peter Baker)、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a Freeland)、安德鲁·杰克(Andrew Jack)、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以及爱德华·卢卡斯^②(Edward Lucas)；在英国而非美国工作的学者，例如阿奇·布朗(Archie Brown)、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以及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或者是俄罗斯学者，特别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尼古拉·彼得诺夫(Nikolai Petrov)、莉丽娅·舍夫佐娃(Lilia Shevtsova)，以及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y Trenin)。华盛顿智库中的全职俄罗斯专家数量减少至不到一打：彼得森研究所(Petersen Institute)的安德斯·阿斯朗德(Anders Aslund)，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Progress)的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卡内基基金会的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和克利福德·加迪(Clifford Gaddy)，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和萨拉·门德尔松(Sarah Mendelson)，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罗伯特·欧瑞塔格(Robert Ortung)以及凯南研究院(Kennan Institute)的布莱尔·卢布(Blair Ruble)。他们大多数从事政策摘要撰写而非进行学术研究。

当代俄罗斯政治分析

这部分回顾了俄罗斯政治研究中的一些主题和争论。显然由于空间限制，本文不得不进行选择而无法面面俱到。此外，回顾将只集中于俄罗斯研究，不考虑日益增加的对俄罗斯之外其他后苏联国家政治分析的纪实文献。

转型争论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采用民主制和市场机制因而明显趋向于西方模式的事实致使对后苏联转型的兴致高涨。俄罗斯是宪法撰写和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试验田。学者们对将西方制度引入未经开发的后苏联土地有着对某种自然实验前景的兴奋感。之前没有研究过苏联的学者和实践者涌入莫斯科。最具争议的例子是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其同哈佛的同事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在俄罗斯私有化项目的特定部分设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关于他们角色的争议在威德

^① James Collins and Matthew Rojansky, "Why Russia matters", *Foreign Policy*, 19 August 2010.

^② 这些记者中只有贝克是美国人，弗里兰是加拿大人，其余都是英国人。

尔的书得到详述。^①)

此外，苏联分裂成 15 个独立国家的事实意味着可以进行跨国分析。为什么苏联的一些部分成功转型而其他的却失败了？这些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政治行为者的政策选择还是美国或欧盟援助等外部原因？或是苏联成员国初始情况不同的结果——共产党统治下明显相似的制度化结构所掩饰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结构差异？这些是有趣而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易于在对被称之为“转型学”(transitology)的热忱中迷失。^②转型的致命缺陷在于其结构的目的论：其假定社会组织只有一种基本逻辑——“西方模式”(Western model)——所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朝着自由民主制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相同终点行进。

当俄罗斯发生的事件没有符合预期路线时，转型范式很快变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于 1993 年 10 月炮轰人民代表大会及在 1996 年人工操控改选表明了真正的民主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在俄罗斯的议程中。1995 年围绕着贷款换股权私有化的腐败和犯罪行为的激增说明了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与美国或欧洲的相当不同。1998 年毁灭性的贬值和违约使得进行第二轮自由化经济改革的希望破灭。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 1999 年的掌权是对那些一旦叶利钦卸任政治争论将会复活的期望的一次打击。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苏联遗产

一旦俄罗斯将融入西方世界的信念消失，关注便转向到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和历史遗产上。苏联的过去给后苏联的现在带来沉重负担，但是难以衡量苏联时期的思维和惯例仍然影响新民主制和市场机制行为的程度。

估算 1917 年之前沙皇历史的持续相关性更难。自 1991 年起——特别是在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政府试图创建一些与沙皇过去的关联，恢复了一些 1917 年前的标志以及修复了作为俄罗斯身份一个组成部分的东正教堂。历史学家认同俄罗斯历史上强烈的连续性源于其地缘政治位置：需要一位保持广阔领土完好无损的强势领导的感知；国家在 1700 到 1990 年欧洲势力均衡中决定性的作用；其与欧洲文明的复杂关系：是欧洲的一部分却又远离欧洲。^③但是西方学者对于俄罗斯独特的历史道路使其难以完全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制和市场资本主义等制度的限度意见不一。

瑞典经济学家斯蒂芬·赫德兰(Stefan Hedlund)主张这些深刻的历史模式持续影

① Janine Wedel, *Collision and Collusion: The Strange Case of Western Aid to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001.

② Valerie Bunce, "Should Transitologists Be Grounded?", *Slavic Review*, 1995, 54:1, pp. 27-111; Jordan Gans-Morse, "Searching for Transitologists: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and the Myth of a Dominant Paradigm", *Post-Soviet Affairs*, 2004, 20:4, pp. 49-320.

③ Marshall Poe, *The Russian Momen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McDaniel, Tim. *The Agony of the Russian Id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响当代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形成，但是大多数美国学者没有将历史视作民主无法在俄罗斯实现的约束。^① 希尔和加迪提到苏联的规划家们在遥远的地点发展工业的决定使得俄罗斯无法在一夜之间转为市场逻辑，因为千万的俄罗斯人将不得不放弃他们生活的城市。^② 几乎没有政治科学家已经解决苏联遗产本身的问题。这是文化人类学家更为公开讨论的主题，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通过采访和个人信件追踪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统治后期苏联意识形态的衰败；^③谢尔盖·乌夏金(Serguei Oushakine)在西伯利亚的巴尔瑙尔研究过去的牺牲对俄罗斯人身份的影响力。

解释苏联的瓦解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任命使得导致苏联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的瞬间解体的一系列事件开始发生。这个复杂的进程既有内因（开放政策和新思维改革），也有外因（冷战结束和苏联从东欧撤退）。考克斯在20世纪90年代收集了一些关于如何解释苏联解体的学术著作。^④

美国学者仍然激烈地讨论着苏联解体期间结构和机构的平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明显在触发苏联衰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即使这并非其初衷。但是仍有尚未解决的关于戈尔巴乔夫多大程度上是形势的囚徒或是改革独立代理人的争论。布朗的传记将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位英雄人物，其原则性的改革承诺引起苏联体制的解体。布朗提到俄罗斯所有自由化的关键措施（如出版自由，成立政党和竞争性选举）都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而非叶利钦时期。^⑤ 科恩(Stephen Cohen)认为如果西方能多加帮忙，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可以成功。^⑥ 科特金(Kotkin Stephen)将内外因融合成强调苏联模式深层结构缺陷的单个不稳定解释。^⑦ 邓洛普(John Dunlop)跟踪了这段时间的政治斗争：保守派如何能够阻止巴尔戈乔夫改革，以及苏联的联邦结构如何给予叶利钦对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空间。^⑧ 科茨(David Kotz)和威尔(Fred Weir)提供

① Stefan Hedlund, *Russian Path Dependence: A People With a Trouble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② Clifford Gaddy and Fiona Hill, *Siberian Curse: How Communist Planners Left Russia Out in the Co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③ 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Michael Cox (eds.),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London: Cassell, 1999.

⑤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⑥ Stephen Cohen, "Was the Soviet System Reformable?", *Slavic Review*, 63.3 (2004), pp.459-488.

⑦ Stephen 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⑧ John Dunlop, *The Rise of Russ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了为数极少的苏联解体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之一。他们认为是政党高层中的野心团体故意引起中央计划经济的崩溃以将政治特权转变成物质财富。^①

盖达尔(Yegor Gaidar, 叶利钦的首任总理和其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在2007年出版的书中强调苏联政权的经济破产是由于财政赤字和外债的重负, 又因世界油价的暴跌而恶化。^②在采访昔日规划官员的基础上, 埃尔曼(Michael Ellman)和孔托罗维奇(Vladimir Kontorovich)持相反观点, 认为苏联经济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打断了计划官僚制之前都是稳定的。^③

在几年内,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与美国军事竞争的努力。这令人震惊的发展使得相信军事能力客观地决定大国行为的政治科学家们困惑。科特金主张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不是波兰团结工会等民众动员的结果, 而是由于执政的共产党精英丧失了信念。^④英格瑞斯(Robert English)跟踪了小部分党内知识分子劝服戈尔巴乔夫接受外交政策的“新思维”, 而导致军备谈判和冷战的结束的过程。^⑤最后一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在冷战大致结束时提供了外交知情人的解释, 认为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性格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刻扮演了关键的角色。^⑥戈尔巴乔夫昔日的新闻发言人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提供了谈判的理由。^⑦丹尼尔·托马斯(Daniel Tomas)提出是国际体系的转变和人权的提升削弱了苏联体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⑧

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

20世纪90年代, 俄罗斯政治处于混乱的剧变时期。事情进展如此迅速以至于美国学者发现难以孤立出一个主题进行全面分析。分辨长期趋势也非易事。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正处于向西方模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假定, 成为了最为普通的分析组织框架。俄罗斯的政治历史可以连续两位总统为界整齐地分为两个部分: 20世纪90年代的叶利钦统治时期, 和21世纪前十年的普京统治时期。因此,

① David Kotz and Fred Weir,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② Yegor Gaidar, *Collapse of an Empire: Lessons for Modern Russi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7.

③ Michael Ellman and Vladimir Kontorovich,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An Insiders' History*, 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④ Stephen Kotkin, *Uncivil Society: 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10.

⑤ Robert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⑥ Jack Matlock, *Reagan and Gorbachev: How the Cold War End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⑦ Andrei Grachev, *Final Day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⑧ Daniel Tomas, *The Helsinki Effect: International Norms, Human Rights, and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最受欢迎的书就是那些关注这两段时期各期间的书。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但是留任总理，分析员们纷纷猜测梅德韦杰夫总统是否拥有实权。

特莱斯曼(Daniel Treisman)是著有单独一卷全面分析俄罗斯在过去20年中政治发展主要趋势的少数几位作者之一。^①塞维斯(Robert Service)为一般读者提供了较为不严密的解释性文章。^②教科书撰写者在1991年起便感觉难以跟上发展。很少有作者尝试包含俄罗斯联邦之外其他国家的政治，比如海斯利(Vicki Hesli)涉及了五个国家。^③

近来发展情况的复杂性和广泛二手文献的不足意味着甚至是单个作者所著的俄罗斯教科书也非常地罕见。例子有施利亚耶夫^④(Eric Shiraev)，萨克瓦^⑤和雷明顿^⑥(Thomas Remington)。大多数教授选择多作者合集进行教学，这样不同的专家可以撰写总统制、选举制，以及经济等，例如莫泽^⑦(Robert Moser)，怀特^⑧和威格瑞恩^⑨(Steven Wegren)。这些合集及时更新以赶上新发展：威格瑞恩的已是第4版，怀特的是第7版。

鲍里斯·叶利钦由于其公然反抗1991年8月反改革强硬派策划的政变而被公认为苏联瓦解的关键人物。但是对其在民主制引入俄罗斯的努力中扮演了积极还是消极角色的看法有着鲜明的分歧。阿伦^⑩(Leon Aron)和科尔顿^⑪(Timothy Colton)给予叶利钦历史性角色的积极解读，却也矛盾得提到他是苏联体制的产物和不情愿的改革者。雷德韦(Peter Reddaway)和格林斯基^⑫(Dmitri Glinski.)秉持强烈的批判性，他们认为叶利钦负责将权力统一到了腐败和专制的实力集团手中。舍夫佐娃(Lilia Shevtsova)对叶利钦统治时期的大事件进行了相对中立的论述性解释^⑬，虽然叶利钦

① Daniel Treisman, *The Return: Russia's Journey from Gorbachev to Medvedev*, New York: Free Press, 2011.

② Robert Service, *Russia: Experiment With a Peop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Vicki Hesli,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in Russia and the Post-Soviet Reg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2006.

④ Eric Shiraev, *Russi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⑤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4th edition), 2008.

⑥ Thomas Remington, *The Politics of Russia*, Harlow, UK: Longman (6th edition), 2009.

⑦ Zoltan Barany and Robert Moser (eds.), *Russian Politics: Challenges of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⑧ Stephen Whit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⑨ Steven Wegren and Dale Herspring(eds.), *After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4th edition), 2009.

⑩ Leon Aron, *Yeltsin: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⑪ Timothy Colton, *Yeltsin: A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8.

⑫ Peter Reddaway and Glinski Dmitri, *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 Market Bolshevism Against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01.

⑬ Lilia Shevtsova, *Yeltsin's Russia: Myth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9.

在 1995 年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布雷斯劳尔^① (George Breslauer)以及布朗(Archie Brown)和舍夫佐娃^②寻找了历任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的统治模式。

叶利钦准时举行选举，允许出版自由，正如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所记载的，^③但是其在 1993 年解散联邦会议是其民主合法性削弱的标志。阿伦坚持叶利钦的统治确实使俄罗斯更为接近民主。^④反对党无法挑战叶利钦的权威，忠诚的电视台帮助叶利钦在 1996 年再次成功当选总统。费什对为什么真正的民主在俄罗斯扎根失败的问题提供了最为系统化的研究。是苏联思维的遗产，叶利钦的过失，还是经济改革的混乱削弱了俄罗斯的民主？费什(Stephen Fish)摒弃了文化解释，却强调了依赖石油收益的消极影响以及超强总统和无力立法机关的出现。^⑤ 克普斯坦因(Jeffrey Kopstein)和汉森(Stephen Hanson)促成了一场比较叶利钦的俄罗斯和魏玛德国的讨论，提出了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政权是否能够代替叶利钦的问题。^⑥ 1993 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令人震惊地获得第一的结局刺激了这种想法的产生。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政党软弱低效，俄罗斯无法维持一个竞争和开放的民主制。布吕德尼解释了因反对 1991 年 8 月政变而联合起来的民主运动如何在剧烈的经济改革中由于意见不一而失败，和授予叶利钦紧急情况下以政令统治权力的明智。俄罗斯没有强烈支持民主的政党，改革是由为强大的总统办公室效力的技术官员所推进的：科尔顿^⑦以及埃文斯(Geoffrey Evans)和怀特菲尔德^⑧ (Stephen Whitefield)的选民行为研究表明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对政治抱有幻想以及确立连贯的政党制度的失败。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是个人化和不稳定的，每场选举的政党阵容都会改变，很难鉴别出明确的中右范围，因而难以在系统化的基础上研究选举行为。

叶利钦统治时期，总统能够让立法和司法部门靠边，但是在政策执行时，总统却没有效率。很少有关于俄罗斯政府内部决策制定过程或者更为宽泛的政策进程的

① George Breslauer, *W. Gorbachev and Yeltsin as Leade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Archie Brown and Lilia Shevts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Russia's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2001.

③ Michael Mc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Leon Aron, "Was liberty really bad for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16.1 (winter 2008), pp. 132-141.

⑤ Stephen Fish,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⑥ Jeffrey Kopstein and Stephen Hanson, "The Weimar-Russia Comparison", *Post-Soviet Affairs*, 13.3 (July 1997), pp. 252-283.

⑦ Timothy Colton, *Transitional Citizens: Voters and What Influences Them in the New Rus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⑧ Geoffrey Evans and Stephen Whitefield. "The Evolution of Left and Right in Post-Soviet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50.6 (Sept 1998), pp.1023-1042.

研究, 尤其是因为权力机构不对公众调查开放。论述总统制的赫斯基(Eugene Huskey)是少数几位研究政府机器的作者之一。^① 斯珀林(Valerie Sperling)收集了管理各个方面的论文。^② 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平衡是任何民主制的关键, 但是在叶利钦时期, 总统明显占支配地位, 正如伊斯特^③ (Gerry Easter), 摩根·琼斯(Morgan Jones)和施莱特^④ (Petra Schleiter), 以及特罗切夫^⑤ (Alexei Trochev) 的文件所示, 这些文件证明了宪法法院如何无法制约专断总统。

1991年后, 俄罗斯军队预算大幅度削减, 但是仍能抵制叶利钦和普京将大规模征兵部队变成小规模专业志愿军的努力。昔日美国国防部官员奥多姆(William Odom)提供了权威性的说明。^⑥ 戈尔茨(Alexander Golts)和帕特南^⑦ (Tonya Putnam)简洁地总结了俄罗斯领导人在试图改革军队时所面临的挑战, 米勒(Steven Miller)和特列宁^⑧收集了一系列俄罗斯和西方专家的分析。斯珀林(Valerie Sperling)研究了普京统治下官员爱国教育的增加。^⑨ 在今日的美国大学里, 只有非常少的教授研究俄罗斯军队。

区域政治

俄罗斯是一个由 89 个附属单位组成的复合联邦, 其中 22 个是指定为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共和国。20 世纪 90 年代, 莫斯科努力维持对这些迥然不同的领土的控制, 其中车臣试图脱离。斯捷潘(Alfred Stepan)将俄罗斯的联邦制放在比较语境中,^⑩ 而斯托纳·魏斯^⑪ (Stoner Weiss), 朱利亚诺^⑫ (Elise Giuliano)和戈仁伯格^⑬ (Dmitry Gorenburg)

① Eugene Huskey, *Presidential Power in Russi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② Valerie Sperling (eds), *Building the Russian State. Institutional Crisis and the Ques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

③ Gerry Easter, "Preference for presidentialism: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 *World Politics*, 49.2 (Jan. 1997), pp. 184-211.

④ Morgan Jones Edward and Petra Schleiter, "Governmental Change in a President-Parliamentary Regime: The Case of Russia, 1994-2003," *Post Soviet Affairs*, 20.2 (Apr.-Jun. 2004), pp. 132-163.

⑤ Alexei Trochev, *Judging Russia: The Role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Russian Politics 1990-200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⑥ William Od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⑦ Alexander Golts and Tonya Putnam, "State Militarism and its Legacies: Why Military Reform has Failed in Rus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fall 2004), pp.121-158.

⑧ Steven Miller and Dmitri V. Trenin (eds.), *The Russian Military: Power and Poli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⑨ Valerie Sperling,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Patriotism, Militarism, and the Russian National Ide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9.2 (2003), pp.235-253.

⑩ Alfred Stepan, "Russian Fede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st-Soviet Affairs*, 16.2 (2000), pp. 133-76.

⑪ Stoner Weiss, *Local Hero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ssian Regional Gover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⑫ Elise Giuliano, "Secessionism from the Bottom Up: Democratization, Nationalism, and Loc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Russian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58.2 (2006), pp.276-310.

⑬ Dmitry Gorenburg, "Nationalism for the Masses: Popular Support for Nationalism in Russia's Ethnic Republics", *Europe-Asia Studies*, 53.1 (2001), pp. 73-104.

分析了地区精英——特别是在民族共和国——能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巩固权力的方式。特莱斯曼认为叶利钦让出权力的意愿和与地区精英的罢工协议保护了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免于政治崩溃。^① 令人惊奇的是没有关于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ii Luzhkov)极其独特政权的全面研究，卢日科夫对俄罗斯首都的统治从 1992 年一直持续到了 2010 年。莫斯科不仅是扮演了关键的政治角色，而且还是主要的工业中心和大多数俄罗斯商务公司的总部所在。政治科学家被俄罗斯的地区研究所吸引是因为有大量的案例可以供给严密的比较分析和政治自由度和经济发展关系假说的检验。科尼策尔说明了地区领导是如何能够逐渐地巩固权力和不断赢得改选的一在 2004 年废除直接选举之前。^②

车臣战争吸引了西方学者和记者的大量关注，他们大多数因为这两场战争指责莫斯科而且相当地同情车臣的独立事业。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动机和地区和平的前景引起了热烈的学术讨论。盖尔(Carlotta Gall)和德瓦尔^③ (Thomas de Waal)，列文^④ (Anatol Lieven)和邓洛普^⑤提供了第一次战争(1994-1996)的生动叙述，而休斯^⑥ (James Hughes)带来了第二次战争(1999-2002)的故事。特列宁^⑦、梅农(Rajan Menon)和福勒^⑧ (Graham Fuller)以及克莱默^⑨ (Mark Kramer)仔细分析了俄罗斯的战略微积分。

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俄罗斯内部广泛谴责叶利钦在 1992 年实行“休克治疗”的决定。虽然改革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等国取得明显成功，西方分析师仍在快速市场改革的可行性上意见对立。阿斯科德^⑩和拉维涅^⑪ (Marie Lavigne)提出了赞同改革议程的全面概述。与

① Daniel Treisman, *After the Deluge: Regional Crises and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in Russi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② Andrew Konitzer, *Voting for Russia's Governor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6.

③ Carlotta Gall and Thomas de Waal, *Chechnya: Calamity in the Caucasu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Anatol Lieven, *Chechnya: Tombstone of Russian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⑤ John Dunlop, *Russia Confronts Chechnya: Roots of a Separatist Conflic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⑥ James Hughes, *Chechnya: From Nationalism to Jih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⑦ Dmitri Trenin, *Chechnya: Russia's Restless Frontie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2004.

⑧ Rajan Menon and Graham Fuller, "Russia's Ruinous Chechen War", *Foreign Affairs*, 79.2 (Mar.-Apr. 2000), pp.32-44.

⑨ Mark Kramer, "The Perils of Counter-Insurgency: Russia's War in Chechny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3 (winter 2004), pp. 5-63.

⑩ Anders Aslund,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⑪ Marie Lavigne,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此相反，默雷尔（Peter Murrell）为“休克治疗”的适当性提供了一个评判性的视角。^①

20世纪90年代不受限制的私有化项目为小部分有内部关系的企业家创造了几乎在一夜间建立富有商业帝国的机会。这个进程在弗里兰^②（Chrysta Freeland）等记者的几本书中得到记载。巴尼斯^③（Andrew Barnes）和福斯科^④（Stephen Fortescue）提供了对转变中的产业结构的学术概述，拉特兰^⑤（Peter Rutland）研究了商业游说模式。赫尔曼（Joel Hellman）的文章可能在关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失败的文章中受到最为广泛的引用。他认为不完全的改革使得小型寡头集团拥有了关键资产，但是他们接着利用政府来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因此，为他们自己维护了垄断租金。^⑥

普京政权

弗拉基米尔·普京上台的方式让西方观察者感到意外。普京是由叶利钦提名，然后通过在职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而巩固了权利，而不是通过政党内提升的一般民主方式。他开始恢复“垂直权力”（power vertical）的权威，加紧对政治反对派的控制，同时他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市场改革，并寻求与西方合作。在普京任期内（2000-2008），俄罗斯经济强势增长，大部分是因为上涨的世界油价。西方学者不愿将普京说成是独裁者，因为他准时举行选举而且似乎在俄罗斯人民中真正地受到欢迎。萨克瓦^⑦和杰克^⑧提供了对普京第一任执政期的相当积极的论述，舍维特索娃^⑨以及贝克和格拉瑟^⑩（Susan Glasser）则提供了更为批判性的看法。威尔逊（Andrew Wilson）详述了莫斯科（和基辅）领导人用“卑鄙的手段”赢得竞选从而维持表面民主的方式。^⑪

在普京总统任期的早些年中，其与西方合作的意愿使得一些观察者相信经济和

① Peter Murrell, “What is Shock Therapy? What Did it Do in Poland and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993, 9, 2, pp.111-140.

② Chrysta Freeland, *Sale of the Century: The Inside Story of Russia's Second Revoluti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5.

③ Andrew Barnes, *Owning Russia: The Struggle over Factories, Farms, and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Stephen Fortescue, *Russia's Oil Barons and Metal Magnat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⑤ Peter Rutland,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Russi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1.

⑥ Joel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World Politics*,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203-234.

⑦ Richard Sakwa, *Putin: Russia's Choice*, London, UK: Routledge, 2003.

⑧ Andrew Jack, *Inside Putin's Russi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⑨ Lilia Shevtsova, *Putin's Russ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nd ed.) 2005.

⑩ Peter Baker and Susan Glasser, *Kremlin Rising: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End of Revolution*, New York: Scribner, 2005.

⑪ Andrew Wilson, *Virtual Politics: Faking Democracy in the Post-Sovie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政治领域的进一步自由化仍在议程上。这反映在麦克福尔^① (Michael McFaul)编辑的论文集以及施莱弗和特莱斯曼^②的文章中。然而, 2003 年对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逮捕确认了在克林姆林宫看到新威权主义的怀疑者的观点, 这也成为萨特^③ (Satter) 和塞斯塔诺维奇^④ (Stephen Sestanovich)著作中的例证。怀特和麦卡利斯特^⑤ (Ian Mcallister)以及罗斯和芒罗^⑥ (Neil Munro)意图解释普京惊人的民众支持率水平, 普京的满意度也很少低于 70%。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Olga Kryshtanovskaya)和怀特使用了统治精英构成的传记数据以证明普京的管理受到了过去的安全警察和军队官员——“强力集团”(siloviki)的控制。^⑦ 特莱斯曼 (Treisman) (2010)的文章是另外一处资料来源。^⑧ 他们的分析受到了赫斯基(Eugene Huskey)的挑战。赫斯基得出了在政府和总统办公室的高层中拥有商业背景的人员数量实际上超过了安全人员数量的结论。^⑨

麦克福尔和斯托纳强烈批判普京的履历,^⑩而萨克瓦采取了更为中立的姿态。^⑪ 作为自由之家年度报告之一的欧瑞塔格的文章提供了对俄罗斯民主状况的重要调查。^⑫ 科尔顿和黑尔(Henry Hale)追踪了普京连续的声望。^⑬ 特莱斯曼^⑭和赫斯基^⑮分别研究了普京总统办公室中的军事官员和经济官员。

其他后苏联国家各种政权的出现为比较分析创造了肥沃的试验田。乌克兰之所

① Michael McFaul, Nikolai Petrov and Andrei Ryabov(eds.), *Betwee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Russian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Refor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4.

② 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 “A normal country”, *Foreign Affairs*, 83.2 (Mar. 2004), pp.20-38.

③ David Satter, “Putin’s Soul”,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9, 2007, 15.

④ Stephen Sestanovich, “Force, money and plur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5.3 (2004), pp. 32-42.

⑤ Stephen White and Ian Mcallister, “Putin and his supporters”, *Europe-Asia Studies*, 55.3, (June 2003), pp.383-399.

⑥ Richard Rose and Neil Munro, *Russia Transformed: Developing Popular Support for a New Regim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⑦ Olga Kryshtanovskaya and White Stephen, “Putin’s Militocracy”, *Post-Soviet Affairs*, 2003, 19: 4, pp.289-306.

⑧ Daniel Treisman, “Twenty Year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 UNU-WIDER Working Paper, 2010.

⑨ Eugene Huskey, “Elite Recruitment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echno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Russian Cas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3.3, (Nov. 2010), pp. 1-10.

⑩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87.2 (Jan.-Feb 2008), pp.688-684.

⑪ Richard Sakwa, “Putin’s leadership: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Europe-Asia Studies*, 60: 6 (2008), pp.879-897.

⑫ Robert Ortung, “Nations in Transit Report: Russia 2010”, *Freedom House*, 2010.

⑬ Timothy Colton and Henry Hale, “The Putin Vote: Presidential Electorates in a Hybrid Regime”, *Slavic Review*, 68.3 (fall 2009), pp.473-503.

⑭ Daniel Treisman, “Putin’s Silovarchs”, *Orbis*, 51:1 (Winter 2007), pp. 141-153.

⑮ Eugene Huskey, “Elite Recruitment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echno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Russian Cas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3.3, (Nov. 2010), pp.1-10.

以有趣是因为其与俄罗斯在很多方面相似，但却以一个更为多元化的政权发展。乌克兰的不同，部分是因为东西乌克兰的分离，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继承同样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进入叶利钦和普京之手的强大的安全机构。然而，达登(Keith Darden)的勒索乌克兰的政治模式非常适合俄罗斯的情况。^①以他们对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分析，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威^② (Lucan Way)创建了竞争性威权主义理论。该理论如今成功取代了“民主转型”(transition to democracy)范式成为观察该地区政治动态的主要视角。“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表明此种威权主义形式极不稳定，易于被有序和高明的反对派推翻——这引起了对俄罗斯普京政权稳定性的怀疑。^③

俄罗斯经济在普京执政期内大约翻了一倍，但是评论家们称其危险地依赖油气出口。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暴跌，但是政府有充足的储备援助在繁荣期过量借款的俄罗斯银行和公司。库钦斯和阿斯朗德提供了在普京两任执政期末期俄罗斯政治经济的概述，^④而阿斯朗德和乔温斯基^⑤ (Aleh Tsyvinski)带来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故事。加迪(Clifford Gaddy)和伊克斯(Barry Ickes)坚持油气收入使得腐败的实力集团继续执政，阻止了俄罗斯经济向市场竞争效应的真正开放。^⑥ 拉特兰提出俄罗斯依赖石油出口是否真正地看起来的一样糟糕的疑问。^⑦ 美国的观察者中很少有人仍准备力争俄罗斯处于经济起飞边缘，虽然美国的企业界仍然对在俄罗斯经商的前景持积极态度。

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增强并没有伴随着法治的扩展。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却成为普遍现象。汉德尔斯曼(Stephen Handelman)的书是第一本引起西方对此问题规模关注的记者著作。^⑧ 瓦雷泽(Federico Varese)著有该领域关键学术

① Keith Darden, “Blackmail as a tool of state domination: Ukraine under Kuchma”,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10 (spring 2001), pp.67–71.

②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Apr. 2002), pp.51-65; Lucan Way,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regime competitiveness”, *World Politics*, 57.1 (Jan. 2005), pp.231-261.

③ Mark Beissinger, “Structure and Example in Modular Political Phenomena: The Diffusion of Bulldozer/Rose/Orange/Tulip Revolu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5 (2007), pp.259-276.

④ Anders Aslund & Andrew Kuchins, “Pressing the ‘Reset Button’ on US-Russia Relations”, Policy Briefs PB09-6,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⑤ Anders Aslund and Aleh Tsyvinski,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2010.

⑥ Clifford Gaddy and Barry Icke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1.3 (May 2010), pp.281-311.

⑦ Peter Rutland, “Putin’s Economic Record. Is the Oil Boom Sustainable?”, *Europe-Asia Studies*, 60.6 (Aug. 2008), pp.1051-1072.

⑧ Stephen Handelman, *Comrade Criminal: Russia’s New Mafiy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作品，他用西西里岛黑手党研究的思想来理解俄罗斯的情况。^①以圣彼得堡为例，沃尔科夫(Vadim Volkov)建立起了在政治和市场制度无力的社会中的“暴力经济”(economy of violence)模型。^②列杰涅娃(Alena Ledeneva)解释了为什么1991年后的经济实践与苏联时期的社会管理有联系——适应新的市场环境。^③卡克林斯(Rasma Karlins)提供了后苏联国家腐败程度的清晰概况。^④俄罗斯的经历对政治科学提出了民主和法治起源的重要问题。仅仅通过自由选举一夜之间建立民主的想法已不再可能。非正式的规范和政治文化证实是比预测的转型机制理论更为重要。

与波兰等中欧国家相比，俄罗斯在苏联解体期间和之后没有成功建立强大的民间组织。罗伯逊(Graeme Robertson)记载道，尽管俄罗斯公民社会软弱，普京政府仍采取措施限制自发性社会抗议的影响——特别是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之后。^⑤学者们就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暗淡情形达成了普遍一致。多米伦^⑥(Alexander Domrin)和埃文斯^⑦(Alfred Evans)总结了这些问题，斯珀林^⑧(Valerie Sperling)则调查了妇女运动的情况。罗伯逊提供了对工人和社会动乱程度的综合分析，建议不能不重视大规模动员的可能性。^⑨仍有很多解释公民社会失败的可能因素：苏联时期对政治行为不信任的后遗症；20世纪90年代经济崩溃的压力；不存在表达民众需要的真正的选举民主。一些人认为西方专家错误地将研究集中在与西方有联系的团体，以及按照西方民间团体独立于政府的界线寻找公民社会。

后苏联政治的另外一个主要难题是俄罗斯国家身份的困惑，仇外右翼势力的增加对谁属于俄罗斯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端的答案。苏联公民受到爱国主义应置于民族身份上的教育。因此，后苏联的俄罗斯经历着身份危机，不愿接受俄罗斯身份的

① Federico Varese, *The Russian Mafia: Private Protection in a New Market Econom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Vadim Volkov, “Violent Entrepreneur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51.5 (July 1999), pp.741-54.

③ Alena Ledeneva, *How Russia Really Works: The Informal Practices That Shaped Post-Sov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Rasma Karlins, *The System Made Me Do It*, Armonk, NY: ME Sharpe, 2005.

⑤ Graeme Robertson, “Managing Society: Protest, Civil Society and Regime in Putin’s Russia”, *Slavic Review*, 68.3 (Fall 2009), pp.528-47.

⑥ Alexander Domrin, “Ten Years Later: Society, ‘Civil Society’, and the Russian State”, *Russian Review*, 62: 2 (April 2003), pp. 193-211.

⑦ Alfred Evans, Laura A. Henry, and Lisa McIntosh Sundstrom(eds.), *Russian Civil Society: A Critical Assessment*, Armonk, NY: ME Sharpe, 2006.

⑧ Valerie Sperling, *Organiz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⑨ Robertson, Graeme,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Hybrid Regimes. Managing Dissent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简单民族定义，同时却又缺乏一个范围广泛的公民身份所需的民主机制。托尔兹(Vera Tolz)给出了这个问题的明确解释。^① 诺克斯^② (Zoe Knox)和哈恩^③ (Gordon Hahn)分别研究了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发展中的新角色。

2008年普京的第二任总统期结束。普京遵循宪法卸任——却另辟蹊径担任总理工作而不是远离政治。他提名其副手和门生，43岁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为总统。大多数观察者认为普京仍在发号施令，尽管其在现实中有着更为自由的公开形象。梅德韦杰夫几乎没有独立于普京的独立控制空间。西方学者沮丧于这些发展。政治进程透明度的不足和明确制度程序的缺乏使得西方学者难以分析俄罗斯的政治进程。有说法称这是对“苏联政体研究”(Kremlinology)的回归：如今看来不足信的苏联时期的做法。那时西方学者留心每一个传闻，仔细地分析官方媒体的宣传，试图猜测统治精英内部微妙的权力转移。迄今仍没有梅德韦杰夫的英文版传记（甚至难以找到关于其政策的文章），或许是因为尚不明确其是否真正地有与普京不同的政治独立。

从叶利钦到普京的外交政策

俄罗斯领导人——和普通俄罗斯人——决心在苏联霸权崩溃后尽力维持俄罗斯大国的角色。俄罗斯的核武器不再是可信的威胁，虽然防止核扩散仍是美国的一项重点。能源出口让俄罗斯成为欧洲和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但是莫斯科在试图利用能源作为影响力杠杆的时候跌倒。20世纪90年代，美国不管无效的迹象继续实行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政策。克林顿的首席俄罗斯顾问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回忆录是理解克林顿和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伙伴关系的关键资料。^④ 科恩完全相反地解读了塔尔博特书中所辩护的政策。^⑤ 21世纪华盛顿对普京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方式，虽然比起对抗更倾向于合作。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书籍包括乔甘科夫^⑥(Andrei Tsygankov)，曼科夫^⑦(Jeffrey Mankoff)和莱格沃尔德^⑧(Robert Legvold)的著作。西梅斯(Dimitri Simes)阐释了在布什统治后期对俄关系在华盛顿是一场强行推

① Vera Tolz, *Russia: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UK: Hodder Arnold, 2001.

② Zoe Knox,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Orthodox Church: Religion in Russia After Commun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③ Gordon Hahn, *Russia's Islamic Threa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Strobe Talbott, *The Russia Hand. A Memoir of Presidential Diploma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⑤ Stephen Cohen, "Was the Soviet System Reformable?", *Slavic Review*, 63.3 (2004), pp.459-488.

⑥ Andrei Tsygank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⑦ 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9.

⑧ Robert Legvold (ed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销的原因。^①卢卡斯因为俄罗斯要求重获苏联解体后丢失的一些地位而将其视为威胁。^②

有趣的是，在这些阐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作者中，只有安德烈·乔甘科夫，一位俄罗斯流亡者，持有学术立场。罗伯特·莱格沃尔德已经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爱德华·卢卡斯是英国记者，迪米特里·西梅斯和杰弗里·曼科夫在智库工作。俄罗斯外交政策研究似乎已经差不多从美国学术议程中消失。考虑到俄罗斯持续不变的战略重要性，这是令人困惑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外交政策学者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新兴独立国家面临的挑战上：乌克兰逃离俄罗斯影响的努力；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欧盟的引人注目的路线；损害高加索地区的冲突；以及中亚的“大博弈”(Great Game)。这些问题新奇而令人兴奋，因此它们将学者的关注从莫斯科吸引过来。此外，广义上俄罗斯的影响力下降。

很多关于俄罗斯外交面临的挑战（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称为“近邻”）的有趣著作问世。泽维洛夫(Igor Zvelov)考察了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新的主权国家居民的俄罗斯族人的状况。^③虽然有对俄罗斯可能利用这些存在作为借口干涉新国家的担忧，但是最后除了一些激烈的言语，俄罗斯没有为了保护俄罗斯族人而在国外行动。至于被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拒授公民身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的状况请参照巴林顿(Lowell Barrington)的文章。^④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莱廷(David Laitin)研究讲俄语的少数民族的同化动力，他认为这会是一个迅速平稳的过程。^⑤莱廷的项目是美国政治科学家——不是俄罗斯专家——在后苏联地区进行系统化研究最早的努力之一。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复杂的能源交易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如巴尔玛希达^⑥(Margarita Balmaceda)。俄罗斯不同程度地在所有后苏联国家的国家政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角色。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国努力界定它们与俄罗斯截然不同的自我身份，而他们社会的一些部分却希望保持与莫斯科更强

① Dimitri Simes, “Losing Russia. The Costs of Renewed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86.6 (Nov.-Dec. 2007), pp.36-37.

② Edward Lucas, *The New Cold War: Putin's Russia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③ Igor Zvelov, *Russia and Its New Diasporas*,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01.

④ Lowell Barrington, “The Making of Citizenship Policy in the Baltic States”,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13: 2 (fall 1999), pp.159-199.

⑤ Davi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⑥ Margarita Balmaceda, *Energy Dependency, Politics and Corrup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Russia's Power, Oligarch's Profits and Ukraine's Missing Energy Policy, 1995-2006*,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的联系。^① 俄罗斯对中亚政策上最有影响力的权威是一个俄罗斯人：德米特里·特列宁。^② 还有一些流行的记者对于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在中亚争夺影响力的对抗的论述。^③

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政治演变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俄罗斯的支持帮助亚美尼亚在 1992 年卡拉巴赫战争中获胜，并在亚美尼亚能够保持对抗阿塞拜疆的立场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德瓦尔是这个题材上的权威。俄罗斯的介入使得阿布哈兹能够在 1993 年脱离格鲁吉亚，俄罗斯为了南奥塞梯在 2008 年再次介入。关于 2008 年的战争，请参照康奈尔(Svante Cornell)和斯塔尔^④ (Frederick Starr)以及艾利森^⑤ (Roy Allison)的文章。

结 论

总而言之，我们仍可以看到在美国的俄罗斯政治领域还有一些热烈的讨论和很多积极的研究者。这个领域如今无疑比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期间数十年的“停滞”(stagnation)要有趣的多，那时关于苏联政治进程的信息极其难以获得，政治改变发生得非常慢。

然而，尽管有研究的新机遇，俄罗斯政治领域在过去的 20 年中萎缩。一方面这是因为政府资金的削减，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科学试图通过参与对多个国家数据的广泛、数理的比较分析变得更为“科学”(scientific)，国家研究普遍衰退。因此，俄罗斯政治专家越来越不足，我们理解的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的动态也有了很大差距。越来越少的美国教授和研究生正在进行系统化领域研究。这些趋势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较不普遍，因此相应地，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出现了更多的重要研究。尽管通过领域资源流入来衡量，欧洲的总体高等教育水平状况比美国的更为糟糕。在美国出版的重要作品中，由在美国工作或在本国的俄罗斯学者完成的数量日益增长。

在美国研究俄罗斯政治的一些犹豫不决来自于对俄罗斯转型没有符合之前预期和希望的沮丧。普京总统统治下增强的威权主义和油气收入掩饰下的经济不景气使

① Charles King, *The Moldovans: Romania, Russia,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2000.

② Dmitri Trenin, *Chechnya: Russia's Restless Frontie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2004.

③ Steven Levine, *The Oil and the Glory: The Pursuit of Empire and Fortune on the Caspian Se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Lutz Kleveman, *The New Great Game Blood and Oil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④ Svante Cornell and Frederick Starr (eds.), *The Guns of August 2008: Russia's War in Georgia*, New York: ME Sharpe, 2009.

⑤ Roy Allison, "Russia Resurgent? Moscow's Campaign to 'Coerce Georgia to Pea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6 (2008), pp.1145-1171.

得学者较不热衷于投身于俄罗斯政治研究。研究一个成功的国家比研究一个失败的国家要有趣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注册学习中文的人数达到了最高记录，而很多美国高中甚至是一些大学正在取消其俄语系。

附录

期刊

目前仍有活跃着的关于后苏联地区的多种期刊。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通常在 1991 年后改名。最受重视的学术期刊包括英国格拉斯加大学的《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即以前的《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后苏联事务》(Post-Soviet Affairs)，即以前的《苏联经济》(Soviet Economy)。这里所列的是以社会科学为中心的期刊。还有更多的主要是关于历史和文化的期刊，其中的一些也发表社会科学文章。两个例子是堪萨斯大学的《俄罗斯评论》(Russian Review)，专业协会斯拉夫、东欧和欧亚研究学会的期刊《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

新期刊中有《民主化》(Demokratizatsiya)、华盛顿特区的研究生创办的《后苏联民主化期刊》(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包含了聚焦民主转型的当代政治的文章。《欧亚地理学和经济学》(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关于区域经济学和地理学中更多科技方面的主要期刊。之前称作《后苏联地理学和经济学》(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再之前是《苏联地理学》(Soviet Geography)。法国出版的英文期刊《后苏联社会的权力机构期刊》(The Journal of Power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Societies)包括了军事和安全机构的发展。其没有印刷版，可以在网上(<http://pipss.revues.org/>)免费阅读。《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包括了当代政治多个方面的文章。《中亚研究》(Central Asian Survey)从广泛的学科范围覆盖了该地区。《后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包括面向政策导向读者的重要专家的短文。

网络资源

西方对俄罗斯和后苏联国家的新闻报道继续下降，学生们将更多地转向网络获取最新信息和分析。问题是许多这些网站具有高度偏向性——不是支持就是反对政府。《莫斯科时报》(Moscow Time)是一家可信地报道主要发展和有热烈的评论专栏版的日报。《俄罗斯信息集锦》(Johnson's Russia List)通过每天的免费邮件发送关于俄罗斯的媒体报道的汇编。美国学者和决策者极度依赖这两者。杂志《俄罗斯概况》(Russia Profile)和英语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由克林姆林宫控制，决心投放积极、对俄友好的滚动新闻。美国国会资助的自由电台的网站用英俄双语报道当前事

件。

智库世界(The think tank world)是后苏联区域研究中唯一稀疏发展的。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最频繁通行的网站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The Carnegie Center Moscow)(由自由派美国基金会资助),公开民主(Open Democracy)(由欧洲自由社会主义者经营)和位于华盛顿的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非常保守)。来自苏黎世的《俄罗斯分析摘要》(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是有学术分析的月刊,而《转型在线》(Transitions Online)是位于布拉格的覆盖前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和社会的周刊。

有一些独立或反对派支持的英语博客给无法阅读俄语博客空间的人们提供机会了解最新的新闻和丑闻。大多数博客相当偏颇或属于个人意见,没有一个在学术争论上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另一个俄罗斯网(Other Russia)由主要的俄罗斯反对运动维护。惧俄者网(La Russophobe)由老练的俄罗斯观察家提供对最近发展更为有特性的回应。其他观点网(Other Points of View)是对抗其创立者认为的西方媒体系统化反俄偏见的一次尝试。

List of sources cited:

Moscow Times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

Johnson's Russia List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

Russia Profile [<http://www.russiaprofile.org/page.php?pageid=MainPage>]

Russia Today [<http://rt.com/>]

Radio Liberty [<http://www.rferl.org/>]

Transitions Online [<http://www.tol.org/client/>]

Other Russia [<http://www.theotherussia.org/>]

La Russophobe [<http://larussophobe.wordpress.com/>]

Other Points of View [<http://www.russiaotherpointsofview.com>]

Carnegie Center, Moscow [<http://carnegie.ru/?lang=en>]

Open Democracy [<http://www.opendemocracy.net/Russ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edm/>]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http://www.res.ethz.ch/analysis/rad/index.cfm>]

(胡彦译)

【Abstract】 The rise, fall and transi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s one of the seminal ev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attern, which cast into doubt many of the core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interest in Russian area stud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is waning through either combing of literature on Russian political studies published publicly in the U.S.A. or summarizing and reviewing main issues of Russian studies in the U.S.A. after 1991. The reason is that American government has cut down its finance on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prefers conducting mathematical analysis to regional studies. Moreover, Russian transition does not come up to the expectation of the West, which has weakened American scholars' interest in Russian politics studies as well.

【Key Words】 Russian Politics Studies, American “Regional Studies”, Collapse, Transition

【Аннотация】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дальнейш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оказали серьёз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поставили новые задачи перед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олитологией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В ходе изучения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й с 1991 г.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путём оценки и анализа наиболее острых и акту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США замечено, что в течение этих 20 лет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постоянно падает 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СШ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за сокращения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США, 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причине того, ч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всё более склонны к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ому анализу, и важно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понижена. Кроме тог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ожиданиям и надеждам Запада, что также ослабило интере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учёных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США, развал,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责任编辑 姜睿)

国会图书馆的俄罗斯馆藏及服务：过去，现在，将来*

哈罗德·M·莱克**

【内容提要】 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次系统的俄罗斯馆藏始于1906年的“尤金馆藏”。此后，通过各种渠道定期地收购俄罗斯或与俄罗斯相关的资料。国会图书馆秉承全面、普遍的馆藏原则，受政治变化影响较小。俄罗斯馆藏的丰富与发展，也与20世纪直到今天的历任馆长的推动密切相关。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俄罗斯馆藏的形式和内容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展望未来，国会图书馆将继续充满兴致地收藏来自俄罗斯和与俄罗斯相关的资料。

【关键词】 国会图书馆 尤金馆藏 俄罗斯馆藏 馆长

【中图分类号】 G250.25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1)01-0110-(12)

引言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俄罗斯馆藏的过去和现在，可以用几段的篇幅来总结（当然，该部分馆藏的未来写起来更加困难），然后笔者会用更有趣的细节加以充实。

国会图书馆建立于1800年，是美国这个新国家的第一个文化机构。1897年购买了第一栋属于自己的建筑（它位于国会山的其他建筑分别于1939年和1980年启用）。一百多年前，也就是国会图书馆建立一百多年后，开始了第一次系统地收藏有关俄罗斯的资料。1906年，国会图书馆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购得8万册图书，称为“尤金馆藏”（Yudin Collection）^①。自那时起，它大体上定期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JJD810005）的阶段成果。

** 哈罗德·M·莱克（Harold M. Leich），美国国会图书馆欧洲部俄罗斯地区专家馆员。本论文的观点来自作者，并不代表国会图书馆或美国政府的官方观点。

① 关于尤金馆藏的历史，国会图书馆对其的收购，以及其随后的命运，参见 Harold M. Leich, “‘So Ample a Collection, So Well Balanced’: The Yudin Collection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lavic & East European Information Resources*, 2008, no.2.

地收购俄罗斯的印刷出版资料，并且达到了相当全面的水平。而对非出版物，例如照片、海报、声音记录和电影的收购则不是那么规律。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到 1991 年苏联解体的冷战时期，国会图书馆从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地区购买的关于俄罗斯和苏联的资料大幅度增加，并且增加雇员来负责这些资料的购买、编目、保存、翻译和服务。

据笔者估计，现在国会图书馆藏有大约 80 万册俄文藏书（书籍、期刊合订本和相当册数的缩微资料），和大概相同数量的其他语言的关于俄罗斯的藏书，主要是英语、法语和德语，也有使用前苏联其他语言的^①。由于国会图书馆意在收藏全面而普遍的、任何版式的，符合国会、其他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大众现实与长远利益的资料，所以苏联解体之后，来自俄罗斯和关于俄罗斯的收藏也没有停止。这其中也并不是没有碰到问题。这种收藏行为还极有可能继续下去，并且更加侧重于收藏原稿是电子版的资料，将网站存档和印刷材料数字化。

现在笔者将介绍一些细节，来充实国会图书馆的俄罗斯馆藏和项目的一些更有趣的方面。国会图书馆和其他美国政府部门不同，它在行政上直接受美国联邦立法部门——美国国会的领导。图书馆负责人（被称为“国会图书馆长”）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批准，任职终身。这与行政部门不同，行政部门首长随着四年一度的总统换届而变动（而且经常更加频繁）^②。此外，国会图书馆长是图书馆中唯一由总统任命的人员（与大部分行政部门不同，在行政部门内部，一些主要科室负责人也由总统任命，在大一些的部门由总统任命的甚至多达几十人）。

笔者认为，图书馆负责人终身任职和其他高层管理职位不由政府任命是有好处的。这样能将国会图书馆和日常的党派政治隔离开来，而且让图书馆及其员工以“长远眼光”提出对国会图书馆、国家和其他图书馆有着持久积极影响的政策和项目。

本论文旨在透过对 20 世纪的历任国会图书馆长（其中一位处于 19 世纪）的描述，传达一些他们在俄罗斯馆藏建设过程中的精彩手笔。有几位图书馆长任职时间很长：安斯沃思·兰德·斯波福德（Ainsworth Rand Spofford），1864-1897 年；赫伯特·普特南（Herbert Putnam），1899-1939 年；L·昆西·曼福德（L. Quincy Mumford）1954-1974 年；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1975-1987 年。现任图书馆长詹姆斯·H·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从 1987 年 9 月任职至今。所有 20 世纪的图书馆长对国会图书馆的俄罗斯和斯拉夫馆藏都有着重大影响，该部分馆藏可能是其来源国之外规模最大的。

① 关于国会图书馆各种格式的俄罗斯馆藏的概述，参见 <http://www.loc.gov/rr/european/coll/russ.html>。

② 最高法院法官，联邦法官，像国会图书馆长一样，都终身任职。

安斯沃思·兰德·斯波福德（Ainsworth Rand Spofford）

安斯沃思·兰德·斯波福德（Ainsworth Rand Spofford）从1864年至1897年担任国会图书馆长^①。他确立了国会图书馆作为美国版权机构的地位，这样就可以通过版权缴送，为国会图书馆的收藏提供新的免交版权费的美国出版物。他也为1897年开放的国会图书馆第一栋专有建筑争取到了经费。虽然那时国会图书馆还没有收集有关俄罗斯的资料，斯波福德却为后来收藏这些资料奠定了基础，主要是他与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②达成了一份分工协议，由此国会图书馆继承了该学会的海量藏书，并且接管了该学会与全世界范围的图书馆交换资料的业务，包括与俄罗斯伙伴^③。

赫伯特·普特南（Herbert Putnam）

赫伯特·普特南在1899年至1939年的40年间担任国会图书馆长。正是在普特南的领导下，国会图书馆馆藏从美国资料和传统的“西方文明”向世界范围扩展。普特南是推动国会图书馆于1906到1907年间第一次收购俄文资料（也就是8万卷的尤金馆藏）的主要力量。收购这样一份业已存在的、全面的、平衡的馆藏非常契合普特南时代的通常做法，也与他本人的目标有关：他想通过全球范围的收购来推动国会图书馆向更高层次发展，即成为美国的国家图书馆^④。此项工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积极态度和善于交往的能力。

在他任职期间，特别是他在任的早期，普特南的主要精力放在开放和扩大国会图书馆、加大活动范围、提升形象，将注意力转向国际收购和以其远见卓识不断把国会图书馆建成事实上的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现今的地位和名声的许多方面，

① 关于斯波福德，参见 John Y. Cole, *Ainsworth Rand Spofford, Bookman and Librarian*,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1975.

② 译者注：史密森尼学会，是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

③ 关于国会图书馆和史密森尼学会的关系，参见 Nancy E. Gwin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 Legislated Relationship”, in Cole and Aikin, *Encyclopedia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2004, pp.91-102, 和她的另一作品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the Global Exchange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1834-1889”,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10, no.1.

④ 关于普特南和他在1899年至1939年间作为国会图书馆长的任期，参见 Rosenberg, Jane Aikin., *The Nation's Great Library: Herbert Putnam an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899-1939*, Urbana, IL: U. of Illinois Press, 1993; Mearns, David C., “The Story Up to Now” [Histor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800-1945], *Annual 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for the Fiscal Year Ending June 30, 1946*, Washington: GPO, 1947, pp.13-227; and John Y. Cole, “Putnam, Herbert”, in Cole, John Y. and Jane Aikin, editors, *Encyclopedia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4.

包括国外馆藏建设，都可以追溯到普特南时期，都是他的许多举措的直接结果。

举例来说，在普特南任期的前 10 年内，在其领导下开启了许多重要项目和举措：

- 印刷目录卡并分发到其他美国图书馆，实际上开始了标准化著录和主题编目；
- 开发、公布并实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系统；
- 创建将其他联邦图书馆不需要的资料转移到国会图书馆的固定机制；
- 在 1910 年建立立法参考服务部（现在称为国会研究服务部），该部直接为国会和议员提供咨询和分析服务；
- 国会的拨款、图书馆员工数量的大幅增长；
- 收藏外国资料的兴趣大增（例如，购买“尤金馆藏”，雇佣俄国员工阿列克谢斯·巴宾(Alexis Babine)^①，1905 年开始的外国档案复印项目）；
- 提供咨询服务“……无需介绍或证明，完全免费地向任何地点的任何申请人提供服务”；
- 1906 年，国会图书馆参与全国范围的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计划；
- 1930 年购买奥托·福尔贝尔(Otto Vollbehre)收藏（一份无与伦比的有着 3115 本古版书的馆藏，其中包括一份保存完好的古腾堡圣经的副本）^②。

在普特南的领导下，国会图书馆在全国层面上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为研究性和公共性图书馆提供了许多重要服务。例如，《国家联合目录》^③、《连续出版物的联合目录》^④和其他更加专业的参考工具的编写和维护，开发实际上的国家标准的著录编目代码，提供印刷编目卡上的杜威(Dewey)分类数字（这是国会图书馆为其他图书馆提供的一种服务，但其自身从未使用杜威作为图书检索系统）。1932 年末，普特南第一次明确将国会图书馆定义为国家图书馆，那时他自豪地宣布国会图书馆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⑤。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美国人对俄国的兴趣更加浓厚。这有各种各样的

① 关于巴宾及其在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地方的职业生涯，参见 Evgenii Pivovarov, *A. V. Babine, 1866-1930 gg*, Sankt Peterburg: Petropolis, 2002.

② Annette Melville, *Special Collection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 Selective Guide*,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80, p.255.

③ 国家联合目录(National Union Catalog)被作为卡片目录使用了很多年，其中包含了很多北美图书馆送来的目录卡。1956 年前的国家联合目录在 1969 年至 1981 年间被分为 754 卷出版：*The National Union Catalog, Pre-1956 Imprints*, London: Mansell. 1956 年后的国家联合目录以季刊、年刊和五年合订本的形式每月出版。作为一种印刷品，国家联合目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淡出，被大型的在线数据库取代，例如 OCLC, RLIN, WLN 和 UTLAS(后三者现已不存在)。

④ *Union List of Serials in Libra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Wilson, 1927。其第二版于 1943 年出版，第三版也是最终版，总共 5 大册，1965 年出版（两者都由 Wilson 出版）。

⑤ 关于普特南时期国会图书馆的项目，参见 Rosenberg, *The Nation's Great Library*, 1993; and Mearns, *The Story Up To Now*, 1947.

原因：对共产主义和“红色”俄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社会主义的恐惧；越来越多的俄国人逃亡到美国，这些人经常代表了革命前俄国在文化、社会、艺术、文学和宗教方面的精英；对发生在俄国的新社会实践的痴迷（妇女解放、性革命、农业集体化等等）；美国企业与俄国和在俄国国内做生意的机会。

20世纪20年代，国会图书馆必须采取新的方法来得到俄国出版物。官方交换不可能，因为直到1933年美国才在外交上承认苏联。一些非官方交换机制得到确立，但是这方面的档案资料很少。许多来自俄国的资料是作为赠品获得的。美国驻拉脱维亚（那时还是一个未加入苏联的独立国家）领事馆定期为它在里加的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购买俄国出版物，这些资料被送往国会图书馆的文件部（Division of Documents）作为馆藏的补充。

最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整个30年代，国会图书馆从纽约的两个图书经销商以色列·珀尔斯坦（Israel Perlstein）^①和西蒙·博兰（Simeon Bolan）^②那里系统地购买俄国出版物，主要是革命前的，也包括苏联时期的。这两个经销商有渠道购买到数以万计的20世纪20年代从私人 and 图书馆中没收的书籍和刊物，通过西欧和纽约的经销商和拍卖行出售这些书籍和刊物。

20世纪30年代从珀尔斯坦那里购买到的一份有趣而特别的俄国收藏，是在馆长普特南的直接干预下得到的“俄国皇家收藏”，其中包括来自冬宫，及位于圣彼得堡及其周边其他皇家宫殿的众多沙皇私人图书馆中的2800册图书，主要是来自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和他们的家族。^③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

麦克利什在1939至1944年间担任国会图书馆长。^④包括国会图书馆内部员工在内的很多人的结论是，40年间由同一位馆长领导，导致国会图书馆僵化，员工散漫。

① 关于珀尔斯坦，参见 Robert Karlowich, “Israel Perlstein and the Russian Book Trade in the U.S.”, *Newsletter*, Slavic & East European Sectio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7, no.3.

② 关于博兰，参见 Irina Tarsis, “Book Dealers, Collectors, and Librarians: Major Acquisitions of Russian Imperial Books at Harvard, 1920s-1950s”, in Anne Odom and Wendy R. Salmond, editors, *Treasures into Tractors: the Selling of Russia's Cultural Heritage, 1918-1938*, Washington: Hillwood Estate, Museum & Gardens, 2009, pp. 369-387.

③ 关于该部分馆藏的细节，以及收购过程，参见 Harold M. Leich, “The Tsar's Library, Books from Russian Imperial Palace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Odom and Salmond, *Treasures into Tractors*, 2009, pp. 341-368.

④ 关于麦克利什，参见 John Y. Cole, “MacLeish Archibald”, in Cole and Aikin, *Encyclopedia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4, pp.323-325; and Scott Donaldson, *Archibald MacLeish, an American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在离开国会图书馆很多年后，麦克利什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国会图书馆）确实已经崩溃。我最崇拜普特南，他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一个人担任领导太久又是另一回事。”^①

在麦克利什极短的任期内，他完成了对国会图书馆的重大改组，并且说服国会大幅增加国会图书馆的预算，包括提高员工工资和增加更多职位。后来麦克利什把他最大的两项成就描述为“将国会图书馆推向 20 世纪”和“将国会图书馆与学术界联系起来”。^②他任职的大部分时间正值二战，那时美国和苏联是盟友，美国对俄罗斯和苏联的兴趣又一次显著增加。

麦克利什任职期间设立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外国出版物采购部门间委员会（后来称战时出版物合作采购项目）。在二战期间成立的该委员会为军方、安全部门和一些重要的美国大学图书馆提供外国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副本则收藏在国会图书馆自己的馆藏之中。国会图书馆自身也根据该委员会提供的出版物编写一些内部资料和分析（那时被分类为“保密”）。^③截至 1947 年，该项目向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分发了超过 80 万份出版物，不仅展示了“美国的主要图书馆合作购买珍贵外国出版物的能力，也展示了国会图书馆领导这些全国性合作行动的能力。”^④

路德·H·埃文斯（Luther H. Evans）

路德·埃文斯在 1945 至 1953 年间担任国会图书馆长，这段时间正是冷战前期，但联邦对俄罗斯研究和馆藏拨款的巨大增长，则是在 1957 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国会图书馆开始出版《新增俄罗斯图书月度索引》，这是一本对美国的图书馆和学者极有价值的信息和筛选工具。^⑤另外两份更加综合性的书目类出版物也是在埃文斯时期开始发行的，它们分别是《缩微报纸》^⑥和《新连续出版物题

① Archibald MacLeish, *Reflections*,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6, p. 129.

② *Ibid.*, p.136.

③ 例如，它的《外国出版物主题索引》（*Subject Index to Foreign Publications*），出版于 1945 年 1 月 13 日，以《名人摘要》（*Abstracts on Personalities*）为补充，两者现已解密，在国会图书馆馆藏中。

④ William G. Jones and Paul Mosher, “Academic Libraries”, in Robert Wedgeworth, editor, *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3rd ed.,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3, p.18.

⑤ 这份出版物从 1948 年 4 月到 1969 年 5 月每月发行，1948 年至 1957 年间其标题为《新增俄罗斯图书月度列表》（*Monthly List of Russian Accessions*）。

⑥ *Newspapers on Microfilm*, First-sixth editions,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48-1967.

名》^①。在 1957 年俄国馆藏大幅增加后，这些出版物对大学图书馆里的俄国书目编辑们特别重要。

正是在埃文斯任职期间的 1951 年，一个独立的斯拉夫部在国会图书馆内被重新建立，其职责包括公共服务、馆藏发展、特别项目和该领域相关书目的出版^②。在美国流亡的著名历史学家和书目编辑谢尔盖·雅各布松（Sergius Yakobson），自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就担任国会图书馆俄国和斯拉夫事务的顾问。他在 1951 年被任命为斯拉夫部主任，并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 1971 年退休。^③

埃文斯任期内一项重要而特别的收购，是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普罗库金-戈尔斯基（Sergei Mikhailovich Prokudin-Gorsky, 1863-1944）在 1905 至 1914 年间拍摄的俄国乌拉尔、西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的彩色照片。这些收藏在 1948 年从拍摄者的后代手中买来（拍摄者本人在 1918 年移居国外，最后在巴黎逝世），包括 1903 张玻璃底片和 14 本记录他在俄罗斯帝国各地拍摄旅程的黑白印刷相册。由于玻璃底片的技术和保存的问题，直到进入数字时代的 20 世纪末，这些彩色照片才被“复原”，它们原有的美得以重见天日。通过扫描这些底片打印出来的彩色照片异常清晰，就好像拍摄于昨天，但也引发人们在观看一个早已消失的世界时产生的伤感。特别是在俄罗斯，这些照片的电子版是国会图书馆网站上点击率最高的内容之一。^④

L · 昆西 · 曼福德（L. Quincy Mumford）

L · 昆西 · 曼福德在 1954 至 1974 年间担任国会图书馆长。他在冷战最激烈的时代保证了俄罗斯和苏联馆藏的大幅增长。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逐渐对外部开放。国会图书馆与苏联和俄罗斯图书馆大规模的资料交换，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得以确立。这些交换带来了大量资料。在曼福德的策划下，负责处理俄罗斯与

① *New Serial Titles*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51-1999?) 每月发行，每一年出合订本。1951 年至 1952 年其标题为: *Serial Titles Newly Received*。1950 年至 1970 年的合订本于 1973 年发行，标题为: *New Serial Titles, a Union List of Serials Commencing Publication after December 31, 1949. 1950-1970 Cumulative*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New York, Bowker, 1973). 4 volumes. 由同一出版商发行的另外的多年合订本包括 1971-75, 1976-79, 1981-85, 和 1986-89。该出版物 1999 年似乎已经停止发行。

② 关于斯拉夫部的行政历史的详尽介绍，它的前身和继任者，包括今天的欧洲部，参见 Jane Aikin, “European Division and Collections”, in Cole and Aikin, *Encyclopedia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4, pp.233-238.

③ 关于雅各布松，参见“Jakobson Sergei Iosifovich”, in *Nezabytye mogily: rossiiskoe zarubezh'e, nekrologi 1917-2001.*, Tom 6, chast' 3, Moskva: Rossiiskaia gos. biblioteka, 2007, p. 639.

④ 关于普罗库金-戈尔斯基馆藏，参见 S. P. Garanina, *Rossiiskaia imperiia Prokudina-Gorskogo, 1905-1916*, Moskva: Krasivaia strana, 2006. 图片的电子版参见，<http://www.loc.gov/pictures/collection/prok>.

斯拉夫资料、并帮助读者寻找和使用这些资料的专业雇员人数大量增加。保罗·霍尔斯基 (Paul Horecky)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被聘任为斯拉夫部的助理主任, 协助雅各布松主任, 处理由于负责俄罗斯资料的雇员人数增长而与日俱增的行政事务。

在曼福德领导下, 国会图书馆还开展了很多重要的、旨在帮助美国其他图书馆的全国性项目: 1963 年汇编并出版 (缩微卡)《西里尔联合目录》^①, 设立全国图书采购项目^②, 设立海外办事处为国会图书馆和其他美国研究型图书馆购买资料^③。这些举措许多都发生在 1957 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不久, 这次发射导致联邦大幅增加拨款, 用于与苏联集团国家相关的教育和图书馆项目^④。

在曼福德任期内, 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发展是自动化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 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用于书目记录的标准化机读格式 (MARC)。起初这种格式是用来制造为手动卡片目录生产纸卡的计算机记录, 随着大容量机读编目记录的发明, 引发了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诸如在线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OCLC) 和研究资料库信息网络 (RLIN) 之类的大型数据库的兴起, 并最终使得美国的图书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几乎全部使用网上公共检索目录。

需要提及的是, 在冷战期间, 国会图书馆的收藏并不局限于军事、安全和技术资料, 而是坚持贯彻其丰富而全面的收藏方针——反映其 1906 年购买的“尤金馆藏”和其作为拥有世界性馆藏图书馆的一般哲学。所以, 国会图书馆大量收藏人文社会科学、科学与技术类资料, 搜集所有可以得到的、实际或可能具有信息性价值的关

① *Cyrillic Union Catalog, Pre-1956 Imprints* [microprint]., New York: Readex Microprint, 1963。《西里尔联合目录》的原始主要款目和书名卡片文件在国会图书馆欧洲部。该目录有 178226 份书目。

② 关于全国图书采购项目 (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参见 John W. Cron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Libri* (Copenhagen), 1966, no.2; and Edmond L. Applebaum, “Centralized Cataloging for the Country, Now and in the Future”, in *Changing Concept of Service in Libraries: a Centennial Lecture Series and Symposium*, Terre Haute, Indiana: Dept. of Library Science,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1970, pp. 42-57.

③ 国会图书馆的海外办公室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早期。当时法明顿计划 (The Farmington Plan) 确保了任何有研究价值的外国作品在美国图书馆中至少有一件副本。该计划于 1947 年开始生效, 但没有涵盖任何苏联集团国家。关于这个计划的主要历史, 参见 Ralph D. Wagner, *A History of the Farmington Plan*, Lanham, 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2002。从 1965 年到 1972 年, 国会图书馆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有一个采购办公室, 从 1973 年到 1977 年在波兰华沙有一个采购办公室。

④ 关于联邦对研究苏联和东欧项目巨大拨款的快速增长 (包括馆藏), 特别是关于 1958 年国防教育法案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提供的资金, 参见 Joseph Axelrod and Donald N. Bigelow, *Inventory of NDEA Title VI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s* (Washington: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61); and Donald N. Bigelow and Lyman H. Legters, *NDEA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s, a Report of the First 5 Years* (Washington: Office of Education, U.S. Dep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64). (*OE Bulletin*, 1964 no.41)。作为回顾美国“苏联学”的后苏联观点, 参见 David C.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 Press, 2009.

于苏联的出版物。国会图书馆还全面收藏流亡出版物，对苏联官方的出版物和观点提供一种平衡。

丹尼尔·J·布尔斯廷 (Daniel J. Boorstin)

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1975至1987年担任馆长。在他任期内图书馆自动化快速发展，由于非罗马字母脚本以罗马字表现，机读(MARC)编目向所有语言和格式扩展。作为一部重要的书目工具，1980年出版的《斯拉夫西里尔联合目录》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西里尔联合目录》的更新^①。全国范围内拥有主要斯拉夫和东欧馆藏的研究型图书馆长们，开始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合作和沟通，例如计算机编目、图书馆网络、合作收购、罗马化标准、甄别优秀的阅选订购供应商、处理日益增长的馆藏积压，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对稀缺和难以检索的俄罗斯与东欧资料的需求等等^②。特别是以欧洲部助理主任大卫·H·克劳斯(David H. Kraus)为代表，国会图书馆也积极参加了这场全国性运动。

布尔斯廷的另一举措延续至今，即他倡议建立的图书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Book, 1971年)。该中心主要负责图书和阅读推广、图书馆间合作以及图书和阅读的历史研究^③。该中心传统上对俄罗斯有着浓厚兴趣，并帮助在俄罗斯建立了几个地区中心以研究图书和阅读。2006年，该中心与其他机构在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合作出版了一份重要的阅读推广的研究成果。^④

詹姆斯·H·比林顿 (James H. Billington)

现任图书馆长詹姆斯·H·比林顿自1987年任职至今。他的任期见证了东欧共产主义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和几乎同时开始的数字时代。国会图书馆也随之进入数字世界，成为一个主要的电子信息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第一个担任国会图书馆长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者，他超越常规图书馆的职能，比如收购、编目、检索服务和保存等，将图书馆与俄罗斯有关的活动、项目和举措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

① *Slavic Cyrillic Union Catalog* [microform], Totowa, New Jersey: Rowman & Littlefield, 1980。国会图书馆仍然保存着大约35万份卡片的原始文件。

② 机构间合作正式开始的标志，是1975年9月于伊利诺伊大学举行的“斯拉夫图书馆长会议”。

③ 关于该中心，参见John Y. Cole, “Center for the Book”, in Cole and Aikin, *Encyclopedia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4, pp. 203-207; Guy Lamolinar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oles of the Center for the Book”,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10, no.1.

④ Valeria Stelmakh and John Cole, editors, *Building Nations of Readers: Experience, Ideas, Examples*, Moscow: Pushkin Library, 2006.

平。这些特别项目包括展览、研讨会和其他各类会议，以及对俄罗斯图书馆的资助项目、针对俄罗斯图书馆员工和档案管理员的实习项目、和大规模扩大与诸多俄罗斯机构之间的联系。

比林顿任期内与俄罗斯馆藏建设有关的一些案例包括：

- 1990年3月在莫斯科设立收购办公室，负责收购1985至1991年间短暂的“公开化”和“改革”时期的资料，特别是那时的“独立的”或非官方出版物。^①

- 1994年接受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赠与的5000卷缩微胶卷，包括了该所绝大部分缩微拍摄的苏联共产党的解密档案。

- 向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图书馆提供缩微拍摄设备的长期贷款。这些设备是美国国防部盈余下来捐赠给国会图书馆的。通过与单个图书馆达成的协议，国会图书馆将得到这些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图书馆缩微拍摄资料的副本。

- 开发“国境碰面”数字图书馆网站（“Meeting of Frontiers” digital library website）。该网站聚焦18和19世纪俄罗斯帝国在美洲的领土、俄罗斯与美国的边境线，以及它们在阿拉斯加的碰面。自1999年开展以来，该项目已经从俄罗斯（特别是西伯利亚）、德国和美国的博物馆中购买了数以千计的数字资料。^②

- 2002年维克多·卡姆金（Victor Kamkin）书店（罗克维尔，马里兰）破产时，国会图书馆购买了近1900册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图书。国会图书馆被允许挑选适合自己馆藏的图书，这样就填补了苏联末期和后苏联时代早期的许多空白。因为这段时间苏联和后苏联经济的急剧变革造成许多国会图书馆的传统供货商破产。^③

- 根据一项与新建立的、位于圣彼得堡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图书馆的协议，国会图书馆开始收购1917年前重要的俄国历史、文学和法律方面的电子版图书。

随着苏联剧变、俄罗斯独立并走向民主与资本主义的道路，国会图书馆的俄罗斯馆藏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国会图书馆目前购买的绝大部分的新出版物，是来自经销商，而不是通过以前的图书馆间交换的方式。虽然也保留了一些交换关系，但大部分新进馆藏来自商业经销商。同时，接受赠予也成为俄罗斯馆藏的一个愈加重要的来源。考虑到国会图书馆很高的声望，许多作者想获得一种荣誉（不论这种荣誉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自己的作品被国会图书馆收藏、其在线目录中有自己作

① 国会图书馆关于苏联独立出版物的馆藏目录出版于1991年：*New Soviet and Baltic Independent Serial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 Holdings List*,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1。一个扩充和更新版本将很快能在欧洲部主页上看到：<http://www.loc.gov/rr/european/pubs.html>

② 该数字图书馆见：<http://frontiers.loc.gov/>

③ 关于卡姆金项目，参见 Harold M. Leich, “The Victor Kamkin Bookstore an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2 and 2006 Events”, *Slavic & East European Information Resources*, 2007, no.1.

品的书目记录。国会图书馆姐妹部门——“开放的世界”中心，资助一些俄国参观者来美国，他们也经常赠予国会图书馆一些来自/或关于他们所在城市和地区的书籍。^①

结 语

得益于国会图书馆从整体着眼的收藏方针，冷战的结束没有造成其俄罗斯馆藏建设的结束——恰恰相反，国会图书馆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尽可能全面地收藏，并试图跟上俄罗斯的“印刷”爆炸（更多的书名、更有趣的资料 and 更少的出版印数）和数字革命的步伐。

由于1991年后在自由化的俄罗斯的旅行存在限制，国会图书馆现在在新的研究领域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服务：生态学、人种志、人类学和族群关系等。现在研究生写论文时不只需要依靠在美国的图书馆研究和在俄罗斯进行档案研究，更多的研究涉及到实地调研。我所熟悉的最近的例子是一群研究生研究咸海的生态，并开展关于多民族聚居城市，比如乌法、喀山的族群关系研究。到这些地方旅行并与普通俄国民众直接互动，在几乎整个苏联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国会图书馆和其俄罗斯馆藏将越来越数字化。这已经在国会图书馆的网站上，特别是欧洲部的主页上得到反映。其网站上有通向以往书目出版物的数字化全文链接^②，也有更新的完全数字化的目录、参考书目和查询指南。^③国会图书馆也有一个“世界入口”（“portals to the world”）网站，网站内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对应的门户页面，以便指导和帮助初始研究者/或高级研究员，获得来自该国的/或关于该国的信息资源。^④

当然，未来难以预测。大部分馆藏将数字化。选择网站以进行存档变得愈加重要。俄罗斯仍然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国家和参与者。毋庸置疑，美国国会对俄罗斯的兴趣也将是持久和深厚的。对于学术界（世界上数以千计的学者和学生）而言，俄罗斯仍会是一个主要关注点。笔者的预测是，在不确定的将来，国会图书馆将继续收藏来自俄罗斯/和关于俄罗斯的各种形式的资料。

（罗甘本 译）

① “开放的世界”项目的信息见：<http://www.openworld.gov/>。

② 例如，Rudolf Smits, *Half a Century of Soviet Serials, 1917-1968*, Washington: LC, 1968, 全文见：<http://www.loc.gov/rr/european/bibs/smits.html>。

③ 例如，Angela Cannon, *Russian Newspaper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10, 见<http://www.loc.gov/newspapers/ru/runews1.html>。

④ 世界入口网站：<http://www.loc.gov/rr/international/portals.html>。

【Abstrac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first began systematically collecting Russian materials as Yudin Collection in 1906. Since then it has more or less regularly collected Russian or Russian-related print materials at a fairly comprehensive level. In accordance with comprehensive and general collection principles,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s isolated from everyday partisan politics. The highlight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s Russian collection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roles and efforts of each Librarian of Congress from the prism of the 20th century till now. With the approaching of the digital era, the Library's Russian collection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more diverse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Looking ahea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ill continue to collect materials from Russia and Russian-related ones with great enthusiasm.

【Key Words】 Library of Congress, Yudin Collection, Russian Collection, Director

【Аннотаци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онгресса впервые начала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собирать рус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1906 году, и началось всё с «коллекции Юдина». С тех пор по различным каналам на регулярной основе библиотека приобретает российские ил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Россией материалы.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онгресса США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сеобъемлющих, общ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колле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и в малой степени зависит о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Развитие и обогащ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коллекции с XX века и по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содействием директоров библиотеки. Вслед за началом цифровой эры, русская коллекция по форме и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акж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более богатой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ой. Заглядывая в будуще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онгресса будет по-прежнему с большим интересом пополнять коллекцию материалов из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связанных с Россией изда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ллекция Юдина, русская коллекция, директор библиотек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日本的中部欧亚研究： 俄罗斯研究与东方研究的紧密结合*

宇山智彦**

【内容提要】19世纪后期，日本学者把东亚历史研究与西亚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研究中亚注重使用俄语、突厥语资料。苏联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时期的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独立国家的涌现，引起了日本学者、学生及普通百姓的极大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现代中亚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在研究方式、研究范围、学科设置、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日本 中亚研究 中部欧亚 东方研究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1-0122-(6)

日本的中亚研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当时东方历史学界的著名学者正着手研究今天新疆与蒙古地区的古代史。人们认为日本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比欧洲学者更为了解古汉语的起源，比中国学者更为精通现代研究方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日本诞生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内亚（Inner Asia）历史专家，如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大谷光瑞（Otani Kozui）、羽田亨（Haneda Toru）、原田晃（Haneda Akira）、森正夫（Mori Masao）和佐口透（Saguchi Toru）。这些专家运用古汉语和其他古代语言的原始资料研究古代历史（尽管一部分人也研究清朝统治下的新疆），强调中亚在欧亚大陆东西部间号称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日本外交官西德二郎（Nishi Tokujiro）早在1880年就已前往俄罗斯中

* 本文为作者2010年7月3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第八届世界会议之圆桌会议“东亚的斯拉夫‘欧亚研究’是否存在‘东方视角’？”提交的发言材料。

** 宇山智彦（Uyama Tomohiko），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教授。

亚地区做过调查研究，而且 20 世纪前半叶日本特工时常造访新疆，但是当时日本却对中亚不感兴趣。^①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年轻学者，尤其是后来成为帖木儿历史权威的间野英二（Mano Eiji），批评老一辈学者过于依赖中文史料并将中亚纯粹视为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相反，他们建议通过使用中亚人所著的波斯语、突厥语及其他语言的史料，“自内而外地”研究中亚。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对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汗国、东突厥以及中亚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因此使东亚历史研究与西亚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尽管对近代中亚仍然缺乏兴趣，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一些受过突厥语和伊斯兰教历史方面培训的学者开始认真研究俄罗斯帝国与俄国革命时期的中亚，其研究同时使用俄语史料和突厥语/波斯语史料。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些研究俄国历史的专家也开始研究中亚历史，但由于他们不懂中亚语言，并将中亚视为俄罗斯帝国与苏联的边缘地区，因此双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然而，他们对俄国在中亚的殖民政策皆持批判的观点。^②

苏联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时期的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独立国家的涌现，引起了日本学者、学生及普通百姓的极大关注。得益于对（前）苏联中亚地区的研究机会，日本涌现出一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本人曾是东京大学俄罗斯研究系的一名学生，同时研究东方历史和语言，作为日本第一批苏联政府奖学金获得者之一，1989—1990 年间在莫斯科、塔什干和阿拉木图居住过。

然而，曾论及中亚地区的俄罗斯研究专家与中东研究专家的人数可能大于中亚研究专家本身的人数，而且，将中亚视为大中东的一部分这种偏颇的观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十分流行。这种情况增强了中亚专家的团结意识以及建立中亚研究所并将其作为与俄罗斯研究及中东研究互动的独立研究领域的意识。毕业于俄罗斯研究系与毕业于东方历史系的中亚专家间的差异变得次要，双方都开始运用俄语及非俄语史料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中亚研究的重点之一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鞑靼与乌兹别克贾迪德以及哈萨克自治论者阿拉什奥尔达），因为他们运用中亚语言创作了大量反映俄罗斯帝国以及帝国与自身以外的穆斯林（尤其是奥斯曼帝

① 1978 年以前所出版作品的详尽参考书目，参阅日本中亚研究所文献目录，1979 年—1987 年 3 月（东京：东亚文化研究中心，1988）。其索引与勘误表于 1989 年在同一中心公布，在此基础上更新的一个数据库可供使用，地址为 https://dbr.nii.ac.jp/infolib/meta_pub/G0000043BCAJ-en。

② 西方学者也如此认为，但当他们时常从冷战逻辑的视角来批判俄罗斯/苏联的民族政策时，日本知识分子一般会与被压迫民族产生共鸣。

国的穆斯林)间联系的原始资料。^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几年内,日本的现代中亚研究获得迅速发展。在组织方面,东京大学东方历史系学者与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学者间的合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京大学的小松久男(Komatsu Hisao)教授是日本现代中亚研究的先驱和领袖,并且使东京几乎所有中亚研究的学生都聚集到他身边。斯拉夫研究中心(SRC)是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并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和项目的国家中心,中亚研究在其中占有显著地位。现在斯拉夫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东方研究重叠,并有人笑称斯拉夫研究中心已经成了一个“非斯拉夫”研究中心。

小松教授的研究团队与SRC经常合作组织会议,同时也与其他团体的学者们交流互动,其中包括新疆研究专家与中亚中世纪史专家。利用这些网络,日本的中亚研究专家共同创作了一部可靠的百科全书和其他一些概括性的著作。^②据我们所知,俄国语言文学研究专家与东方研究专家间的这种合作在北美与西欧也能见到,但日本的中亚研究似乎更为平衡:俄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在北美的中亚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穆斯林研究专家在西欧脱颖而出。此外,虽然许多专门研究中亚的西方历史学家往往只以乌兹别克斯坦为研究焦点,但是在日本,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哈萨克斯坦的研究,也很发达。

除狭义的中亚研究之外,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特别是鞑靼斯坦,吸引了日本学者的大量关注,西方学者的情况也同样如此。^③诸如卡尔梅克(Калмыки)、楚瓦什(Чуваши)与受洗鞑靼(Кряшены)等非穆斯林民族,一些日本人也特别感兴趣。日本的高加索研究比中亚研究冷门,或许是因为高加索与日本之间的地理与心理距

① 关于中亚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作品是小松教授关于Abdurauf Fitrat的专著:『革命の中央アジア——あるジヤデイドの肖像』(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此外,我们可以列举一些英文出版物Komatsu Hisao,"Bukhara and Istanbul:A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Munāzara,"in Stéphane A. Dudoignon and Komatsu Hisao,eds., *Islam in Politics i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Early Eighteenth to Lat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Kegan Paul, 2001), pp.167-180; Idem, "Bukhara and Kazan,"*Acta Asiatica* 86(2004),pp.75-90;Uyama Tomohiko,"Two Attempts at Building a Qazaq State:The Revolt of 1916 and the Alash Movement,"in Dudoignon and Komatsu, *Islam in Politics*, pp.77-98; Idem,"A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Kazakh Intellectuals and Russian Administrators:Imagined Communities in *Dala Walayatining Gazeti* (1888-1902),"in HAYASHI Tadayuki,e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istories in Slavic Eurasia* (Sapporo:Slavic Research Center,2003), pp.237-259.

② 其中最重要的是:小松久男,梅村坦,宇山智彦,带谷知可,堀川徹編『中央ユーラシアを知る事典』(东京,平凡社,2005年);『現代中央アジア論:変貌する政治・経済の深層』(岩崎一郎、小松久男と共編著)(日本評論社,2004)。

③ 事实上,日本现代中欧亚研究中的第一批基础性专著之一是由Mirsaid Sultangaliev (1892-1940)所写,他是一名在西方历史学家中广受欢迎的穆斯林共产党员。山内昌之,『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夢——イスラム世界とロシア革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

离较远。但在过去十年里，高加索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些取材于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语和波斯语资料的研究进展。总而言之，尽管研究高加索地区的专家数量仍相对较少，但包括中亚研究、伏尔加—乌拉尔研究与高加索研究在内的中部欧亚研究，在斯拉夫欧亚研究与穆斯林地区研究中都占有显著地位。^①中部欧亚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未被开发的研究领域，在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中很受欢迎。有些人甚至半开玩笑地“指责”中欧亚研究专家影响了俄罗斯研究的流行度。

在学科方面，历史研究仍占主导地位，但人类学家、政治学家与经济学者也都积极研究中亚地区。特别是人类学家（偶然或并非偶然，其中大部分是女性研究人员）已经促成了从微观层面对中亚社会的了解。中亚的时事政治与经济事务分析同样也做得相当好，但其中大多数主要是关于国内消费的，而且除日本以外鲜为人知。其他缺点还包括在中亚几乎没有日本非政府组织，日本报刊质量欠佳，从而导致了缺乏能够从半学术半实践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作者。

日本的中部欧亚专家一直致力于促进与中部欧亚国家学者的合作，同时也在促进与西方同仁的合作。学术会议与联合研究项目已经创作出了许多合订本形式的英文成果，并帮助有才能但未曾出版过英文作品的中部欧亚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加入国际研究机构。^②在与学者建立合作及进行中亚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受益于日本同该地区国家间普遍的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历史学家享有相对的（尽管远不是完全的）研究自由，而西方学者在这一地区正遭遇获取档案材料和手稿的困难。^③

当然，日本的中部欧亚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少数学者感到精疲力竭，他们除了需要使用各种语言材料工作之外，还需作为俄罗斯研究与东方研究间的桥梁并与各国研究机构保持联系。此外，老年学者与中年学者都肩负组织和行政工作，而年轻学者则面临就业困难。虽然就业问题是各领域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但这一难

① 更多有关 20 世纪末中欧亚研究状况，参见 KOMATSU Hisao, "Modern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in Japan: An Overview 1985–2000," in Stéphane A. DUDOIGNON and KOMATSU Hisao, eds., *Research Trends in Modern Central Eurasian Studie (18th–20th Centuries): A Selective and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Works Published between 1985 and 2000*, part 1 (Tokyo: Toyo Bunko, 2003).

② 例如，见 KOMATSU Hisao, OBIYA Chika, and John S. SCHOEERLEIN, eds., *Migration in Central Asia: Its History and Current Problems* (Osaka: The Japan Center For Area Studies, 2000); Dudoignon and Komatsu, *Islam in Politics*; Nurbulat MASANOV, Erlan KARIN, Andrei CHEBOTAREV, and OKA Natsuko,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 (Chiba: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2); UYAMA Tomohiko, ed., *Empire, Islam,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asi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7).

③ 在乌兹别克斯坦完成的联合研究成果之一是发现了记载希瓦汗国可汗的文献并对其进行编目。A. URUNBAEV, T. HORIKAWA et al., eds., *Katalog khivinskih kaziiskikh dokumentov XIX – nachala XX vv.* (Tashkent and Kyoto, 2001).

题在中欧亚研究专家中尤为严重，因为大学中长久以来没有适合他们专业的位置，而他们的人数却在过去 20 年中迅速增长，同时也由于其中不少人的学科专业过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中部欧亚研究在日本社会中的认可度，同时开阔年轻学者的眼界，使其关注的问题更为广泛。

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大量吸收古代中文史料的日本早期中亚研究代表了一种“东方见解”，但近年来的日本中部欧亚研究与西方学者进行的研究基本相似，尽管两者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例如，将突厥语、波斯语以及俄语资料与汉语、满语和蒙古语资料结合的能力仍是一部分日本历史学家的优势所在。^①也有与日本相关的特定研究课题，诸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鞑靼—巴什基尔流亡者的历史以及近期中亚地区的日本外交。^②尽管这些课题在中部欧亚研究中并不占有很大比重。我们也可以说，与西方学者相比，日本学者通常更倾向于对细微差别和悖论的研究，而不是简单的概念化。但这些只是细微的差别。日本中部欧亚研究与西方中部欧亚研究的类似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受西方同行的影响，还因为类似的研究趋势——比如双方都对知识分子、帝国、跨境少数民族、伊斯兰自治社会机构等感兴趣——在西方和日本曾同时出现，或者在日本出现得更早。

也许，没有必要去追求独有的东方观点。相反，我们应当着眼于构建全球性的研究机构，同时保留观点的多样性，它们不一定是“异国的”，而是反映不同学术传统与研究个人特质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西方学者与非西方学者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对称的。虽然我们总是将目光置于西方学者所做的研究之中，但后者却不太重视非西方学者的作品。我们有时会发现，西方学者在十分相似的主题上并不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即使这些文章以英文出版并且易于获得。我们深知，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英语表达能力并出版更多专著，以便在西方获得更多的认可。但这些给我们增加了相当大的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为本国读者写作，这就需要加倍工作，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写作。总之，研究全球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西方学者的努力，还取决于西方学者对非西方学者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注。

（程艳阳 译）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Japanese scholars made a close combination

① 见 NODA Jin 与 ONUMA Takahiro,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Tokyo: Department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10).

② 见 Christopher LEN, UYAMA Tomohiko, HIROSE Tetsuya, eds., *Japan's Silk Road Diplomacy: Paving the Road Ahead* (Washington, D.C. and Stockholm: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2008).

between studies on both East and West Asian history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using Russian and Turkic sources when studying Central Asia. Ethnic problems during perestroika and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 Central Asia afte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great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Japanese scholars, students, and ordinary people. Modern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Japan rapidly developed in a dozen years after the mid-1990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organizational aspect, research scope, disciplinary aspect,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etc.

【Key Words】 Japan, Central Asian Studies, Central Eurasia, Oriental Studies

【Аннотация】 В конце 19 века японские ученые тесно связал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Азии, и в основн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науч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на русском и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 Горбачёва и появле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ых стран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сле развала СССР, всё это вызвало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среди японских уче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и простых людей. После 90-х гг. 20-го ве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Японии стали развиваться стремительными темпами. Методы, сфера и предме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чные подходы обладают различны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Япо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центральные регионы Еврази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责任编辑 黄翔)

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与意义*

阎德学**

【内容提要】经过冷战后十余年的探索研究，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构建了“斯拉夫·欧亚学”的学科体系，代表了当前日本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的最新水平，并试图以此理论来阐释前苏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对日本“斯拉夫·欧亚学”构建的背景、内涵与意义的梳理和阐述，可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关键词】斯拉夫·欧亚学 构建 日本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1-0128-(11)

导 言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是日本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的代表，它不仅是日本国内公认的该领域研究水准最高的学术机构，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作为日本“全国共同利用”的研究机构，斯拉夫研究中心之所以能够在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领域树立起牢固的权威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该中心自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坚持两条基本研究理念：一是开展以人文与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斯拉夫地区的跨学科研究，打造日本斯拉夫地区研究的信息收集、国际交流与专家培养中心；二是与政策决策研究和安全战略研究保持距离，不为意识形态所左右，崇尚学术自由。^①

斯拉夫研究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出8卷本的《讲座 斯拉夫的世界》(弘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1005)的阶段性成果。

** 阎德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日]外川继男「スラ研の思い出(第2回)(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回忆 第2次)」，<http://www.lib.hokudai.ac.jp/faculties/slv/index.html>。

文堂，1994年）之后，就开始提出要领先于世界，重新全面地建构前苏东地区研究。如果说《讲座 斯拉夫世界》代表着整个冷战时期（包括冷战结束之际）的日本前苏东地区研究的最高成果，那么该中心于2008年1月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3卷本《讲座 斯拉夫·欧亚学》，包括第1卷《开放的地区研究——中域圈与全球化》、第2卷《地区认识理论——多民族空间的结构与表象》、第3卷《欧亚——帝国的大陆》，则全面地阐述了“斯拉夫·欧亚学”的构想，代表着日本斯拉夫研究的最新成果。

可以说，经过冷战后十余年的探索研究，斯拉夫研究中心终于构建了“斯拉夫·欧亚学”的学科体系，试图以此理论来对前苏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予合理阐释。而创建“斯拉夫·欧亚学”的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更是凭借构建“斯拉夫·欧亚学”等重大项目的研究，愈发巩固了其在地区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并继续引领着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向前发展。

一、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背景

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提到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研究，首先浮现出来的是“转型研究”，也就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市场经济”或者是“共产党体制的民主化”等内容的研究。转型研究对于前苏东地区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欧美学者一般将该地区的研究称之为“后社会主义研究”。这表现出欧美学者的自负，即认为改革的范例是欧美国家自身，也反映出一种以欧美中心的世界观仍然在其中起着作用。“后社会主义”这一名称也许对特别指定的研究对象较为方便。然而，关于前苏东地区的研究决不应只限定在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研究，或者说，对于该地区来讲，仅仅依靠单纯的转型或民主化研究是无法把握其巨大的变化的。因为该地区的变化形态多种多样，甚至深入到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前苏东地区，无论是社会主义时期还是之前的历史时期，具有统治制度上的共同特征，如党国体制、沙俄体制等，但在宗教、语言和习俗等方面却不是一个整体，而且与相邻地区的边界频繁发生改变。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欧亚大陆是极为复杂的马赛克式的地区。人们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的记忆还非常深刻，人们也往往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察该地区。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并不是想用文化和历史研究来取代政治与经济研究，尝试发现该地区的天然禀性，而是认为地区的个性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与其他地区的交往会发生改变，并且得到重构，而欧亚大陆目前正处于重构的过程之中。虽说如此，“后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落伍的称谓过于受到社会主义的牵绊，远不能反映地区的整体状况。所以，日本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呼吁“已经不是战后了”，

后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一个新的称谓。^①其实，世界各国的学者对后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叫法，比如，“俄罗斯·东欧”、“斯拉夫·东欧”、“俄罗斯·欧亚”、“斯拉夫·东欧·欧亚”、“欧亚大陆”等，还有“俄罗斯·东欧·中亚”等称谓。这些新称谓本身就反映了对该地区认识的变化。日本学者称其为“斯拉夫·欧亚”，反映的不是文明论的欧亚主义，而是作为一个历史空间，斯拉夫各民族具有的比较优势。或者说，是基于现代优势这种地区的限定，而采用了“斯拉夫·欧亚”这一名称。因此，“斯拉夫·欧亚学”并不是将俄罗斯的统治和社会主义作为唯一的共同选项来进行地区的认同，同时也并不认为现在的国界是严格的地区划分。而且，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像匈牙利、格鲁吉亚等，在语言上、民族上都不是“斯拉夫”的国家和地区，但也是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的重要构成要素。也就是说，非斯拉夫的“异类分子”也是“斯拉夫·欧亚学”不可或缺的考察对象，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纳入了“异类分子”，才产生了斯拉夫·欧亚地区。

斯拉夫研究中心松里公孝教授对创建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背景因素阐述得更为直截了当。他在提出“斯拉夫·欧亚学”的核心概念——“中域圈”时指出，实践的动机在于想要阻止前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细分化倾向。^②冷战结束后，是什么原因导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越来越走向细分化呢？松里公孝教授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许多研究学者认为不存在斯拉夫·欧亚这个大区域，认为那只不过是凭借社会主义的强制力而缔结的，因此，既然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了，对原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细分化的研究就理所应当。的确，以往地区研究中的地区概念多少都是以地区的单层结构和相同结构类型为前提的，然而到了全球化时代，这种地区概念逐渐失去了分析的有效性。对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细分化研究是墨守传统的地区概念的结果。第二，冷战结束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研究陷入资金困难的境地。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是由国家提供经费，而在欧美国家，如果没有民间资金的资助，是无法开展研究工作的。比起抽象的大区域来说，民间出资人更愿意将资金投向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小区域，所以将研究机构化整为零，更有利于得到资金的援助。第三，在斯拉夫·欧亚研究方面，俄罗斯学者以及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学者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通常来说，在帝国解体之后，原宗主国对前殖民地的研究将起到重要作用。例如，越南独立后，法国在越南研究方面长期独占鳌头。

① [日]家田修「講座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1) 開かれた地域研究へ——中域圏と地球化(面向開放の地区的地区研究——中域圏与全球化 講座斯拉夫·欧亚学1)」，講談社，2008年1月，第14-15页。

② [日]松里公孝「中域圏の概念について(关于中域圏的概念)」，<http://src-h.slav.hokudai.ac.jp/coe21/forum/forum01.html>。

可是，在今天的乌克兰研究和波罗的海国家研究方面，俄罗斯的主导权微不足道。据说就连圣彼得堡的科学院图书馆也正式停止了乌克兰语文献和白俄罗斯语文献的采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状态丝毫不妨碍俄罗斯历史学家批判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史学，他们甚至连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都不懂，却没有丝毫担心。这里面除了俄罗斯人特有的自傲和民族偏见之外，还说明俄罗斯在今天还是没有克服苏联时期学术传统的后遗症，即大城市的研究与各加盟共和国以及地方的研究是严格区分的。

创建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国际背景是：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曾将研究对象细分为像波罗的海国家研究、中亚研究等，解体和分解了前苏东地区的研究。可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从整体上研究前苏东地区的倾向增强了，其直接因素就是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的复活。而且，反恐战争也提高了欧亚整体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斯拉夫·欧亚地区被重新认识，不仅仅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历史或者是全球化的结果，还有两个要素：第一，从苏联时代起，日本和法国等国家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的基础就是历史文学等人文科学领域，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变迁并没有导致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的消亡或改变。相反，由于体制变迁，研究工作正好摆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地区研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第二，作为现实的发展动态，由于地区一体化和地区重组在斯拉夫·欧亚区域内外不断发展，迫切需要综合分析的研究框架。这就意味着作为地区研究的新空间，重构斯拉夫·欧亚地区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完全存在的。^①

对日本来说，与斯拉夫·欧亚地区关联最深的，就是日本一直要求归还的北方诸岛、明治维新以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参与最深的从俄罗斯远东到西伯利亚这一区域。^②可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整个西伯利亚都在加深与东亚地区的联系。今天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与相邻地区关系的变化，已经不是冷战时期的西伯利亚和远东了。因此，不仅需要重构该地区的研究体系，而且近年来一个新的研究动向是，将该地区与东北亚或东亚置于一个更大的研究框架下进行研究。整个东北亚地区成为一个“磁场”，不仅是国家政策与权力角逐的场所，还是不同族群进行跨境往来的空间。这种新认识，还会由于“下一代俄罗斯史研究

① [日]家田修「講座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1) 開かれた地域研究へ——中域圏と地球化(面向開放の地区の地区研究——中域圏と全球化 講座 スラブ・欧亚学 1)」, 講談社, 2008 年 1 月版, 第 29-30 页。

② [日]原暉之「シベリア出兵——革命と干渉 1917—1922(出兵西伯利亚——革命与干渉 1917—1922)」, 筑摩书房, 1989 年版, 前言。

者与亚洲史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接触”而加深。^①日本面临的课题是，如何超越日俄两国关系，作为东亚一员与西伯利亚和远东相处。位于欧亚大陆南部的中亚，由于苏联解体而形成幅员辽阔的新区域。中亚与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的伊斯兰地区渊源很深，也可以看成独立的空间。中亚地区对日本来说，在1997年桥本龙太郎首相提出“对丝绸之路地区的外交”之后，引起了关注。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中亚成为美国全球外交的前沿基地，也成为日本外交“和平与稳定的走廊”。^②东欧位于俄罗斯和西欧之间，正受到欧盟这个“标准帝国”^③统一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其它欧亚地区的独立空间。日本与东欧之间，不存在类似于日本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或者日本与中亚地区那样具有直接外交遗留问题或者地缘政治上的联系。不过，日本曾将东欧视为俄罗斯（苏联）政策的工具。^④目前，日本的东欧政策是以欧盟东扩为背景制定的。即东欧对于日本外交来说，已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只是日本对俄、对欧政策的一部分。

其实，创建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还包含着斯拉夫研究中心谋求在世界斯拉夫问题研究领域拥有相当分量发言权的远大抱负。按照斯拉夫研究中心目前的综合实力，包括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研究队伍、完善的资料保障体系、科学的学术管理、一流的硬件设施以及充足的经费来源等，足以保障其在世界斯拉夫研究领域做出成绩，因此，该中心创建出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也是合情合理，并且会愈发凸显其在全球斯拉夫研究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二、斯拉夫·欧亚学的内涵

所谓斯拉夫·欧亚学是指继承了前苏联·东欧地区研究的学问。^⑤研究对象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称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圈的地区，包括继承了前苏联的15个

① [日]原暉之「ロシアの中のアジア、アジアの中のロシアIII(俄罗斯当中的亚洲、亚洲当中的俄罗斯III)」，斯拉夫中心編，2004年，第17頁。

② [日]麻生太郎「中央アジアを平和と安定の回廊に(将中亚作为和平与稳定的走廊)」，2006年10月，<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

③ [日]鈴木一人「規範帝国としてのEU——ポスト国民帝国時代の帝国(作为标准帝国的欧盟——后国民帝国时代的帝国)」，载于山下范久主编的『帝国論』，講談社，2006年版，第43-78頁。

④ [日]百瀬宏「戦間期日本——東欧関係の概観(战争期间日本东欧关系概観)」，载于日本东欧关系研究会編『日本と東欧の文化交流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关于日本与东欧文化交流的基础性研究)』，1982年，第195-201頁。

⑤ [日]家田修「講座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1)開かれた地域研究へ——中域圏と地球化(面向开放的地区的地区研究——中域圏与全球化 講座 斯拉夫·欧亚学1)」，講談社，2008年1月版，第11頁。

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中亚 5 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高加索 3 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罗的海 3 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原东欧地区 13 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 6 国：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

然而，日本学者并不是将上述研究对象置于封闭的地理疆界之内，而是将地区问题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加以阐释。所谓“开放的空间”，一言蔽之，就是不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复合多重的结构加以认识。复合性与多重性不仅是指该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空间特征，还意味着全球化与相邻地区的一体化压力等区域外力量对该地区的构建产生的重要影响。来自外部的压力不仅包括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力量，还包括规范性的力量，甚至是研究者的“视角”。同时，该地区人们的地区自我认同也是决定性的构成要素。因此，对斯拉夫·欧亚学可以这样认识，它不仅是研究对象在地理疆界上得以扩展的研究，而且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彼此处于开放状态下的研究。

设定了研究对象之后，日本学者将向心、离心、统合、认知、跨境、观察等研究路径作为突破口，来全面分析复合多重的斯拉夫·欧亚地区，最终目标是形成综合的“帝国理论”。^①根据前面设定的课题，斯拉夫·欧亚学的论述通过 3 卷本的《讲座斯拉夫·欧亚学》得以全面展开。第 1 卷《开放的地区研究——中域圈与全球化》，首先提出了“中域圈” (meso-area) 这一个新概念。所谓“中域圈”就是斯拉夫·欧亚地区当前受到区域内外的各种综合作用的影响，产生了若干独具特色的空间组合，这种中等程度的空间组合就是中域圈。譬如，在整个斯拉夫·欧亚地区（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圈），西部受到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而形成了“东欧中域圈”；南部形成了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联动的“中央欧亚中域圈”；东部受到东亚经济发展吸引而形成了“西伯利亚与远东中域圈”。对于中域圈的地理范围，本文援引了斯拉夫研究中心创建的图表，参见图 1。

① [日] 家田修「講座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 (1) 開かれた地域研究へ——中域圏と地球化(面向開放の地区的地区研究——中域圏と全球化 講座 スラフ・欧亚学 1)」, 講談社, 2008 年 1 月版, 第 16 页。



注：从左至右用日文所标示的中域圈依次是：东欧中域圈、EU·NATO 扩大，中央欧亚中域圈、伊斯兰复兴，远东·西伯利亚中域圈、充满活力的东亚经济；大圈则为斯拉夫·欧亚地区（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圈）；箭头上日文的意思是“全球化”。

图1 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中域圈”区域范围图

不过，中域圈不仅包括如此广阔的地域，还可以根据课题需要设定地区范围。中域圈不仅是多种新旧统合力量层层作用的空间，而且人们对于地区空间的认识也是复合的。因此，中域圈是典型的“开放的空间”。在创建了中域圈概念之后，日本学者分别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语言、经济等多种领域，对中域圈概念应用的可能性或分析范围进行了检验论证。而进入全球化时代，地区研究不仅限于斯拉夫·欧亚地区，还不可避免地需要将地区外的各种规范与压力一并纳入考量之中，因此，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在第1卷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地区问题研究方法论这一课题。“开放的空间”这个词汇，也是告诫地区研究不能步入“自己的地区”这一误区当中。

如果说第1卷是将焦点集中在区域内外施加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区域构建或者自我空间意识的形成方面，那么第2卷《地区认识理论——多民族空间的结构与表象》则对地区这一概念进行深入分析，也就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来阐述地区概念的问题。地区认识自身的内涵，从地区研究这门学问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课题。在萨义德批判东方学之后，更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斯拉夫·欧亚地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地理上都横跨欧洲和亚洲，还涵括伊斯兰这一构成要素，通过单纯的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来分析该地区的方法根本就行不通。因此，斯拉夫中心的学者在《讲座 斯拉夫·欧亚学》第2卷中，谋求积极而灵活地运用斯拉夫·欧亚地区所处的特殊空间位置来展开地区研究。他们认识到，俄罗斯帝国·苏联的东方学、语言和权力的关

系远比萨义德所说的复杂，需要超越过去以欧美和中东特殊关系为背景而建立的批判东方学的界限，需要认识到权力与偏见的结构不是将谁简单定义为坏人就能够解体的，必须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①而对上述问题的追问，最适合的区域就是斯拉夫·欧亚地区了。所以，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们紧密切合斯拉夫·欧亚地区这一素材，同时与以往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地区认识相互比较，进而展开了超越批判东方主义的论述。《讲座 斯拉夫·欧亚学》第 2 卷具体考察的地区主要是中央欧亚地区，其目的是纠正第 1 卷中的分析材料有些倾向于东欧的问题，而第 3 卷则是将斯拉夫和俄罗斯以及远东作为分析的对象，这样，《讲座 斯拉夫·欧亚学》3 卷本就将斯拉夫·欧亚地区的主体部分全都囊括其中了。

《讲座 斯拉夫·欧亚学》第 1 卷和第 2 卷是通过周边地区来迂回地论证欧亚地区，而第 3 卷《欧亚地区——帝国的大陆》则是将具有地区向心力的俄罗斯帝国置于分析的核心地位，阐述斯拉夫·欧亚地区的各种构成要素是如何相互关联、如何被统括起来等有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在叶利钦领导时期，俄罗斯出现了地方分离主义的倾向，虽然到处是“从国家转向地方”的口号，但是如果只是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与喀山的克里姆林宫换个位置，那么这样的研究不过是以往苏联研究的袖珍版而已；关键是要将空间相对化，将复杂而模糊的空间通过复杂而模糊的方式来理解。正是基于这种研究态度，才将第 3 卷中的帝国、空间表象和跨境这三个概念串联在一起。因为地区不是单纯而清晰的集合，而是被模糊可变的边界所包围的镶嵌图案。也就是说，地区不是同一性质构成的实体单位，而应该将其作为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磁场来分析。^②日本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民族国家是起源于 16 世纪的近代结构，这一点非常清楚，但是人们却深信它是自然存在的；而帝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存在的国家形态，是天然存在的；帝国是坚信自己的建设性而实施政策的。也就是说，从“开放的空间”这一观点来分析帝国是可能的。^③近年来，帝国研究非常兴盛，俄罗斯帝国研究也是其中的一翼，而《讲座 斯拉夫·欧亚学》第 3 卷就是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来提出帝国研究的新方向的。

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认识到，斯拉夫·欧亚学并不是通过《讲座 斯拉夫·欧

① [日]宇山智彦「講座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2) 地域認識論——多民族空間の構造と表象(地区認識理論——多民族空間の構造と表象 講座 斯拉夫・欧亚学 2)」，講談社，2008 年 1 月版，序言。

② [日]松里公孝「講座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3) ユーラシア——帝国の大陸(欧亚地区——帝国的大陆 講座 斯拉夫・欧亚学 3)」，講談社，2008 年 1 月版，第 12 页。

③ [日]家田修「講座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1) 開かれた地域研究へ——中域圏と地球化(面向开放的地区的地区研究——中域圏与全球化 講座 斯拉夫・欧亚学 1)」，講談社，2008 年 1 月版，第 20 页。

亚学》3 卷本就能够完成的，比如生态学和环境学的研究视角也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同时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学术批评和不断的修正，才能完善这门学问。

三、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意义

《讲座 斯拉夫·欧亚学》是斯拉夫研究中心完成日本文部科学省 21 世纪 COE 项目——“斯拉夫·欧亚学的建构：中域圈的形成与全球化”（2003—2007 年度）的最终研究成果。其实，斯拉夫研究中心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版了《讲座 斯拉夫的世界》8 卷本（弘文堂，1994 年）之后，就开始提出要领先于世界，重新全面建构前苏联东欧研究。如果说《讲座 斯拉夫世界》代表着整个冷战时期（包括冷战结束之际）的日本前苏东地区研究的最高成果，那么《讲座 斯拉夫·欧亚学》则代表着目前日本斯拉夫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仅如此，《讲座 斯拉夫世界》与《讲座 斯拉夫·欧亚学》两套研究丛书明显反映出日本斯拉夫研究的代际变化。斯拉夫研究中心更是借助地区研究兴盛的东风，在已经做出开创性的斯拉夫·欧亚学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国家级重大课题的牵引，拓展新的研究空间。申报的课题“欧亚区域大国的比较研究”（2008-2012 年度）一举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最高水准的“新学术领域研究”立项，标志着斯拉夫研究中心提出的超越地区的地区研究模式已经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认可，也说明斯拉夫研究中心对地区研究的范围从传统意义上的前苏东地区扩展到了中国、印度乃至土耳其等大欧亚地区。

创建斯拉夫·欧亚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地区研究的分析路径，也就是跨越地区的研究路径和跨学科比较的研究路径。斯拉夫·欧亚学最初的目标就是不将研究视角只停留于地区内部，而是将普遍性、全球化以及来自相邻地区的诸多作用因素一并纳入研究对象之中加以综合分析。同时，还关注斯拉夫·欧亚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就是说，始终重视跨越国界的相互作用因素。冷战结束以来，很长时间都在叫嚷着无国界的全球化社会到来了。然而在现实中，国家和地区边界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存在感更强。在此基础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相互加深的依存关系也在不断扩展。这就意味着当今全球已经到了多样化地区通过跨越边境来加深相互渗透的“跨境”时代。因此，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将跨境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路径。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学者指出，跨境时代的地区研究必然要求与其他的地区研究相互借鉴，也就意味着跨境研究要求“研究的

跨境”。^①虽然目前在难民和移民等狭义的跨境问题上已经实现了地区研究之间的合作，但在东亚共同体、伊斯兰复兴等关系到众多地区一体化与分裂问题的综合研究方面，只是刚刚有了个头绪。然而，日本却在这一方面领先于世界一步。日本已经成立了“地区研究联盟（JCAS）”和“地区研究相关学会协议会”，在研究机构和学者层面上积极推进超越地区来进行合作研究，并在2005年日本学术会议改组之际，新成立了“地区研究委员会”，使之成为30个学科领域分委员会中的一员，为推进整体的地区研究做好了制度上的准备。

地区研究的目的是综合分析研究对象，要求以跨学科研究为宗旨。可是，日本学者认为，在考虑“研究的跨境”即地区研究之间合作的问题方面，根据地区不同，跨学科研究的开展状态也会有很大差异。这个课题非常大。然而，日本的斯拉夫·欧亚学却另辟蹊径，通过文学研究来推进地区研究，与其他国家的地区研究相比，这一研究方式收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文学本身在任何地区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可是，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重要特征却是以文学研究来深化跨学科的地区研究，同时文学研究本身也通过跨学科研究获得了新的意义。这一特征究竟是基于斯拉夫·欧亚学的语言与文学本身的状态，还是基于斯拉夫·欧亚学者的观察，还有待商榷。不过，包括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在内，地区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也具有地区上的特点。譬如，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是将生态学作为其研究的最大支柱，到底是生态学的分析对东南亚最为重要呢，还是日本东南亚学者的观察是将生态学作为特殊的研究领域呢？如果学者能有意识地提出这种问题，那么地区研究这门学问，会在跨学科的分析基础上得到更大的提高。

【Abstract】 After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es in over ten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Slavic Research Center at Hokkaido University in Japan has established a discipline system in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representing the latest current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in Japan and trying to explain the undergoing enormous chang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theoretically. It could be referred to for domestic counterparts in sorting and explanation in the background,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Japan's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Key Words】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Construction, Japan

① [日] 家田修「講座 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1）開かれた地域研究へ——中域圏と地球化(面向開放の地区的地区研究——中域圏と全球化 講座 スラ夫・欧亚学 1)」，講談社，2008年1月版，第21页。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более чем десяти ле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Центр славян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япо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Хоккайдо создал систему науч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Славянские 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м самым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в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славянских евраз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Японии, а также произвёл попытку объяснить с помощью данной теории огром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происходящие в регионе бывшего СССР 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Описание и объяснение предпосылок, содержания и значен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Япони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евраз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иже предложено вниманию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ллег.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лавянские 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здание, Япония

(责任编辑 姜睿)

俄罗斯大事记

(2010年11-12月)

11月

- 1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Dmitry Medvedev) 表示要开发千岛群岛。
法国施耐德电气公司 (Schneider Electric) 与其联合投资伙伴俄罗斯萨马拉集团 (Electroshield) 获得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 升级三家精炼厂的 30 亿美元的合约。
- 3日 俄罗斯宣布, 在该国运营的非商业机构收到外国捐款或年收入超过 300 万卢布(约合\$97,500) 时, 将被要求在每年的 4 月 15 日公布其活动、主管和开支。
- 7日 俄罗斯新近成立的空降兵联盟 (paratroopers' union) 举行集会, 抨击俄国防部长谢多尔科夫 (Anatoliy Serdyukov) 的改革并要求其辞职。
- 10日 韩国总统李明博 (Lee Myung-bak) 与到访首尔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同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宣布特别考虑到了包括朝鲜核项目在内的地区安全威胁。双方还表示会寻求东西伯利亚联合经济项目的完全落实。
- 13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 (Vladimir Putin) 和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 (Boyko Borisov) 共同见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和保加利亚能源控股公司 (Bulgarian Energy Holding) 签署章程。双方决定成立联合项目公司以建设和运营保加利亚部分的南溪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亚太经合 (APEC) 会议场外与日本首相菅直 (Naoto Kan) 会面时称, 希望加强以经济为先的俄日对话。
- 15日 中国, 俄罗斯和印度的外长齐聚中国武汉, 讨论深化国际和区域合作问题。
俄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 (Gennadi Ziuganov) 称, 如果哪一天俄罗斯加入北约,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军工集团的覆灭和俄罗斯的最终毁灭。
- 16日 泰国议会同意将俄罗斯军火商维克托·布特 (Viktor Bout) 引渡至美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Sergei Lavrov) 认为泰国当局的决定明显不公平, 是在空前的政治压力下做出的。
- 17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指示致力于创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统一经济空间谈判的俄方代表, 竭尽全力尽快达成协议。
- 19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里海峰会上称, 里海地区的安全责任是里海国家的权力, 并号召签订拥有法律基础和可以作为转折点的合作协议。里海国家同意就该海域的领海宽度开展谈判。
- 20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参加在里斯本召开的北约峰会。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罗戈津 (Dmitri Rogozin) 称, 联盟的新安全条款有希望成为普遍的安全政策, 如有需要可在全球执行。
- 22日 俄罗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 (Alexei Kudrin) 详细阐述了严重依赖于公司的俄罗斯税制的改变, 13% 个人收入的固定税保持不变。
- 23日 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他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副总理谢钦 (Igor Sechin) 就包括中俄管道运营和中俄东方石化(天津)炼油厂奠基等能源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
俄罗斯联邦移民署称, 约有 34 万永久性移民定居莫斯科, 驳斥了高估的所谓有 200 万非法移民的数据。
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与世界银行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会面后称, 世界银行准备给予俄罗斯 40 亿美元的贷款。
- 24日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祖布科夫 (Viktor Zubkov) 称, 对俄罗斯食品和谷物的存储有十足的信心。
俄罗斯一些地区将从 1 月 1 日起出口面粉。
- 26日 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关部长就运输石油至乌克兰石油精炼厂和途径乌克兰的石油运输合作问

题签订协议。

一份提交给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案提出，针对记者的犯罪行为将会面临长达 15 年监禁的更为严厉的措施。

俄罗斯杜马的一份决议承认，1940 年在卡廷附近对波兰军官的处决，是在斯大林和其他苏联官员的直接命令下执行的。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电话交谈中强调，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升级。

30 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向宗教组织归还苏联时期被没收的宗教财产的法规。

初步数据表明，2010 年底俄罗斯联邦预算的赤字可能达到 GDP 的 4.3%。财政部长库德林称，对这超过通常标准的赤字不得不进行削减，否则将会成为严重的负担。

12 月

1 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发表国情咨文，重点谈论少年儿童政策。

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签订结成战略联盟的协议。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阿斯塔纳召开的欧安组织峰会上发言时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已开始丧失自己的潜力，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革。

2 日 德国意昂集团售卖所持的 3.5% 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股份。

俄罗斯总理普京在接受美国 CNN 拉里·金(Larry King)采访时称，俄罗斯选择了民主化道路并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3 日 俄罗斯获得 2018 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权。

瑞士石油经销商贡沃尔石油公司(Gunvor)否认与普京有关系。

俄罗斯储蓄银行(Sberbank)市值超过俄罗斯石油公司，成为居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公司。

4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称，赢得世界杯主办权将会改变人们对俄罗斯的偏见。

俄罗斯“格洛纳斯—M”卫星发射失败，火箭偏离航向并坠落太平洋。

6 日 俄罗斯与波兰签署经济现代化合作宣言。

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MICEX)表示，该交易所将于 12 月 15 日启动人民币兑卢布交易。

7 日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埃利维拉·纳比乌琳娜与欧盟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签署了俄罗斯与欧盟关于结束俄罗斯入世谈判的谅解备忘录。

8 日 俄罗斯拒绝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

俄国家杜马 8 日在会上三读通过了简化高技术外国专家及其家庭成员入境俄罗斯的法律。

10 日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就原则性问题——石油关税问题达成一致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协议。俄罗斯将对出口到白俄罗斯的石油免征关税，而白俄罗斯将把所有油品出口关税缴纳给俄罗斯预算。

13 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要求将莫斯科马涅什广场骚乱定性为犯罪并追究肇事者责任。

14 日 沃尔玛(Walmart)关闭莫斯科办事处。

俄罗斯副总理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宣布，政府委员会将批准建设穿越希姆基森林的莫斯科—圣彼得堡高速公路。

15 日 蒙古同意与俄罗斯一起开发该国铀矿。俄罗斯总理普京与蒙古总理苏赫巴托尔·巴特包勒德(Sukhbaatar Batbold)商定建立铀矿开采合资公司。

16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与民众直接连线交流再次打破纪录，共用了 4 小时 26 分钟。普京共回答了 90 个问题，其中 31 个问题是他自己选择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关于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关于

- 消除当年夏天发生的历史上最大火灾的后果问题。
- 17日 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公司（Norilsk Nickel）用 210 亿美元向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United Company RUSAL）购买股份。
- 20日 埃及贸易及工业部长拉希德·穆罕默德·拉希德（Rachid Mohamed Rachid）在开罗与俄罗斯工贸部长维克托·赫里斯坚科（Viktor Khristenko）举行会谈后证实，俄罗斯将参加埃及首个核电站项目的竞标，并表示愿意向该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 21日 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宣布成立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两国历史。
俄罗斯化肥企业乌拉尔钾肥公司（UralKali）和西利维尼特公司（Silvinit）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钾肥制造商。
- 22日 莫斯科银行日前卷入与莫斯科前市长卢日科夫（Yuri Luzhkov）夫人巴图林娜（Yelena Baturina）领导的因捷科集团（Inteko）有关的一宗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就莫斯科银行的几位身份不明的工作人员实施大额诈骗进行刑事立案。
- 23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美国参议院批准《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感到满意，并希望俄杜马与联邦委员会审议这一条约并予以批准。
- 24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 24 日一读通过《关于批准俄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法律草案。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周五在接受俄三家电视台联合采访的直播节目上总结说，摆脱金融危机、俄罗斯火灾、签署俄美削减核新条约、庆祝卫国战争胜利 65 周年，以及将俄罗斯儿童问题视作最优先方向，这 5 件大事是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他声明说，俄罗斯打算与日本合作，但不会放弃千岛群岛，并解释了卢日科夫被罢免市长职务的原因是腐败严重，并认为接替卢日科夫的索比亚宁很有工作能力，不追求政治上的竞争。
- 27日 俄罗斯正式宣布采购法国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
俄罗斯法庭二审宣判尤科斯公司（Yukos）前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有罪。
- 29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与政府成员会晤时表示，尽管通货膨胀高出预期，俄罗斯经济今年仍发展不错，这完全是政府及时管理经济的功劳。
俄罗斯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在接受俄罗斯“24 小时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交通设施落后导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损失 3—4%，发展中部地区交通设施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俄总统新闻局透露，“能源”火箭航天集团副总裁、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维亚切斯拉夫·菲林（Vyacheslav Filin）与俄航天署副署长维克托·列米舍夫斯基（Viktor Remishevsky）被解除职务，原因是计算中的错误导致 3 枚格洛纳斯（GLONASS）卫星发射失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新闻发言人谢尔盖·库普里亚诺夫（Sergey Kupriyanov）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该公司天然气开采量同比增长了 10%，将达到 5085 亿立方米，去年的这一数字为 4610 亿立方米。公司天然气出口量与去年持平，为 1400 亿立方米。
- 30日 莫斯科哈莫夫尼切斯基区法庭判处尤科斯公司前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梅纳捷普银行（Group Menatep）前行长普拉通·列别杰夫（Platon Lebedev）14 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盗窃石油和洗钱。
俄罗斯总理普京认为，俄罗斯与美国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毫无疑问是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获得的成就。
- 31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针对外国官方人士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杰夫重判的批评表示，俄罗斯司法体系是独立的，不受俄罗斯政府和他国政府的立场所左右。

（龙腾 辑）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1年第1期

(总第167期)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

· 公开发行 ·

定价: 12.00 元